

时 空 社 会 学 译 丛

景天魁 朱红文 主 编

时间： 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Eigenzeit Entstehung
und Strukturierung
eines Zeitgefühls

赫尔嘉·诺沃特尼 著
金梦兰 张网成 译
张网成 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igenzeit Entstehung und Strukturierung eines Zeitgefühls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时间社会学》

《全球复杂性》

《社会时间的频谱》

《时间与社会理论》

《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

►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

景天魁 朱红文 主 编

时间： 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Eigenzeit Entstehung
und Strukturierung eines
Zeitgefühl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时间: 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 (奥) 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著;
金梦兰、张网成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0

(时空社会学译丛)

ISBN 978-7-303-13365-9

I. ①时… II. ①诺…②金…③张… III. ①时间哲学—研究
IV. ① B0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6133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2281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SHI JIAN XIAN DAI YU HOU XIAN DAI JING YA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 × 210 mm

印 张: 4.2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策划编辑: 祁传华

责任编辑: 祁传华 于 乐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 序

用一整套丛书来介绍“时空社会学”，无论是对广大读者还是对社会学、社会理论等专业领域的学者来说，都似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其学术和社会意义是需要予以说明的。

的确，尽管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经常会涉及时代（时期）、区域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但是，把时间和空间看做社会学的主题，甚至把“时空社会学”看做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一种重要的理论研究方法，这在中外社会学界和社会理论领域还是需要加以论证的。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等著作中强烈批评西方社会理论对时空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做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把时间看做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近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在他看来，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社会科学家只有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才能建构合理的社会思想，才能理解和把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致力研究的社会“秩序问题”。

美国当代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分析和批评 19 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局限性时更以嘲讽的口吻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概念。他认为，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时空被看做一种自然的常态、一种外生变量，而并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研究中之所以存在这种严重的理论和方法论缺失，有理论本身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理论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牛顿经典时空观和康德虚空的时空范畴在社会思想中的后遗症，但是，与此同时，也是社会科学中普遍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固有的弊端。古典社会学尽管有着近代社会的产生和发育作为现实的基础，并从生物

学等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中引入了“进化”“节奏”“规律”和“发展”等概念，但是，由于物理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笛卡儿主义）的影响，总是把社会看做一个超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醉心于揭示“社会实体”中类似自然界的“规律”，恰恰忘记了社会区别于自然的时空的复杂性。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动力学机制及其内在规定性的形成和展现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生活独特的动力学机制表现为三个主要的社会因素或过程：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二是社会制度的脱域化，三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的反思性。所谓时空分离，意味着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超越具体“地点”和“场所”的局限而实现更广泛的联合。时空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中互不相关的方面，恰恰相反，时空的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社会组织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联合就是时空重组的过程。时空的分离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机制来讲至关重要，同时，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又使在更大的时空尺度内筹划和管理现代社会广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和可能。

或许就是出于理论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在时空问题上形成了越来越明显和强烈的兴趣。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的都市研究，都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福柯甚至预言社会理论的空间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时间问题上，早在1937年，著名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就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合作发表论文《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性的分析》，强调在社会动力学研究中时间变量的意义，以及社会时间范畴的重要方法论意义。法国社会学家乔治斯·古尔维奇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版专著《社会时间的频谱》，分析了时间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即使深受帕森斯功能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述传统的社会学意义时，也曾指出模糊和忽视社会的时间历史向度对社会科学的不利影响。当代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和鲍曼等，更进一步建立起时间和空间范畴在社会场域中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时空的变化和重组是现代性的特性和重要推动力量。

“时空社会学译丛”首批著作包括《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时间社会学》《社会时间的频谱》《时间与社会理论》《时间：现代与后现代

经验》《劳动的空间分布：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以及《全球复杂性》10本，着重介绍时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注意到时空社会学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

本译丛的出版，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时空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用时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把握中国的社会实际。

3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现代性迅速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重塑了我国社会的时空结构，而从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又可以更好地解读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社会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必须立足于把握中国的时空特性。

空间性问题，是我国社会 and 经济发展首先要关注的问题。“空间”首先是指地理空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很大，这种空间特征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推进提供了可能，也使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叠加到一起，放大了差距拉大的社会效应。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主要指社会空间，如社会活动的规模、社会事件发生的范围、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任何一个成绩除以13亿，就变得很小很小了；任何一个问题乘以13亿，就变得很大很大了。这就是规模作用。目前发生于我国社会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和事件，都有着这种空间因素和空间效应，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例如，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流动于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和农村之间。如此大规模的流动，历史上不曾有过。体现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形成于其间的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极具社会学意义。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都是目前我国社会研究中要关注的空间维度。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特点，就是许多应该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事情，被压缩和重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太空育种，从古老的手工制作到现代的纳米技术，从荒凉的村寨到繁华的都市，都集中存在于同一个过程中。那些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被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如传统和现代、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此外，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特定的历史机遇，抓

住了机遇，我们就能赢得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对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中的时间因素的把握，以及整个理论和文化结构中时间观念的变革和重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时间和空间虽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维度，但是，它们又整合在同一个社会过程之中。比如，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就是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学一直关注的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如此等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着多种多样的时空重组和时空变换。

还应该指出的是，时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场所、先后、次序等，就是很有趣味的空间和时间问题，其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权利关系和社会文化意义。

可以肯定，时空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文化重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景天魁 朱红文

2008年11月29日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同时性假象	9
第二章 从未来到扩展了的现在	32
第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诺斯之忧	55
第四章 时间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77
第五章 渴望这样的瞬间	100
后 记	121
译者后记	122
附 录	124

引 论

时间在言说。她说的内容比文字简单。她带来的信息则响亮而清晰。与语言相比，时间更难被有意操纵，因此也更不容易被扭曲。故而，在言语撒谎之处，时间可以大声喊出真相。

——E. T. 豪尔

《无声的语言》，1959 年

所有人都是时间的实践者和理论家。时间“深嵌”（dwells）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制约我们的生物节律。此外，由于我们是社会存在，因此必然降生于一个时间结构本身不断变化的社会，并要学习在社会时间中生存。然而，关于人类拥有时间——这种时间从人们身上流过，结束后又开始，周而复始，不仅会在某一瞬间产生无法忘怀的印象，也会制造痛苦和空虚的认识，而且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受困于人类个体的意识和各人特有的时间世界。虽然我们可以与别人分享时间——当然也可以抱怨别人没有给予我们足够的时间或者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给了他人，但我们关于时间的话语交流是不发达的。大部分关于时间的隐喻反映了祖辈的经历和经验，而非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似乎语言总是在一段时滞后才会记录来自社会经验的交托。而时间——事实上她经过了人类制度的过滤、接受着时间秩序的调节、通过机械与运载工具来传递信息——似乎是作为“一种奇特的东西”（《玫瑰骑士》中的公主如是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能够对人类施加特别的强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关于时间的论文中指出，时间犹如一些部落在仪式中使用的面具。对于参与仪式的人来说，面具都是由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构成的，它们不是神就是魔——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躲在身后移动面具的是人。类似地，钟表和日历的面具也误导我们去认为，它们表达

着时间——无须我们的介入而自运行的、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干涉而停留。我们相信，我们必须接受这些面具的指导，但事实上它们呈现的不过是一些运行秩序，而这些运行秩序则是人为塑造的用以协调我们行动方向的象征物。一个社会越是复杂，其时间秩序的层面就越多，这些时间秩序交叉重叠，一起或并排出现在时间链接上。或许，面具的透风之处、透过面具对行动的诊断视角以及面具产生的效果正是（社会）科学对时间理解的关键。由于时间成为各门学科理解其研究现象的核心问题，时间也已经成为所有学科的一个基本主题。在解决“时间”难题时，一些理论的边界也时常会暴露出来，而这会成为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最近，普利高津（Prigogine）^① 和斯唐热（Stengers）以物理学的发展为例说明了这一点。^② 经常可以听到人们抱怨说，时间是社会科学中被忽视的主题。事实并非如此。图书馆里满是关于时间的论著，既包括翔实的调研，也不乏一般的概述。不可否认的是，长期的社会进程显然吸引了更多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标签社会（label society）更能引人注目，由于这种趋势，社会中的个体相对于社会而言受到了忽视。然而，时间很少关注学科之间的界限及其他形式的边界，同样，要想在日常生活中俘获并确定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时间自身如何变化？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多年以前的事，当时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有很多的时间，有些人却很少，有些人甚至没有，这种差异又与人们所处的文化、阶级及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建立的社会关系之间有何关联？^③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又有了许多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发现：妇女的时间的结构和使用

① 普利高津 1917 年生于莫斯科，1945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两年后被聘为教授。他主要研究非平衡态的不可逆过程热力学，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并因此于 1977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译者注。

② Ilya Prigogine & Isabelle Stengers, *Entre le Temps et l'Eternité*. (《时间与永恒》——译者注)。Paris: Fayard, 1988.

③ Helga Nowotny, "Time Structuring and Time Measurement: On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imekeepers and Social Time", in: J. T. Fraser and N. Lawrence (eds.), *The Study of Time II*. 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 1975.

方式与男人的不同，另外，在“日常生活”现象中，目前的趋势是私人时间与公共时间之间的分界越来越明显，也开始引起我的兴趣。我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未来这个范畴正无情地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我之所谓“扩张了的现在”（the extended present）。我经常接触到无处不在的现代通信技术，它们最直接、最明显地改变着人类的时间知觉。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里，在交通工具上还是在互联网上，在世界资本市场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都可以感觉到、触摸到、检验到这些技术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酝酿，本书终于瓜熟蒂落。它承载的愿望是，对现阶段的时间概念、时间经验及关于时间的冲突经验的变化做一次比较彻底的诊断，这个诊断应该获取有关现阶段日常生活（习惯）的知识（感悟）。每个人对自己因时间及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的主观意识，只有微小部分会与其他人分享。社会科学对此的贡献在于，为“社会”在每个个体经历中的影响勾画出每一条细微的连接线。正如用于证明某些物质含量的测试液会流经人们的身体一样，“社会”与社会时间也会穿越形态与目标各异的个体生命历程。时间是人类在深层次上集体形塑和刻画的符号产品，服务于人类的协调与意义赋予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时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某人感受时，她也保留着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孤独时刻也只是缺少共同消磨的时光，缺少共同分享的时光而已。而时间的缺乏程度是与社会对于个人行动的期望和要求相称的。

要进行诊断，就必须选择介入视角、限定观察范围和采用一定的思维工具。与主题相关的很多内容，虽然读者可能有兴趣，但本书不会涉及。受忽视的主要是个体—心理层面的内容。这样做，并非因为这一领域不值得关注，而是因为阐述时间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显得更为紧迫。诸如认同之形成、代际间关系、老年化过程等问题，尽管都对时间这一主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本书也只做捎带处理。^① 而我会谈到技术的老化问题。弃而不论的还有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即关于时间理

① 可参见其他人的研究：Paola Reale, *Tempo e Identità*. Milano: F. Angeli, 1988; Uwe Arnold / Peter Heintel (Hrsg.), *Zeit und Identität*. Wien: Verlag des Verbandes der wissenschaftlichen Gesellschaften Österreichs, 1983; Fürstenberg, Friedrich / Mörth, Ingo (Hrsg.), *Zeit als Strukturelement von Lebenswelt und Gesellschaft*. Linz: Universitätsverlag R. Trauner, 1986.

解的文化多样性。随着经济扩展和技术扩散，诞生于西方的时间文化（time-cultures）也在全球站稳脚跟，这使得如何应对非西方的时间文化及其多样性财富变得十分紧迫。但对我而言，目前还离不开自己熟悉的时间的地理空间，尽管我也一直尝试扩展我的现在。

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要阐述的是时间知觉（the perception of time）、时间感觉（the sense of time）、社会的与个人的时间结构化（structuring of time）中的质性变化，这些变化是通过那些追求全球范围内的同时性状态的技术清楚地表达出来。伦敦、东京、纽约、新加坡的大金融市场不就是借助时钟联系在一起的吗？地球上不同地点之间的新闻传播、信息交换、贸易往来不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吗？但在绝大部分的世界城市里，那些装着空调和玻璃幕墙的高层办公大楼的后面，居住着难以言状的贫穷阶层。那些没有卫生和医疗设施的村庄距离最现代的电脑设备或者非常遥远，或者不是很远，如同电脑设备与其链接的计算机终端一样。借助于现代电子产品，沟通的同时性近乎得以实现，但这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同时性。相反，从非同时性（non-simultaneities）中产生了新的不平等。相互矛盾的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凭借着技术—经济上的优势正逐步扩大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正在不断收缩。

第一章将重点关注作为时间知觉现象的同时性的发现及其在现实生活、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具体表现。这一过程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维度赋予了权力和时间之间的关系。谁掌握了同时性，谁就控制了从中可以推导出来的时间上的依附关系。然而，尽管在信息技术网络化的过程中信息流动的速度在不断提升，尽管装备同时性的技术设施在不断扩张，但同时性仍然还是一种假象。在某种意义上，同时性代替了过去两百年维持人类进步观的未来视野（the horizon of the future）；这种未来视野相信现实经验和不断自我更新的、在开放的未来中可以实现的期望之间的差距会不断得到改善。同时性的近似度越大，细微的时间差别就越多。正如在体育运动中十分之一秒及百分之一秒都会决定输赢，在国际竞争中，市场占有和技术创新上的细小时间差异也会带来利润和其他优势。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制度化了的的同时性，与通过非同时性生成的依附关系中包含的差异一起，对于时间本身的质量也有影响。在工业化阶段，按照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时间和金钱是平等的，时间属于

稀缺商品，但现在时间被赋予了动态加速的能量：时间成为不断加速的创新的一部分。

第二章的核心内容是未来的消失和现在的扩展。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标示的、时间阶段之间的分界，不再是普遍有效的。工业生产的时间结构维护了时间的线性模式和进步观，随着这一时代的结束，未来这个范畴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魅力。以加速创新为取向的现在开始吞噬未来。从前可以推给未来的问题，进入了现在的视野，并迫使人们给出答案，这些问题可能明天才会出现，但今天我们就想解决它们。新的技术使时间上的解耦（uncoupling）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成为可能，这些技术推动了现在与未来之间边界的透明化，建立在现在基础上的另类的时间模式取代了时间的线性模式。但是，这种不断挺进的“创造性破坏”，如熊彼特对创新行为描述的那样，引起了另一种文明问题：过时，即技术老化、废弃物生产。过去不能及时消化废弃物。现在，随着新产品的不断增加，必须及时处理废弃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之举。在扩展了的现在，这种双向的过程需要某种平衡。

第三章的问题：是什么推动着科学——技术文明在时间上如此无情地挺进，是什么引发了人们对新鲜事物贪得无厌的需求——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推动技术加速创新？如果事实正如一些诗人和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时间——至少是建立在连续流（continuum）基础上的时间“已经死亡”，也就是说，18世纪以来伴随着进步观一起进入所谓“现代”的线性连续流崩溃了，那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是从永恒的连续性中分离出来的瞬间升值为停止时间的希望之所在，并使不受线性连续流影响的过渡期（interim periods）成为可能？或者，取代具有内置加速器的连续流的是一个新的、受技术循环塑造的时间周期，并以康德拉捷夫长波（the long waves of the Kondratiev business cycle）或其变种的形式呈现出来？

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看，创新过程的加速度是可以重新建构的。加速度所需要的时间条件，是可以在科学实验室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当科学工作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得到满足，自然现象就可以暂时在实验室被重构出来。这又诱导了其他以程序影响创新的时间结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活动追求的是意外的发现，尽管是意外，它们还是尝试去规划。当新的创造物走出实验室并进入社会现实，科学家们也想要预期其后果，但

他们所遇到的是一个另类的时间域 (another temporal domain)。

在很多章节里，我都会谈到个人时间 (proper time)。定时器 (time-givers)，尤其是钟表的历史，反映了依赖于时间的人类在社会环境与其“自己”的、逐渐形成的个性化的时间之间的关系。作为定时器，钟表体现了社会的价值。最早的钟表与功能性的定时器之间差别很大，后者显示的是早就制度化了的的价值。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主体性 (subjectivity) 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参考点，共同的社会时间中开始出现了局部的分离。一部小说的女性读者可以在某一瞬间离开现实社会而置身于一个想象的、在时间上也与社会现实没有联系的社会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公共的工作时间与家庭内部的私人时间是相对立的。两种时间有着各自的规则，互相之间的转换有着明确的仪式。在时间两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知道区分个人时间和他者时间的“我时间视角” (I-time-perspective)。随着工作生活的强度增加和时间压力的增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家庭的私人时间里走出去，并在公共时间从事职业活动，人们拥有自己可支配时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个新出现的支配类型 (a new category of disposal) 最终出现在法律中，赢得时间一如赢得财产。

第四章的主题是时间的组态 (configuration) 引起了冲突与分配的问题。时间成为政治的主题。如何在一个社会中分配工作和时间，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成为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传统的理解，动摇了关于工作与自由时间的固有区分。时间对人类的意义在不断增加，而且在不同的生活情境和生活阶段，其意义也有区别。时间对于人类的意义还体现在不同的时间偏好 (time-preferences) 上。由此形成一种能唤起情感的、冲突性的时间文化与期望的并置现象 (coexistence)，人们期望在日常生活中混在一起的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有更合理的分配模式，使它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协调和一致。

第五章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合理的分配模式应该是怎样的，从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会生长出哪些社会乌托邦时间 (social uchronias)，又有怎样的解决办法。这里涉及的是，人类在时间中行动，人类消耗时间来游戏。通过人们之间的协作和共存，通过在纵向时间中形成的历时交织 (diachronic interconnections) 和在横向时间中形成的共时关系 (synchronic relations)，人类创造了时间。行动的时间总是包含做出决定的

成分，它所碰到的是起点的不确定性。信赖的前提是人们可以期待长期关系的持续存在，也就是说，信赖建立在人们预期的持续时间基础上。短期的互动会否定时间，而在时间被忽视的地方，责任也会消失。每个人的自我发展都会受到他踏入社会发展潮流的介入点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思维工具、概念与认识都会烙上具体时代的历史性之印。这对于下一代人同样有效，下一代人所承接的是一个他们还没能改造的世界。鉴于人类干预自然环境所释放出来的自我动量，是否需要更多地思考一下代际间的范畴？在时间中的行动有多大的余地来选择在正确的时间行动呢？

时间一向都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事事皆有定时。即便德文中没有安排时间（to time）这个动词，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在超级大国的争霸过程中，在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中，在每个需要决定是否扩张的组织的时间计划中，选择“正确的”时间都很重要。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要更好地学习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储备抵制时间压力，就必须首先对时间中的战略性—游戏性的（strategically playful）侧面有充分的理解。人们可以在时间管理研讨班学会一些游戏性的解决思路，学会一些战略，但解决思路 and 战略是无穷多的。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要知道去学习社会背景的时间构架和节奏，这些才是在社会中决定时间安排的规则。只有在快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和学习缓慢，只有在时间限制的背景下才能超越时间限制。

至今为止，西式线性时间秩序的历史是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也与劳动力和生活时间残酷地适应机械密切相关。时间被制造成稀缺资源后，对时间的剥削首先导致了对未来更美好的希望的痛苦磨损。在当今世界，未来已经同现在拉平，但时间对个人和集体都依然是有限的，人们需要新的时间储备。通过扩展当下的时间，通过技术造就的全时可用性（the availability at all times），新的时间储备摆在人们面前。但这反过来对人类所能拥有的时间构成了挑战。从哪里能得到时间呢？

由此产生了对瞬间（the moment）的渴望。从战略的角度讲，所渴望的应该是“正确的”瞬间。从游戏—创意的角度讲，所渴望的瞬间应该使一切在短时间内皆有可能并且能构成历史的瞬间。

寻找并发现这样的瞬间，最终意味着承认个人的时间性。

本书的完成需要大量时间上的先决条件。其中两个先决条件尤其值得一提：一是空间条件，二是机构条件。感谢克莱门斯·海勒于1987年2月邀请我去巴黎接受人文科学商业基金会（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的资助；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邀请我到碧堤半岛（Bellagio）的基金会会议中心做客，使我得以在此完成本书的写作。

赫尔嘉·诺沃特尼，1988年8月于碧堤半岛

第一章 同时性假象

（彼时——译者注。）按钮除了开关电灯外还没有其他功能。留声机必须手摇给予动能，汽车必须用手摇曲柄才能发动，咖啡曾在咖啡磨里经手动研细，也就是说，除了从钱包里掏钱和指示方向外，手还曾经有过其他使用功能。

——阿瑟·米勒

《时间曲线》，1987年

在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欧洲人开始感觉到某种搅动。阿道夫·霍尔（Adolf Holl）写道：“八百年前，一些欧洲城市的居民开始感觉到自己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且至今未止的愿望。他们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① 法国历史学家雷一戈夫（Le-Goff）将这一转变表述为：上帝时间给商人时间让步。这一时期破晓而出的是一种有关未来的观念，它将在人类的塑造潜能面前表明自己是开放的。这是一种自己蕴涵风险的未来，因为只有那些甘愿为赢得机会而不断将其所有拿来冒风险的人才能追求未来取向。到18世纪，这种未来取向变得颇具活力。进步观念嵌入了人类历史并开始时间化历史。今天，在（趋向于贬低过去的）当前经验与趋向于无止境改进的期望之间的张力崩塌了。近年来，过去两个世纪盛行的进步信仰深深地动摇了。当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科学将对新知的追求纳入它们的规划时，它们第一次提出了时间需求，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用布鲁门贝格（Blumenberg）的话说，即“生命时间（life-time）与世界时间之间的剪刀差”的形成。自此以后，人类的时间需求

① Adolf Holl, *Der letzte Christ*,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9, p. 9.

一直有增无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时间测量的精度也有了提高，这主要得益于铯原子钟的运用。时间被归结为其他基本测量方法的度量单位本身——尤其是用于长度测量。不久前，人们开始将时间设定为时间单位，用来测量光移动所需要的时间。人类大脑通过时间差来感受空间，而时间差则由神经系统测定。现在，物理测量仪器的精确性可以帮助人们去发现靠肉眼无法辨别的微弱的偏差和不规则。1967年以前，地球自转周期还被用作时间测量的基础，但现在大家都知道，时间会因季节和年份而产生微弱差异。在这些差异中，有些是有规律的，有些则是无法预见的。世界时间是由一个国际时表办公室，即由设在巴黎的国际时间局（the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Heure）对测量资料计算得出，这些资料则由地球上最大的测量实验室测得。每隔一年半就会引闰秒（leap seconds）如世界协调时（UTC），目的是为了避免航行计时的偏差超过0.7秒。物理学界的时间测量范围大到100亿至150亿光年——光从离地球最远的星系传到地球上（仍然可见）所需的时间，这也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宇宙的年龄，小到 10^{-15} 秒——如核领域的现象。科学家还研究了需要更短时间的现象，如一些自然过程的时长，其中，能够想象的最短时间是 10^{-44} 秒（普朗克尺度，Planck's scale）。

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不同于物理学中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共同生活中，人们会运用与人类行为及人类知觉相适应的时间标度（time-scale）。这些时间标度中，从“很久、很久以前”式的神话时间到可直接触摸到的当下，可谓应有尽有，相应的时间长度则从数万年到不足一秒。超出人类知觉能力的时间被体验为无限长的或无穷短的。当然，在人类共同生活中，时间测量的精度^①也得到过提升，时间的可及范围也有所扩张。由于物理学测量工具的开发，时间的过去和未来有了扩张，不仅如此，地球上越来越广袤的地方开始接受一个统一的时间。推动这一事实形成的，不仅仅有全球范围内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日益交织以及为更快、更大规模的物、人、信息交流提供保障的现代技术，还有因工业生产方式的

① Norman F. Ramsey, "Precise Measurement of Time", *American Scientist*, vol. 76, pp. 42-49.

普及而逐步接近的生活方式。不仅诸多事情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而且，我们确实能够了解地球上其他地方同一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和进程，这都推动人们在社会共同生活中接受统一的时间。此外，现代人还都有一种特别的愿望，即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事。

是什么促使人们断然宣称他们紧迫地需要时间，而且以这种特别的第一人称形式？他们不是拥有可以帮助他们节约时间的机器吗？很多机器能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使他们从无聊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交通工具随时待命，时刻准备将他们以更快的速度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今天，按钮可以用来操作更多的机器，而不再仅仅用来开关电灯。现代通信技术所能实现的传输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感觉器官的感知能力。但正是因为人们日益深刻地卷入全球统一时间，才产生了将自己的时间从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中分离出来的愿望。这意味着，人们希望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时间的连锁进程，希望实现对自己的地方时间的“时间主权”（temporal sovereignty）——地方时间融入世界时间已是随处可见、随处可觉的事实。人们所寻求的，并不是要在漫长的时间和短暂的瞬间、在久远的历史时间和感受几微秒时间流动的欺骗性现在（specious present）之间选择联系和解除联系，而是在遭遇开放的、横行全球的世界时间的同时，保持个人的、主观的地方时间。

在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设置了同时性装备，人们可以随时通过通信卫星同步传输、交换和生成世界新闻、股市信息、金融交易和电视画面。这些蔚为壮观的同时性景象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正如美国文化史学家斯蒂芬·克恩（Stephen Kern）详尽描述的那样，1880年至1918年间，人类的空间感觉和时间感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仿佛技术的、艺术的和科学的成就有意识地会聚在一起，要冲破践行已久的社会认识中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并转而进入更为广阔的实验领域，以尝试和实践新的视觉方式、其他的空间形式，尤其是新的、更加民主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此前被视为无法克服的空间距离障碍，在这一时期由于电报、收音机和电话的发明及不断的技术升级而不再成为问题。城市的电气化第一次人为地否定了白天和黑夜的分界。电影放映机不仅使图片的移动成为可能，而且可以将已经录下的动作随意放缓、加速甚至倒放等，这些都是全新的视觉方式。因此，

毫不奇怪的是，最初醉心于这些变化的主要是那些艺术家和诗人，他们试图赋予这些新的空间感觉和时间感觉以声音、词汇、音调和形式。古典小说的叙述方式或者传统诗歌的韵文都受到指责，被革命性的创新形式所替代。新的时间感觉改变音乐的性质，产生了前所未闻的、建立在12音阶（twelve-tone）基础上的音乐无调性（atonalities）。^① 在图片艺术和绘画中，人们努力寻找能同时表现多个视角的艺术形式；艺术家们相信，形式和颜色的恰当运用是有可能重现片刻间的变化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一时期（事实上，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狂热一直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创造力是人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正在衰落的社会秩序的瓦砾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一阶段的社会秩序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切皆有其位，一切均有其时”；人们孜孜以求的是，为了追求视角与观点、定位与主体经验的最大限度的（首先也是民主的）多样性，而重新界定地点和时间。^②

同时，空间和时间（及其知觉）也逐渐进入科学思维的中心。在物理学中，关于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牛顿式理解几乎被认定为过时之说。^③ 在热力学里，宇宙的热死亡（the thermal death）第一次从时间向量的角度进行了严格的表述。1905年，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下推算出，在一个匀速运动的系统内时间如何可能变慢。运用1916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将相对论扩展到加速物体上。因为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会产生引力场，且重力是会加速的，因此，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的时间。在后来的理论普及过程中，爱因斯坦曾将他的理论与古典力学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古典力学只认识唯一的一只表，而根据他

① 无调性是现代主义音乐的创作手法之一。它产生于20世纪初期，由19世纪后期音乐中变音体系的极度发展、调性的频繁变化、和弦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功能联系的消失等因素而逐步形成。它的特点为无中心音或中心和弦，无调号，无调式特性，半音阶的各音均可自由应用，尽可能不采用传统的和弦结构，避免能产生调性作用的和声进行。——译者注。

②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Ernst Mach, *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 historisch-kritisch dargestellt*. Leipzig: 1983.

的理论，“我们想要多少表，就可以设想有多少表”^①。量子力学将主观主义的因素引入物理学，这导致人们放弃了实在论的表述。但这种主观主义因素对观察者角色的触动，并不是由于时间向量没有真正地融入量子力学的理论结构，而是通过观察者的概念追加的。^②

在心理学以及与之相交叉的哲学领域，也存在这样的核心问题，即主观的时间知觉与客观的可测度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在“内在的”亲身经历的时间和“外在的”事先给定的时间之间的张力问题。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心理学就开始寻找现在的时长（duration）。心理学家们测度了人们能将时间作为一个不间断的整体来认知的时间间隙。但心理学家这样做的时候，现在又是什么？那些并列显示之物，难道不是客体在视觉中的先后呈现？时间难道不更类似于河流（而不像离散单位的总和）吗？在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90年所做的著名表述中，现在乃是“思想之流、意识之流”，而非一只“满盛之水桶”。在詹姆士看来，“骗人的现在”不似刀片，更类似“鞍背”（saddle-back），因其有一定宽度，我们可以端坐其上，在时间中注视两个方向。^③ 现在远不只是飞逝的瞬间，现在的内涵要厚重得多，它使感知一件事、倾听一首旋律成为可能。过去的事件或认知可以告一段落，但如胡塞尔（Husserl）所说的那样，它们作为“记忆”仍继续存在于当下。对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来说，浓缩的现在是唯一可供人们形成经验的地方。在小说中，乔伊斯让居住在都柏林的街道和酒吧世界中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和他的同代人做了内心独白，并让所有经历都与1904年6月16日著名的16个小时相联系；以这种方式，乔伊斯把同时性的经验既相对化了，又客观化了。作者事实上以艺术的手法回答了公共的、可计量的、客观的时间是否是人们内在意识的一部分这样的问题。一位热情洋溢的批评家针对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杰作^④写

① 参见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pp. 19-25.

② Illya Priogogine & Isabelle Stengers, *Entre le Temps et l'Eternité*. Paris: Fayard, 1988.

③ William James, “On some Omissions of Introspective Psychology”, *Mind*, Jan, 1884; and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1890.

④ 指作者的《追忆似水年华》。——译者注。

道：身体也能测量时间。涂尔干（Durkheim）的学生，两位法国人类学家休伯特（H. Hubert）和毛斯（M. Mauss）对此的回答是：

将相继呈现的图像构造成心理学的现实（psychological reality），这种概念游戏建立在不同时间观念的两类效果的互相适应的基础上。一类效果是常态和定期的——这是日历所传递的效果；另一类效果则通过生产新观念的行动不断地建构自己。为了在独一无二的张力关系中使两类效果的特定要素集合在一起，精神不停地工作着。^①

当时的人们所关注的以及科学家与艺术家所探求的，事实上是一个问题，即人们自己的时间经历究竟有多真。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至少从主观的角度看，人们有权拥有自己的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不仅存在日历上的公共时间，而且存在人们感觉上的和身体上的私人时间；人们这方面的意识越清楚，澄清各种时间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迫切。以世界时区（time-zones）划分为前提，因通信技术而易为主观理解的同时性的发现，引发了统一的公开时间与多样的私人主观时间之间的对峙。同时性的发现变得易于为人们所理解，还由于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如“泰坦尼克号”沉没。当时，周围数百海里内的大量船只都收到了它的求救信号，第二天早餐时，大西洋两岸的都市居民都从报纸上了解到了这个戏剧性的事件。

与同时性的发现不同，同时性的兴起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它最早与国家统治的空间扩张捆在一起，后来又与市场的经济扩张联系在一起，最后与技术扩散相结合。欧洲的扩张，从总体上看，首先是领土扩张。殖民大国占领他国领土，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主权版图。欧洲内部的民族国家兴起于空间上分割开的领土上，它们在各自的领土上行使自己的暴力垄断和税收垄断。

随着空间上统治的确立，时间上的统治会紧随其后，但后者是完全

① H. Hubert und M. Mauss, “Etude sommaire de la représentation de temps dans la religion et la magie”, in: *Mélang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1909, 引自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p. 32.

按照中央权力因组织上的需要而颁布的命令来确立的：官僚制的时间统治建立在准时性（punctuality）的基础上，而准时性是在军队、学校及后来的工厂内部维护纪律所必须的。时间统治的扩散过程最早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腾飞和官僚制的静态时间秩序的扩张而开始的。时间统治象征着进步和经济腾飞。都市与没有沥青路面的或者没有连接国家电网的村庄之间的差距，是时间上和经济上的（temporal-economic）差距。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了在时间上领先的新的中心区域的兴起，也导致了时间上落后的外围区域的出现——无论其地理位置如何。时间统治的首要分配机制是市场。克服了空间的限制之后，时间在购买行为上的意义似乎也被否定，但事实上，人们可以从细微的时间差异上获利，在竞争中，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月的领先都是优势。时间上的差异决定着输赢。借助于通信技术，人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和利用时间上的领先优势，将其运用到很多交易之中。一点也不意外，人们架设的第一条电话线路是为了更快地传递股票行情；而第一条电话线的剪彩仪式仅仅是出于礼貌考虑才交给国家元首的。市场和技术的渗透有多深远，可以从1987年秋季股市崩盘时，媒体在全世界传发的照片中解读出来。这些照片展示了纽约和东京的股市上着装统一、配备三部以上电话的股票经纪人正试图挽救所能挽救的一切。随着带有买卖条件程序软件的计算机的联网，时间的标准化经历了一个新的高潮。

如果不考虑其影响，官方的介入开始得并不轰轰烈烈，事实上还显得很平凡。1884年开了大量的国际会议，其中之一是为了争取规范、尺度和重量的统一。出于实用、商业和政治上的必要性考虑，各国政府催促签订国际协议，目的是使各式各样的地方、区域和国家标准变得更简明、可转换、更合理。启发统一标准的赞成者的不是大胆的乌托邦，而是工程师、实业家、官员和军人的冷静计算。在国际子午线会议（the 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上，人们商讨的是如何将世界按1个小时的差距划成24个时区和设立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日期变更线。与会者必须决定，哪里是东方，哪里是西方，这涉及地球上哪些地方在计时先于或后于其他地方。这样的决定虽然是任意的，但国际层面上的时间协调必须以各国一致同意的时间分割线的存在为前提。此次会议以后，180°经线成为国际日期变更线，东西方离格林威治的距离都一样远。往东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旅游者将多得到一天，反过来则会失去一天。

如果在东京是周二晚上，在纽约则是周二早上，而不是周三早上。也就是说，纽约比东京晚 14 个小时，而不是早 10 个小时。世界时间的标准化有着直接的技术效用和军事效用。与中世纪军队让随身携带的公鸡提供叫醒服务的流行做法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机器也需要时间协调，但其需要更为精确的时间协调。世界时间恰恰满足了这个条件，不同地方的时间秩序可以互相协调，时刻表可以制定——却没有交通网络的扩张和稠密化——这是难以想象的。

技术史学家已经详细描述了现代技术如何首次克服了空间和时间，电报、电话、收音机还有电影制片技术，就像先前出现的铁路一样，不仅有助于缩短地理距离，而且传递出其他社会屏障也能得以克服这样的认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贵族以及中产阶级世界的等级结构都开始摇摇欲坠。肆意穿越各种协定边界的可能性（它就存在于技术的中介能力中）明确例证了变化的潜力，或者说是例证了现存权力结构对于“水平化”技术的敏感性。电话没有获准进入维也纳的皇室，打字员受到冷遇，电灯专供街道照明和百姓日用，这一切都并非偶然，因为它们同样都威胁到了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细致入微的区分的等级体制，而这些细致的区别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也都是相互协同的。^① 显然，电话可以缩短等待期，而且，许多处理文件的行政业务很快会变得多余。对于民主的梦想而言，问题在于要缩小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差异，还有文化上的差异。电影制作技术本身被歌颂为民主的媒介，它使得从现在起把艺术和文化享受（实际上是简单的娱乐）带出专有的宫廷剧院、带出中产阶级的文化圈，并让所有人用不了几个钱都可以享受到这些娱乐成为可能。这个时期还没有对大众媒体将在怎样的规模上呈现饱和有所疑虑，并且，毫不夸张地说，电视机很快将进入寻常百姓家。最后，对于一个此时已把个体流动性作为其核心价值观之一的社会而言，从铁路到自行车再到机动车，运输手段已经打开了通往自由空间的大门。然而，事情不止于此。事后看来，不仅仅是地理和社会的空间被打开了，而且社会看来已经无法抵御时间和空间的迷醉。

对时间的迷醉主要源于人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速度提升，它是被技

^①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术所催迫，以技术为媒介的，然而，这种提升已经被吸收进了作为总体的社会生活之中，个体对其无所遁形。技术上的变化就会带来加速的社会变化。速度缩短了大量的社会距离，而习惯改变或大量社会距离缩短的速度之快，使得人们开始更少俯视其他人，恒定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显然，技术并不总会带来其所承诺的自由（liberation），相反，它们能被明确地用于保持现存的不平等。

对速度的迷醉经过一个时间差之后从美国来到了欧洲，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从美国回来的欧洲人所写的游记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被那里盛行的快节奏和对速度的狂热崇拜所迷醉的记述，欧洲人对它们的评论既带着敬佩之情，又夹杂着文化悲观主义的预感。相当多的新兴心理学的从业者在研究期间碰到了患有焦虑和焦虑性神经症的患者，他们无法应对时间上的需要。某种“文化忧郁症”（cultural hypochondria）爆发了，它对迷醉于速度的灾难性后果发出了预警，并且这个时期的许多病症都与之建立了因果联系。^①然而，正是这种对速度的狂热崇拜在未来主义宣言^②中得到了明确的赞扬。如未来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机器时代的动力学把能量转化成了达到最终的自我毁灭（战争）后果的速度。

迷醉于时间的另一种方式是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同时性。它假想出一种时间感，根据这种时间感，个体能够同时处于任何地方，并参与别处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在无处不在，而我们可以同各处的人们进行交流。我要传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别处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其他地方、其他事件、其他人的信息的求知欲，还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长期的过度饱和的威胁。《诗意的同时性》（*poésie simultanée*）的作者们，譬如阿波里奈尔（Apollinaire）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那一代人所期望的同时性，那一代人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面临普遍的时间匮乏，也还没有沉溺于为爱寻找时间的绝望努力中、或是挣扎在过分拥挤的预约日志中。即便是一个艺术先锋，倘若他能够轻松地把时空

①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② 菲利波·托马索·马利内特（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为未来主义文学艺术在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译者注。

限制置之度外，并且支持的是西方的、个性化的意识，他也会首度大胆地赞美这种最基本的经验——私人存在的主观性是一种现实——其他许多人也同他们分享着这种经验。我们在这里要谈及的是同样屡遭主流社会秩序限制的资产阶级个体，通过使他们能够与其他地方的其他个体建立联系的各种技术配备，他们突然之间在自我的主观经验中得到了确证。于是，所有私人经验的总数构成了一种在空间上允许的多样化现实。通过同时性的发现而断然地被破除的是时间的客体化和个人意识——被主观地经验到的存在的合法性。从那时起，存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被伏尔泰（Voltaire）^① 以及启蒙运动以降的其他思想家所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历史的“世界一时间”（world-time）；它分裂成各种主观存在都可理解的某种“共在”之物，这些主观存在因技术上的彼此连接而被客体化，并且建立了公共时间。有多少思考、感知、认识和交流着的个体，就有多少主观的时间。因此，资产阶级个体发觉他们自己的时间主体性违背了通过运输系统和商业联系而日益增长的国际一体化背景，这一点由艺术先锋极不情愿地再现了出来。这种时间的主体性可以解释成公共时间的组成部分，因为私人时间从那时已被承认是合法的，或者也可以解释成一种对于非个人执行的时间限制的初级抵抗形式，这些时间限制已经内化于技术和经济的组织形式中。尽管在假想的同時性中（同时性的客观存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这要归功于它的技术上的化身），仍留有个人主体性的空间（作为客观的时空现实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已经能够（合法地）被设想为客观的时空现实的对立物了。

现今，历经五十多年以后，历经一场世界战争之后，一种循环再现的同时性正显露出来。每一次电信技术的更新换代都不乏礼赞的积极参与者，这种更新换代被看做是一种“革命”，并且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融合，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自由时间与家庭生活的融合而允诺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然而，对比 20 世纪初的情况，当几百万人惊讶地注目各种技术奇迹的时候——它们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力，这些奇迹却逐渐侵入他们的生活本身，直到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或者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至少潜在地受到了影响。彼时为个别特权人物所专享的技术奇迹，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达到了普及的程度。根据美国技术评估署（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在有关美国工业形势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过去 10 年中，美国仅在购买像计算机、无线电通信系统和设备这种信息技术上的公司投资份额就从 20% 翻倍到了 40%。^① 其他国家也以相应的时间间隔紧随其后。在第三世界，政变的准备工作中已经用上了晶体管收音机，而电视机也进入了贫困地区的千家万户。狂热支持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②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描述过的地球村概念（其中将不存在通信能力的不足），现在看来已经变成了现实。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这种新生的同时性欢呼雀跃。新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反响成了热点的公众议题，它引发了产权与公共控制权之争、经济上的集中与保障公民权（反对进行数据收集的非法链接）之争，等等。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工业化国家的失业数字，再加上新技术是潜在的“就业杀手”这一因果假定，欢欣鼓舞的人们被泼了一盆冷水。通信和信息体系的国家垄断所产生的限制问题，还有要投资哪种公共设施的建造、执行哪种物价政策、消费者保护和数据保护等问题，这些还只是以精细分化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政治领域所要处理的几个主要方面而已，对于这些问题，诗意的同时性拥护者们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最初得到赞颂的私人经验，在公众常识中是同时性的正当组成部分，而今它已经变成了脆弱的私人领域的真正噩梦，人们不得不在最新的基本人权或者其他保护性立法中寻求在技术上可能的更多的庇护。第一档收音节目和最初的娱乐产业为稳固的日常生活习惯带来了变动性，而这却正演变为休闲目标和种类的过剩。尽管每周的工作时间在缩短，但去工作地的路程却越来越长，路程中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任何一种流动性所需的社会成本也越来越高了。尽管配备了无与伦比的机械化的家用设备，妇女们还是要比男人承担更多的家务，而她们被给

①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Transition*, Washington, D. C., 1988.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有《谷登堡星云》和其他关于大众传媒的重要著作。——译者注。

予的工作与空闲的时间比差不多恒定在 1 : 3 的比例上^①。提高了的整洁标准，延长了的行程时间，还包括要带孩子上学或者参加他们的休闲活动，与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打交道，再加上终于到来的假日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所有未完成的事情，这些都与长期遭受时间匮乏的现代个体如影随形。同时性已经掌控每个人。注意周期（spans of attention）已经得到科学的调研，并被有效地用于组织电视广告。以生动的连续性掠过荧屏的是同时性的模仿物：其中所演出的事件遵循由媒体所制定的戏剧形象的规则。它们几乎同自己由之起源的社会现实毫无关系。是它们本身就是虚构的，还是从同时性的观点来看是虚构的，这对于观看者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在 20 世纪初令人们欢欣鼓舞的事物，除了其所带来的非凡后果以外，在今天已经变成平淡无奇的现实。多数的私人时间奋力挤进公众领域，并成为公共时间的一部分。从对于私人时间和主观地得到合法化的时间性存在的原初经验，到时间自我，还包括资产阶级的个体，都被猛地弹射（catapulted）到工作时间的规则、生活时间的规则、退休年龄的规则之中。是时候了，每个人的私人时间都已经在世界的时间中找到了安身之所，不过，通过通信技术，这种私人时间已经变成随时可连接、随时可用、随时面向公众的时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个期间，技术上成熟的通信技术获得了一个集中拨款的过程。通过相应的公共设施的建造，加上从各个个别的技术系统到一种庞大的技术体系的那种典型的汇集（其中，不同的部门彼此结合到了一起^②），技术和经济上的前提条件已经被创造出来，这使得在一种近似的同时性中进行交流和行动不仅可能，而且势在必行。同时性已经变成了许多人的日常惯例，它不再处于人们视线的中心，就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命运，或者是其他用于强化人们之间的团结感的仪式性时刻（即传递同时性的时刻），现在它只是日常工作的习惯性程序，是其他人持续不断的、或虚或实的时间性呈现。

当然，在其他世纪中也存在过生产同时性的社会技术，其中首推所

① Alexander Szalai, *The Uses of Time*, The Hague: Mouton, 1972.

② Thomas P. Hughes,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有文化中的人们都发展过的宗教仪式的复杂艺术。宗教仪式的社会编制也专注于建立自然和超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并把现存的社会秩序收纳到它的编码程序之中。在仪式中，各种空间和时间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克服。不过，在这里，地位更高的是群体的自我时间，而不是个体的自我时间。是群体创生了宗教仪式中的时间，他们不断演练它，使它循环到另一个时间转折点，并最后把它消解。在宗教仪式中，参与者所确认的是已经由其他人创造出来的秩序体系。但到那时为止，市面上还买不到可供人分离使用的中介形式。现代技术所创造的同时感的中介与古老的社会技术的创造品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参与的社会约束。任何不参与的人都会被拒之门外，成为某个局外人。在20世纪初仍然占优势的不合理的社会等级体制，可能已经在人数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下被摧毁了，但社会的不平等并未消除。社会冒险地以两种速度运行，如法国人所说的“二元速度结构”（à deux vitesses）。快速组在行动中直截了当。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合时宜的，是竞争中的领先者。为此，他们也得到了物质方面的奖励。慢速组之慢远远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刻画一个快速组和慢速组都在其中占有互补性席位的世界，我们就得有诗意的想象力。作家斯登·纳多尔尼（Sten Nadolny）已经把他的成长小说^①（描写英国海员、北极探险者约翰·富兰克林的故事）转变成为一种对于放慢和赋予生活节奏以意义的艺术的敏锐研究。主人公当船长的时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减速的工作更重要。所有平常的、快速的决定都交由大副来做。”此外，他还仔细思索了他的朋友奥米博士（Dr Orme）的话，这位博士建议，考虑到“这个时代的致命加速度”，应该用各种设备来衡量所有个体的速度，然后再决定每个人更适合做什么。既存在着概览全局的职业，像马车夫或者国会议员；也存在着处理细节的职业，像工艺技术、医疗这样的专门行业，或者是绘画。前一种职业中的人更善于面对这个时代的加速度；而后一种职业中的人最擅长隐遁于这种加速度之后，并以加速所带来的后果来认真评判快速组的工作及其规则。^②

① 一种展现个性发展的小说。——英译者注。

② Sten Nadolny, *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Munich: Piper, 1983, pp. 208-209.

构成慢速组的是那些落在社会后面的人。在对一位失业青年的访谈中，被记录在 1984 年 2 月在不来梅州（Bremen）的一次实证调查的行程中，调查的主题是：在“失业”的社会处境中，时间的“停滞”会变得明显。这位年轻人称自己为“老虎”，他想让时间停滞，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一定不能有这样一种糟糕的时间”。他的策略是，直接使这种时间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明显起来的远不止于此。停滞意味着时间上的再度陷落。“老虎”和他的家人（他的父亲是码头工人）住在一个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时间倒错的世界中。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奉献，实际上甚至是他们行为的休戚与共的方式，都落后于他们所属社会环境的“历史的”时间。电话联系成了他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象征。然而，仅是父亲的疾病和可能发生的一幕“为时已晚”^①，就让这个家庭濒临如此困境。

我们在这里也要谈到同时性匮乏的一面。同时性不会自动地变成平等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它就是一种假象，这同物理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同时性一样清楚。与 20 世纪初一位评论家的大胆承诺相反，空间和时间并没有被征服。以同时性为中介，通过对参与的约束建构而成的技术和技术体系的汇集，赋予了不平等另外一个时间维度。这不只出现在现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自觉的处境中。以进化论思路设计的人类进步仍然要以一往无前的时间之矢（the arrow of time）来对照自身。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社会必然要经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暗示着进化的阶梯仅此一架。与此同时，前进的道路变得越发曲折，所有太过简单化的思维模式都不再令人信服。从技术的实现程度和集中程度来衡量，各种时间差异的轮廓就更醒目了。在体现了欧洲人的民族优越感的社会发展的旧进化阶梯中，属于不同发展速度的等级森严的时间概念也具有一种（家长式的）保护功能：不发达的社会被承认是生活在另一种不同的时间中，而它们被郑重宣告的落后身份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于文明世界的尽头相当于获得了某种时间上落后的权利。处于同时性的影响，类似借助于现代电信技术而猛地弹射性发展而

① Enno Neumann, “Arbeitslos-Zeitlos”, in: Rainer Zoll Notes (ed.),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p. 267-275.

面临的压力，这意味着丧失了依自己速度发展的权利。真正重要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评判，而是对参与的时间—技术（temporal-technological）的约束。鉴于同时性的假象，拒不做出旨在迎头赶上的发展规划就更加困难——技术已经把我们的感知模式变得面目全非，而与金融政策相关联的附属机构又太过现实，它们用信贷体系的时间性装置来规划未来的路线。^①

如果说人类学家会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中、在与被调查对象的交谈中评判他们自己的学科，如果这些调查者向他们对面的人承认了“他者”是与社会学家们处于同一时间中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交流，尽管同是这一些人类学家，当他们写作科学文本的时候，却把“他者”确立为生活在另一种时间——“部落现实”的时间中的客观对象），那么，这就显露出了同时性的另一个可质疑的层面。^② 千差万别而又相互矛盾的意识形式在同一时间中存在，即它们在时间上的共在，可能会被否定或者是以距离的方式得到确立。“差距是某种进步的强制力所必需的，由它才能克服时间”。但是，能够通过认识到时间上的共在来避免所有在想象中或者常规的发展时间表中的日期确定，即便这种时间表不是根据决定论和进化论而设计的吗？让—雅克·萨洛蒙（Jean-Jacques Salomon）在法国中部的阿尔卑斯山（当时他正准备写一本有关计算机时代的书）邂逅的那个乡村书记员是一个过时人物吗？或者，他的存在是日常的各种时间并置的一部分，甚至是在一个以其高技术为荣的国家里吗？^③ 对于 20 岁的失业小伙子“老虎”，如果在他的时空现场中，作为一个访谈的搭档，他被承认是共时性的，或者说是同时代的，那他在时间上的“落后”程度会变小一些吗？在这里，真正而言，是谁做出不同的归属、它们又如何在社会现实中站稳脚跟呢？

的确，在人类发展史中的每个人都与各自的“他者”缩短了距离，

① 信贷与债务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时间依赖关系，直到现在，这一点仍很少受到社会科学的关注。

②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Jean-Jacques Salomon and Andre Lebeau, *L'écrivain Public et L'ordinateur. Mirages du développement*. Paris: Hachette, 1988.

并且，“我”和“我们”之间的平衡发生转移的过程中，无疑也蕴藏着一种文明过程的原理。^① 否认“他者”的精神存在，进而否认其人性，或者把他或她搁置在发展的低级阶段，把他或她列入另一种时间，这诚然表达了各种各样的差距形式，但总归还是社会的差距，因而会招致歧视的后果。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失业者就生活在另一种不同的时间中。“老虎”强加给自己的可能是时间上的“中止”，也可能是玛丽·杰霍达（Marie Jahoda）在她对马林托（Marienthal）的失业者（在那里，整个上午的活动都被归结为一句话——此时就快到午餐时间了^②）的经典研究中所描述的折磨人地缓慢流逝的时间。然而，失业者生活在另一种不同的时间中，这是因为他们现在或曾经不够快，还是他们不能足够快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失业者？在这里，鉴于时间上的共在，多种时间的并置是什么情况呢？有意或者无意地聚合起来的又是什么呢？时间进程中的不同速度通过时间发展的规范目标而得到测量，其必要性源于同时性的假象——我们怎么能取消这一不争的事实呢？

在物理学中，狭义相对论的预言已经直接得到了观测，这得感谢时间测量的精确性。如果两个观测者都配备了时钟，并且彼此以恒定的速度相对移动，其中一个人的时钟就会比另一个的慢。因此，在物理学中，对于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两个事件来说，同时性已经失去了意义。每个观测者都有他自己的“本征时间”（proper time），这个时间得到了精确的时钟的测量，而这个时钟又总会附着在他身上。如果已知这两个不同观测者的相对速度，就能通过原理中的数学方程计算出他们的本征时间。

在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一种人人都离不开的本征时间——个人时间（proper time）。它的出现相对较晚，而它在政治上的表达能力尚待发展。在几乎不存在符号的早期社会中，也不存在对某种个性化时间的需要。群体的（部落的）社会时间适用于所有成员，尽管存在依据各种社

① Norbert Elias, *Die Gesellschaft der individuen*, Frankfurt: Suhrkamp, 1987; 英文版: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Oxford: Blackwell, 1991.

② Marie Jahoda, Paul F. Lazarsfeld and Hans Zeisel,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mhal*, 2nd edn, Allensbach: Verlag für Demoskopie, 1960; Marie Jahoda,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会区分界线而扩展开来的差异，如性别、年龄组、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职业、地位还有权力，等等。欧洲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时钟，不同的社会活动分化出了不同的时间体系。宗教领域（像在其他社会体系中一样）是一个例外，并且，它还处于一种同时间相关的特殊地位。“神圣的时间”、世俗时间流中的节期（the set times）不仅存在，而且还是“上帝的仆役”（如同宗教部门所获得的称谓一样），它们的运作遵循自己严格的时间规则。当上帝的时间与商人的时间不再一致，而又很难弄清楚为赚钱而放贷到底是否被上帝所允许时，时间上的冲突首度迸发了出来。^①

围绕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② 改革和使城镇之间各不相同的地方时间标准化的问题，各方力量争论不休。这些争论体现了当时各个特定社会系统所具有的领地范围的冲突，每个社会系统都有与其自身相应的时间系统。无论如何，对于生活在这些系统中的人们而言，正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地位，还有他们的居住地决定了他们必须要遵循的是哪一种时间规则。随着时钟的出现，可共同使用的、看得见的参照点被创造了出来，它在精确性和可靠性上都比以前使用过的对天体和动物行为进行观测的定位方式更胜一筹。要想知道现在是几时几刻，只需瞥一眼教堂尖塔上的时钟。一个人的自我时间感，既受到基督教年历中的节日循环的控制，也受到社会习惯和农业生产所要求的劳动节奏的制约，这种自我时间感在当时充分决定着普遍有效的、社会的时间。只有当资本主义到来，时间能够转化成金钱之时，典型的工业社会的时间态度才出现，对生命时间的拆解（detachment）过程也才开始，当时的生命时间已经变成可以用工作时间来测量的。机器的第一需要是得到运转——达到全负荷的极限。剩下的时间用于恢复劳动时间中被消耗掉的

① J. Le Goff, "Zeit, der Kirche und Zeit des Händlers im Mittelalter", in: Clhudia Honegger (ed.), *Schrift und Materie in der Geschichte. Vorschläge zur systematischen Aneignung historischer Prozesse*, Frankfurt, 1977, pp. 393-414; R. Wendorff, *Zeit und Kultur-Geschichte des Zeitbewußtseins in Europa*,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0.

② 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即公历，于1582年颁布，也就是现在全世界通行的阳历。——译者注。

劳动能力。一个人的个人时间同他人的个人时间的关系、同社会时间的关系，已经处于经济法则——时间经济学（the economy of time）的支配之下。机器就是机器时代的指挥棒。由此看来，19世纪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为缩短工时而斗争，这是要求承认最低限度的个人时间的第一步，但这里所要求的时间仍然完全被看做是集体的时间，其中充满了由集体制定好的内容，主要就是那些迫切需要的修养期。无论如何，对于资产阶级个体而言，个体性（individuality）和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兴起带来了独立的时间感，但如同对于小说的女性读者或者日记的登录口一样，这种独立的时间感成为私人情感的时间机制，在总体上，它仍然体现在私人领域中，拒绝他者的窥视，属于新生主体的私密时间。^①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只是到20世纪初，才有成千上万的以前未曾公开过的主体时间爆炸性地突现于公众生活之中，这要求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前提条件，以有能力创造出同时性假象的技术为实现手段。这是一个个人时间在其中得以确立的新纪元，其意义如同1750年到1850年这个确立了“现代时间”和历史的时间化的“起始期”。轮到艺术和科学的先锋派来负责表达它的新观念、新经验和新感觉了。有关时间的心理学理论对于每个时间感知在记忆中所留下的知觉、时长、记忆和轨迹等问题的集中关注绝非偶然。几乎没有几个物理学家能够理解的相对论，却受到了巨大的通俗科学之反响的礼遇，这也并非偶然。同时性的魅力（严格说来因为它仍然体现出非凡性）一直延伸到最小的村庄（虽然这唯一的证据是历史学家们从口述历史的传统中发现的），这一事实还是并非偶然。个人时间首度以主观经验的性质涌现，并且首度获得了科学的根基，因而进入公众领域。要使个人时间社会化，把它的功用付诸实践，并且变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自此便在日常生活中打下它的时间性标记），还需要更多的条件，例如社会组织和技术上的基础设施，这些只有到20世纪的下半叶才能被创造出来。就在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已经把它付诸实践，我们亲身体验着它，同时也遭受到它所带来的冲突。它如今已经变得平庸无奇。由于个人时间的社会化版本（现在每

① J. Goody and I.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 (1962—1963), pp. 304-326, pp. 332-345.

个人都能通过公共传播的渠道获得社会化的个人时间)，就像它之前的主观化版本一样（那时仅有少数人享有个人时间的话语权），是以技术为媒介的，所以，我们有理由在技术本身中寻找各种时间变化的决定因素。被认定为非病态（non-pathological）的常态（normal state）从未摆脱“文化的忧郁症”，过去和现在同样如此。随着电信介质全面入侵社会存在的所有领域，与之相关的恐惧和预测沸沸扬扬。它们警告了可能会产生的心理孤独的危险，即一个人在自己极度个体化的世界中与社会解耦（uncoupling）的危险。透过荧屏所获得的时间感知可能是极端破碎化的，甚至包括对各种社会关系的感知。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①描述了一些年轻的电脑畸形人的心理结构：他们通过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创造了自己的世界，甚至是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同周围的社会事件隔离开来。^②丸山（Maruyama）报告了追随计算机时代的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把他们称之为计算机儿童第五代，他们迄今还在发展上一代人所不具备的某些未知的认知官能，尽管他们的上一代也是伴随着计算机一起长大的。他们能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通过视频同时看好几个节目，并且能把握故事梗概；他们开发出自己的游戏（游戏规则规定了一连串的开关闭切换动作），发展了结合速度与同时性的各种时间知觉模式。^③

然而，单纯的技术永远不能制造出时间来，能制造出的只是象征时间的时钟。时钟在机能上以工具的方式要求人们之间互动，由此产生协调机制，但它们也被用做定位的符号手段。技术调节这些过程，在或缓和、或加重、或增加、或减少的趋向上对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别和社会隔距起到疏通、引导和指示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像长久以来被描绘的那样，属于“中性的工具”。这种观点否认了每一种技术的历史，包括技

① 雪莉·特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与小器具之间关系的心理学家。她认为，移动工具的使用正在导致“一种新型人类的出现”。——译者注。

② Sherry Turkle, "The Subjective Computer: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mputing",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12, 2 (1982), pp. 173-205.

③ Magoroh Maruyama, "The New Logic of Japan's Young Gener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28 (1985), pp. 351-364.

术自身的世代相传和技术的社会起源与基础。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认为，工具的进化是社会进化最根本的驱动力，工具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相平行（生物进化演化出人类的各種外部器官）。他同勒儒一瓦高汉（Leroi-Gourhan）一样，都强调以工具为手段的技术进化的外部特征，这种进化最重要的结果是增长了人类感知的范围和能力。凭借技术工具和设备，人类的视觉和听觉都突破了自然的局限。类似地，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对人类智力水平的提升和扩展，在现实的所有技术成就中遥遥领先。在某种意义上，工具和机器同生活在工具和机器环境中的人们再度被这些技术融为一体。社会正在又一次同化它的各种技术，这些技术正在变成一种习惯，一种惯常的生活方式，它们使外部感官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同所有的习惯一样，它们不久就会变成理所当然之事；这样一来，机械的习惯就会同生物的、社会的节律混合到一起。迈克尔·扬写道：“任何复杂的工具都是一种物质性的习惯，要经历反复的否弃或修改，这些习惯把无数先辈的过往经验封存在现在，并在其以修改过的形式得到传递以前不断地精致化。”^①

对新技术的适应过程仍摇摆不定，因为它总归是一个学习和把握的过程。机械所必须提供的东西——全球同时性和无数局部的个人时间的社会表征与整合——在这种适应的时刻得到演练，并转变成社会习惯。通过技术，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然而，个人时间与使人们成为联合体的社会时间之间的新型关系也能通过技术得以确立，只不过，这中间还有一段漫漫长途要走。在适应阶段，多种时间的并置远比聚合更重要。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争取对个人时间的社会认可，并使其在世界时间的全球的标准化体制中获得表征的斗争也开始了，这种斗争是以技术基础设施的扩展和由之所产生的对加入的约束为开端的。接下来就是争取使时间和空间结构化的政治建构权，从而获得开放的政治结构。显然，这正是当前适应阶段的冲突方面何以如此强烈地凸显出来的原因。个人时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自己的时间，必得同他者的时间、外部的时间达成新的妥协，尤其是在工业化的复杂劳动时间中，在

①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 163.

劳动时间与劳动外时间变化了的关系之中，达成新的妥协。在科学观测和个人时间的主观基础的第一个阶段中，何以挑战的中心更多地不在心理学和物理学，而在生物学和社会学，当然还有政治学？答案不言自明。要找到协调各种个人时间所需要的一个正当的、可接受的社会“解决方案”，必须以社会现实的规则和技术媒介的规则为框架，既要考虑到人们作为普遍性的生物存在，其内部所负载的自我时间，也要考虑到因人而异的自我时间。这种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是——欺骗性的现在，不仅可以解释为个体的心理现象，也可以解释为社会的、政治的现象。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个人时间的结构化何以同时解决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两个层次上的问题。这两个层次上的问题通过前述的时间并置而联系到一起：各种时间的并置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它们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而被提出；它们属于各种个人时间的时间性共在；它们在技术上相互结合，然而却通过同时性的假象和标准而在时间上发生了分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倾向于容忍的合力结果，切实地制裁像非同时性这样的社会不平等。微小的时间差异会在社会的反复激荡中越变越大，它会受国际经济和技术竞争的驱动而走上下面这条危险的路径：各种时间路线和各种不同速度并置引起各种不同的社会分工，从而，人群中的绝大部分会在时间上掉队。一个社会能经受多大程度上的时间疏离？是否能使加速变得可控，是否能有意识地进行减速或者延迟？这些都是由各种个人时间的并置所引起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事关社会正义的标准，而且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至关重要（见第二章）。另一些复杂的问题是由各种个人时间本身的时间化的视点所造成的，因为每个个体的个人时间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个人时间始于孩提时代，孩子们正是用它来进一步了解社会的；个人时间伴随着社会环境而不断变化，进入老年，直到最后死亡。人生中蕴涵着由不同序列合并而成的不可逆的时间之矢。社会认同正是由之得以建立和改变的。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通过不同时间的并置，个体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时间压力，为了使个人时间同制度化了的外部时间相一致，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压力和期望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排列顺序意味着能够在不同序列之间产生出有意义的联系，从而确立起身份认同。根据卢曼（Luhmann）的观点，并置也会发生在个体生活中——至少为了保持一个人感觉的一致性，并置在那时是必要的，因

为，它仍然能为各种巧合的机会提供连续性。^①

个体的个人时间必然与生命时间的长度相符。我们多数时期都在与社会的接触中获得经验；即便把这种经验作为编史学所需要的系统反思的核心，也还是要整理各种序列，赋予这些序列以意义，并根据新近的经验、根据使人们的经验变成历史的各种模式，来重新排列它们，这种经验也还是要以时间上渐进的方式被“层化”（stratified）。在此，同时性已经得到了处理，正如历史学家莱茵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的那样，它以叙述那些相关经验的“可能性”的形式循环再现。科塞雷克关注的是获得经验的各种不同方式。第一种经验由于其不可重复性而总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是由惊奇所产生的，因为“人们总有一种大吃一惊的经验”。因此，它也必定会被每个单独的个体再三地重新经历。被重复的仅仅是“重新经历”这个事实。第二种获得经验的方式是经验的重复，包括单个人的生活中的经验重复和作为累积过程的结果的重复，因此，这种方式会贯穿许多人的经验。这里，经验在中期稳定下来，每一代人经验增长的程度各有其特殊性。它们仅仅是由某种生物缺陷所引起的，这种生物缺陷通过亲子之间的时间差异来模塑每个个体的生活，但这些个体又是作为一代人通过共同经历的政治和社会事件领受自己的社会印记的。尽管人们对这些事件的感知和经历不同，但它们还是会唤起些微共同的旨趣，以理解所有年龄段的人。一旦这些共同旨趣被制度化，它们就确立了一种普遍的历史。

可以把独一无二而又以个人所属的时代为转移的第三个层次附加到这两个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依赖的时间层次之上，从长期来看，不管这个层次是潜滋暗长的还是逐步分化的，总之，是它改变着所有已确立的经验，也在总体上改变着经验的平衡。这种长期的历史变化（要么影响着所有当前的冲突，要么为这些冲突的产生推波助澜），把现在保持为一种背景经验，甚至是在它们由于历史方法的种种问题而被提升到意识层面之时。

然而，正如个体经验的人生必定被不断重构以产生一种连续的叙事一样，也必须在历史中为后代人的经验留出余地。在这里，在最新时

① Niklas Luhmann, *Archimedes und wir*, Berlin: Merve Verlag, 1987.

刻，个人时间与历史相结合：它们“无论以哪种方式聚合（尤其是以统计学的方法），问题仍旧在于发现长期的变化或者维持各种假定以便能够理解令人吃惊的那种独一无二性”。^① 吃惊表明，历史的时间曲线不能简单地由过去来推断，那里可能存在着不连续性和间断性。20 世纪，近似的同时性已经在技术的帮助下创造出一种现实，并起到了作为一种假象的效用。如果说必须要有一种经验，这种近似的同时性必定可以再现某种惊奇。从这点来说，值得把它计入描述、推断和改写历史的进程之中。

① Reinhart Koselle, Erfahrungswandel und Methodenwechsel: Eine historisch-anthropologische Skizze, in: *Theorie der Geschichte*, 1988, p. 48.

第二章 从未来到扩展了的现在

你的视界之外没有地平线。

——约翰·多恩 (John Donne)

出于弥补理性滞后之必要，启蒙运动也引发了对时间的需求。而弥补的方式只有一种，即加速行动。让我们看看汉斯·布鲁门贝格 (Hans Blumenberg) 对这个时代核心观念的描述：这个时代首先发现了进步，并将这种进步应用于自身，此外，时间的消耗在这个时代看来只是一个量，一个完全可以控制的量。虽然加速的观点仍然完全无法摆脱折磨人的“理性滞后”观念，但它已经把为成就历史功绩而消耗时间作为自身的指导思想。“时间从前只是事件出现或者主角登场的媒质，是不易察觉的经验量成长为可衡量的结果的媒质，而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则把时间本身看成了一种凭借其绝对数量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① 似乎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一切皆有可能。首要的是赢得时间，从过去汲取资源，奋起直追。在这个指导方针之下，时间的视野从一开始就被强有力地向后逆转，同时，《圣经》的年代表也得到了局域化的处理。“大量《圣经》以外的文化获得了时空存在的一席之地，人类在道德与理智上的完善想要经历的长期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显然，由于根本不能认为万物现在已臻于完善，人们对时间的需要还必须扩展到未来。“个体的生命在面对如此广阔的观念史时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个体产生出各种困惑，“他们在深受鼓舞和大失所望之间痛苦地辗转”。^② 尽管我们

① Hans Blumenberg, *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p. 223.

② 同上书, p. 225.

需要时间的原因已经不言自明，然而，意义的归属还必须与时间视角的转换同步，向过去和未来同时扩展。我们可以把过去“延伸到真无限或假无限”，也可以摧毁萦绕在各种历史观念周围的假象，并代之以人类的世界历史。然而，就未来而言，个人的生命时间仍然是生命期望的有意义的尺度，这一点既无可否认，也无法压制。

每一次超越现在和个体意识能力范围的进步，都危及意义的结构，这种结构能保障个体有意识地共享整体的延续性……从属于“进步”观念的加速可能并且也应该不仅仅意味着保护进步的内在逻辑，维护其不可逆转性，它还意味着重拾无限开放的未来，将其纳入生命时间之中。或者，至少要在个体人生的范围内提供尽可能多的未来可能性。因此，进步的未来维度就绝非过去这个维度的对应物（过去是指新近才得以发现并有待进一步发现的时间维度）……在由生命时间和世界时间的游离所产生的张力中，这等于是越来越多地以致最终很可能把所有事物都吸收或者强加到具体而又脆弱的主体的预期寿命之中。这样一来，“进步”就不只是由其客观内容而具有必然性的现象……而是可以通过方法、组织机构和制度化来增进，通过加速而得以凝聚的现象。^①

布鲁门贝格指出，18世纪的人们还没有人类创造历史的信念，他们认为能被创造的只是历史的步调（the pace）：“步调加速预先假定了先后次序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已经在别处得到过保证。而这种历史中的必然性不是由别处的启发得来的；相反，可以说，它是凭其自身魅力而得到认可的，显然，在面对未来这一时间维度时，它是最能给人以安慰的。”^② 19世纪，人类凭借机器创造了历史（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形式化纲领（formal outline）式的加速已经在与工业生产挂钩的机器中找到了卓越的方法和组织形式”。相同时间单位内的产

① Hans Blumenberg, *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pp. 239-240.

② 同上书, p. 242.

量越来越高，或者说是生产同量物品的用时越来越短，这一事实中包含着新近发明的“时间经济”（所有时间都在其中得到有效节约的经济）。^① 凭借机器来加速，要面向另一种不同的、机动的参照系，它已经成为机器时代的象征符号，或者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话来说，它就是工业时代自身的主机——时钟。“在别处得到保证的先后次序的必然性”可以输入机器的运转节奏中，这种必然性首先迫使不得不在机器环境下工作的人们自我调适，以达到要求越来越高的绩效标准。当英国产业工人砸烂高悬在工厂入口的时钟时（而不是他们的工作机器），他们的愤怒指向了这个记录时间的可憎标准，因为他们被迫加速的产出量就是由它来监控的。^② 最后，泰勒主义（Taylorism^③）所遵循的原则是：一系列有机运动与机器所执行的系列运动几乎完全等同，两者都由其必然的先后次序所规定，并且用时钟时间来衡量。在所有时间储量都要被“合理消耗”这个观念中，无论隐蔽的停顿和怠工看起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都要被“合理地去除”。由“方法、组织机构和制度化而获得的加速达到了暂时性的顶峰。要强迫进入具体而又脆弱的主体生命时间中的东西”，实际上已被挤压进去。

然而，开放的未来视野就像扩展的过去一样，全拜启蒙运动所认识到的时间需要之所赐，它也同样成了进步信念的必要组成部分。开放的未来视野能够使既有经验与期望视野之间应予永久维系的差异得以稳固。先前由传统的经验空间所产生的期望视野同传统的经验空间发生分歧，这种与日俱增的差别在进步的观念中得到重复。由于期望的视野在运动，历史才动态地得以创造。正如克泽莱克所证明的那样，如今可以明确称谓的现代史这个词，和它的进步适用于同样的意义。通过接连的快速变化，起初被经验为独一无二的东西，随后又被各种现实经验所替代，经验的空间就这样发生了改变。然而，与此同时，

① 生产力的提高应归功于技术的进步，这一观点可追溯到1880年左右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学说。

② E. P. 汤普森在这方面曾有经典论述：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vol. 38 (December 1967), pp. 56-97.

③ 参见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 “科学管理”的创立者）的学说。

指向开放的未来视野的那种期望也增长了，它承诺会不断出现更加美好的事物。^①

这种差异须不断维系。尽管长久以来进步信念一直在构建这种差异，但它还是无法持续到最后，不管是在世界时间和生命时间的不稳定的平衡中，还是在集体保有的对恒久辉煌的未来之改进的允诺中。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开放视野越发暗淡，此刻，人为灾难的未来乌云正笼罩在它的上空。从生命时间的角度来看，不可否认的是，进步已经为许多人带来了社会成功和物质福利方面的突飞猛进，至少在工业化国家是如此。然而，我们通过拥堵的高速公路或各种类似的消费者娱乐秀就会发现，这种个人幸福是由大量想在同时、同地、同样享有它的人们堆加而成的，其持续时间相对简短，实质内容也是含有水分的。由此看来，未来以各种期望的方式所做的承诺，最好的结果是得到更多的同一性，最坏的结果是储备的减少。在这里，即使加速也于事无补。因为，仅保持原位就必须加速运转，这暴露了进步的另一种经验：处于相对超前的状态可能证明同样是一种落后的状态。被认为能走出未来预期（这种预期已经变得尤其空虚）的逃避路线仍然陷于相同的基本模式。它们要么指向莫须有的田园诗一样的过去，要么把它们希望寄托在技术革新的下一个阶段。但是，尽管存在着各种预测和承诺，视野仍然还是扁平而且静止不动的。无疑，我们已经丧失了深度聚焦的活力。可以说，进步本身已经老化。在生态学领域，这种反弹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在这里，直线性（即在时间上不断把一个连续体拉向未来）最彻底也最持久地证明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希望。在生态圈同在地质圈一样，反而是突发事件、自然平衡的“倒转”（upsetting）以及合成反应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其本征时间多半不为人知的各种不同过程的结合）能够导致间断和崩溃。^② 随着时间尺度的缩小，在今天或者昨天的行动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快的结果将会被预期，而时间的压力也会堆积到现在。它不像天启色彩的时间末日，它至少

①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② W. C. Clark and R. E. Munn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iosphe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是对清晰的时间周期的看似合理的科学假定，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假定来预见那些消极的后果。以线形方式筹划的未来充满了负向条件，它正危险地向现在靠拢。如果说要找到解决方式并且要实现它，那么越快越好，最好就是现在。

因此，不仅仅像柏林的一堵墙上的涂鸦所宣告的那样，“未来今非昔比”（the future is no longer what it used to be）。未来日益被现在揭示出来的问题所遮蔽。它不再提供这样一个投射空间：在其中，所有的渴求、希望和恐惧能够无所压抑地投射进去，因为它看来足够远，远到足以吸纳在现在无处安身或者不受欢迎的任何东西。未来已经变得更加现实，最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的视野已经被延伸。而这也意味着它正在向现在靠拢。在一个时期中，由于人类活动及其反响的丰盈（这种丰盈已经很显著，因为它们需要计划期和发展期，而这些计划期和发展期又是不能被任意减少，并且只有遭遇困难才会被取消的），以关注自身为要务的现在已经势不可当。行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因为未来的一部分已经在现在得到处置；人类行动的生态循环变成了作用于现在的时间循环。由于对政治行动的判断需要从长计议，祈求于未来的东西不得不被缩减，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现在。

时间冲突与时间上的不对称起源于协调、整合不同时间结构的需要和构建各种模式的需要，它们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得以解决，这些机制要么是确立了优先级、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折中方案^①，要么是在充当定向工具的文化符号的变化中找到了直接表达。正如芬兰哲学家冯·莱特通过敏锐分析所得出的：“时间就是人们从矛盾中逃离。”^②要想接纳变化就得创造时间。可以继续推论：要想接纳各种随时の変化，就得反复改变时间的各个范畴。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在由进步概念的瓦解所产生的压力及其潜在的消极后果之下，这种改变正通过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延时地显现出来。未来这一时间范畴正被废弃

① Alien C. Bluedorn 和 Robert B. Dernhardt 对最近发表的大量在时间和组织领域的研究给出了有益的综述，参见“Time and Organiza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vol. 14，no. 2（1988），pp. 299-320.

② G. H. von Wright, *Time, Chance and Contrad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而代之以扩展了的现在。^①

此外，正在以这种方式逃离的矛盾，其根源在于：贪婪地渴求技术和科学上的革新，渴求把它们转换成经济增长的快节奏，这既产生出不可预见的成分，也产生出革新的本质要素，并且也会寻求使所有这种革新的后果尽在掌控。我们要保持开放的视野，还没被构想的要保持其构想的可能性，而积极和消极的反响同样要得到认识，并能够预先防控。正如一个流行的政治标语：选择未来，决定未来；它暗示未来事实上是可以被选择和决定的。这样一种要求旨在开放参与式建构的视野，并且激励人们，唤起人们的想象力，这对于日常生活的单调性以及机构内与机构间的规则的紧缩构成了威胁。我们要传播的是“另类”的生活方式、“另类”的工作方式。但是，这种要被创造的未来已经发生在现在，要在扩展了的现在中决定。^②

未来正在现在中产生，这一事实处于决定未来进步的一系列进程的开端，是一个相对简短的时期，它得到了科技发生学研究的确证。起初，每个革新都存在着不计其数的发展可能，然而，它们很快就在进化选择的意义上受到了急促的限制。^③ 经大规模的竞争排除那些可行性得

① 有关该问题的更详尽的论述可参见 Helga Nowotny, "From the Future to the Extended Present: Time in Social Systems", in: G. Kirsch et al. (eds), *The Formulation of Time Preferences in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ldershot: Cower, 1988, pp. 17-31.

② Mark Elchardus 也从另一个理论视角得出以下结论：从自然的自发时间中的历史到各种体制下的时间性的转换，其结果之一是，未来再也不会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种未来的消失与悲观主义无关。未来的消失是由对下述事实的清醒认识所引发的，即：社会体系创造了它自己的时间，并且，未来观念的意义仅在于现在和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某种（相对的）不变量和某种顺序来形成连接。参见 Mark Elchardus, "The Rediscovery of Chronos: The New Role of Tim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3, no. 1 (March 1988), pp. 35-60.

③ R. Nelson 和 S. G. Winter, "In Search of a Useful Theory" of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vol. 6 (1977), pp. 36-76; Brian 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An Overview" in: G. Dosi et al. (eds), *Technical Chanc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F. Pinter, 1988.

不到证明的选择之后，即刻就剩下了有限的几个选择。时间路径被压缩而变得越发狭窄。是扩展了的现在选择了未来，而不是未来选择了扩展了的现在。

未来通过长期有目的的计划而“在时间中”被压缩了。它包括：(1)存在于时间边界划定的变动中的象征符号的建构；(2)由计划、融资决策以及有组织的行动所造就的真实预期。它们都在扩展了的现在中得以确立。因为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是变动不拘的，未来也可能在现在就被付诸行动。它们之间开始形成长期的相互依赖关系。对于所发现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有限的，当前可用于把握它们的手段也是有限的，但这同样指的是即刻到来的时期，而不是遥远的未来。由于不断上升的即刻寻求解决之道的压力，我们必须现在就发现那些可以认识到的问题，并且，由于许多已经安装了警报信号的时钟的滴答声，在一个被构想为飞逝而过的瞬间中，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容纳这些问题或者把这些问题弃之于健忘的未来了。我们下一代的未来不再主要以个体的名义得到解释（即以对于社会进步和福利的渴望来解释），而是变成了一个集体生存的问题。现在正在争论的正是下一代的时间。在复杂性和密度上的戏剧性增长，越发拉近了未来和现在之间的距离——这不仅仅是对于已经进入明年日历上的约会的负责任的管理者而言的。它对于社会的日历也同样真实。2000年或者2025年几乎触手可及。^① 基于未来产生的贷款通过未来被带进扩展了的现在，希望现在足以负担所需偿付的必要利息（以及增值的价值）。对未来的处置好像它就是现在一样，而扩展了的现在就这样产生了。

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在1912年写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他认为，人们显然是从社会组织的形式中汲取类似时间、空间这样的基本思想范畴的。因为一种时间“观念”只是意味着一种对人们周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知性把握。而诺伯特·埃利亚斯也强调说：

时间呈现出一种宇宙维度的特性，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① 大量准备用于2000年新年联欢晚会的包房，通过预定已经爆满，*Der Spiegel*, no. 1, 1988.

而恰是对经验的符号表达，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事件的连续序列的组成部分。时间是对于人们想要确定位置、间隔的长度、变化的速度，并且采取与这一时间流平行的视角来看待他们自己的方位这一事实的表达。^①

按照这种观点，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下，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一种用于定位的符号手段，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构想，它被行为、社会习惯和人际互动所巩固，并形成体制。这就是社会中存在着不同时间观念的原因，它们随着现在这一时间段对社会集合体所提出的要求的变化而变化。

就在不久以前，人们还相信，通过在经验上使社会研究者把目标对准控制理解时间问题的关键，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可以做出适用于一个社会的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不同评估。然而，现在看来，这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就能解决的了。^② 而且，未来范畴的废止及其被扩展了的现在所取代，并不足以应付所有已经产生的矛盾和成堆问题的压力。这里所启用的未免还是时间的线性概念和循环概念之间的关系。时间的线性概念和循环概念一般被认为是“文明的时间架构”的基础（Krzysztof Pomian）。它的构件可以拆分后再拼到一起，即便是穿越多重时间形式（心理上的时间，依太阳运行的时间，进行礼拜仪式和政治活动的时间，时钟时间和超长或极短的科学时间^③），在思维与时间知觉中深植的二元论还是以直线或循环递归的方式运行着。一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就足以养成这两种观点。由生到死的运动可以被设想为一个周期——实际上是循环往复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设想为从起点运行到终点的一条直线的组成部分。迈克尔·扬认为，线性强调的是推陈出新，撤下那些熟悉的、已然经验过的东西，据此看来，线性不是自我重复，其中也不存在被重复的东西。而循环性却只是带回那些熟悉的、已然存

① Norbert Elias, *Über die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英文版见 *Time: An Essay*, Oxford: Blackwell, 1992.

② Florence R. Kluckhohn and Fred L. Strodbeck (eds),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Evanston, Ill.: Row & Peterson, 1962.

③ Krzysztof Pomian, *L'ordre du temps*,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84.

在的、在人类生活中保持同一性的东西，尽管它也产生了某些新东西。^①像所有二元论一样，两种思维方式都存在着充分的说明材料，然而，站在为它们辩护的社会立场上来评价，它们也还处在一个极其矛盾的、因为易于“重估”而不稳定的状态中。扩展了的现在再也不能被设想为处在一个线性开放的、持续的未来中，因而，必须要重估并吸收循环性时间的主体部分。时间之矢无疑是持续地指向前方的，但现在是由许多循环的周期构成的。科学确证了这一点，它的报告就好像是不早不晚地为社会量身定做的一样。从时间生物学^②开始，经物理学到艺术史或者经济学，基于线性和循环性时间互补的观点，科学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

无论如何，如果在社会生活中盛行线性优于循环这样的时间观念，并且社会还配备了附属的“节拍器”，那么，对此总会存在可理解的原因。两种基本时间观念之间的对比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产生，而就在这个时期，线性定量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尽管时钟本身只是啮合周期性递归的测量设备，现在却变成了改变社会时间节奏的节拍器；^③ 尽管工厂厂房中的机器是由其机械次序在心理上的周期性递归来构造的，它们现在却恰恰被认为是内置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之中的线性的具体体现。自此，时间能转化成金钱的根据在于，金钱是另一种可定量化的媒质——交易自身的一般中介物。时间成为金钱，而金钱或多或少也能由时间来造就。时间可能从这时开始就被“合理化”了，例如，通过资本和工作任务的适当组织，时间可以“被节省”“被赢得”和“被增加”，以产出更多。计算小时或者分钟以及测量时间，由于工业化而被赋予了额外的工具性意义，这种意义直到今天仍未消失。

时间的量度本身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由于生物体自身拥有内

①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② Chronobiology, 探讨生理节律、研究人类机体周期循环的各种不同的振荡和频率。

③ 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参见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1934; 以及 David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部时钟，而他们周围的太阳和星星又具有固定的循环运动，人类创造出一套测量时间的系统来定位并协调他们的活动，这是人类早期的文化成就之一。农业社会就明显是通过周期性循环的季节而在时间的量度中定位自身的。除了协调这一实践功能以外，时间的量度也一直被用于把一个社会自身的社会秩序和时间周期投射到宇宙和自然界，之后就能把神圣的自然秩序提升为构建社会时间体制的标尺。牧师的权力源自他们作为时间给予者所具有的知识和职能。结果，从确定宇宙与人类谐和的“恰当”时机、把“神圣”的时间从世俗的时间中剥离出来，到体育竞技中的创纪录或者只为了传递信息而探明感知的跨度，时间的量度作为一套时间上的度量衡而被标准化了。现在有所变化的只是量制单位和设备。量度本身由所引入的各动态连续体的关系所产生，可能存在诸多不同种类的关系，其中一个成为余者的参照点。^①在另一些文化中，用做参照点的各种度量单位数量惊人，如此一来，多种时间维度都得到了测量。只有科学的时间量度最终简化成了一维、均质化、线性的物理时间。

因此，社会中主流的时间观念受到所使用的量度单位的强烈影响。线性化、均质化的动态序列的连续体成为科学的时间测量的基础，无论如何它都不再局限于物理学了。所有其他的测量程序都要回到它那里，它被做成了机器和科技设备，并与测量本身的观念连接起来。测量对象有很多：从投票数目到国民生产总值，从《吉尼斯纪录》中所载事件到详细的预算支出。线性化和均质化的量度单位的观念也已经占领了历史。年表时间被看做是在世界历史自身中发生的所有事件进程的最终的、权威的参照点。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对年表时间的评论中认为，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时间正合历史学家的口味，对于流动时间，他们具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把不可逆转的流动的形式品质转化成内容的渴望。这是要有能力把握总体历史进程的渴望，以便把个别的特性归结到总体的历史进程当中。这些特性可能由内在可能性的展开而获得，也可能从一个更好的未来方向上的进步观念中获得。即使是黑格尔，或相对来说更具现实性的马克思都没能抵挡住诱

^① Elias, *Über die Zeit*.

惑，而试图全面地揭露、抓住并构想历史进程，毋论其他人了。因而，年表被赋予了第一位的“实质的”重要性。^①但日历时间是空洞的，是没有内容的皮囊。一个动态连续体用做其他连续体的参照点，这使得它们在时间量度中进入彼此关联的状态。不管它们是单纯用于确定日期、分割时期还是用于解释说明，都不能任意选择。它们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是“优越的”，并且，它们是相应一个社会的社会组织、它的权力构建、它的价值体系和它内在的发展动力而被造就的优越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被赋予它们的重要意义并非为它们所独有。然而，一旦它们获得了某种重要意义，这种状况就会持续地对其他解释产生影响并遮蔽其他解释。有关线性与循环性的关系问题就是如此。正如从过去经现在指向未来的时间之矢，至今仍无法明确标识个体的不同时期的分界线一样，线性从一开始就不曾排除周期性循环。但要从人类的意义归属中把它提取出来却是不可能的。每个时间概念都得适应不可逆的变化的观点和重复的观点，因此，它们符合可再生的物理学时间。无论如何，社会能够在某种限制之下进行选择，反复地建构它们的时间和改变这种建构。

就人类而言，很难决定是否“封闭了的”过去所遵循的逻辑与总是不确定的未来和时常掺有“杂质”的现在完全不同，因为它可能会受到人类行为、信仰体系和观念的影响。^②即便过去结束了，它也还是能够通过长期的历史进程来规定现在所发生事件的边际条件。另外，显然可以用一条流动的分割线把未来同现在分隔开来，未来允诺富有全部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但只有有限的一些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存的现实。分离的过程就是社会学所谓的“结构化”（structuring、structuration）。^③这样

① Siegfried Kracauer, “Ahasverus, or the Riddle of Time”, in: *Histor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② Lars Clausen, “Prognose und Epignose”,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vol. 12, no. 4 (1987), pp. 211-219; Gerhard Schmied, *Soziale Zeit, Umfang, Geschwindigkeit und Evolutio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5.

③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一来，时间在现在就变成了“创造和毁灭的可能性，不确定和决定的源泉”（Elchardus）。它容纳了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被从对过去的重构中去除掉了，而且在方法论上它也不同于对过去的重构。扩展了的现在强调结构化的必要性，还有结构化的可能性。它努力要通过唤回周期性来减小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寻求把周期性与线性结合起来。现在不再仅仅被解释为通向未来、迎接进步的直线路径中的一部分，而是被解释为循环运动的一部分。此外，年表定位变成了中性背景的年代测定，从而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过多负荷（在意识形态束缚下的世界历史直到最近才遭到阻遏），各种事件与这种年表定位相互重叠，从而可以解释为一个循环周期的组成部分。它们被看做是一个演替过程或一个序列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或序列遵循“自己的时间”，具有自身的时钟，或者以现代用语来说就是其自身的程序或时间代码，上溯、重复和下推，或者是完成，都由这种程序或时间代码来决定。

这里正在发生的是令人震惊的社会变化。社会处于时间匮乏状态，与各种时间矛盾纠结在一起，它正使用新的策略来努力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处境。现在正得到扩展，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出迫在眉睫的决定。然而，它目前既根据年表的线性方式得到说明，也被解释为全部遵循其自身持续时间和标准发展曲线的循环周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也正得到扩展。当前的年代测定不再仅仅参照日历时间，它还要参照“内部程序”“基因密码”的时间（对个体的生命期做出指令的时间）。这里展示的新互补也适应于“个人时间”体系，并且因此，它们在年表的线性序列中的定位变成了背景噪声。因为意义归属转移到了周期，转移到了产生出某一系统的相连事件和过程的个人时间，时间的多元性也就自然地增长了。许多人认为时间必得面对线性，线性实际上通过工业化和同工业化相关的、审慎地与周期性的时间和周期性相关的生活方式仍然在社会生活中保持着主导地位。这样看来，它们的基础应该可以通过社会存在物的生物节律揭示出来。社会将会通过习惯所具有的周期循环而获得稳定性。由于习惯过分受到社会评价的影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稳定不是静态的稳定，而是动态的稳定。^①

① Young, *Metronomic Society*.

周期循环的观念同神话一样古老，同哲学中所发现的连续性一样陈旧。无论如何，循环时间的发现不是也不可能是新的，实际上，周期就是自然的、宇宙论的、生物学上的事件序列的组分。即使是对社会节律的再认识也可以认为是补偿性的渴望而不予考虑，这种渴望充满一个已经开始厌倦节拍器统治的社会，或者，也可以解释成一种无害而讨人喜欢的保守主义形式，它力图依靠习惯作为社会稳定的因子。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可以不用费力地找到这个观念的先驱，同样也可以进行经验的观察。特殊的经济危机形式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很早就给社会科学留下了深刻印象。看似有规则地重现的社会生活的其他现象也得到了观察、记录和统计学研究，如：战争、作物减产、叛乱，也包括出生率和死亡率、犯罪率和离婚率的季节变动，这刺激了社会科学的想象力，去记录更精确的数据并探索隐藏在其中的法则。单单从对于经济事件的深远意义的强度来看，得到大力检验的正是周期性的经济起落。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杰夫以及在他之后的熊彼特（Schumpeter）（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循环的搏动节律。所谓“长波”的形式假定，每隔55年左右，就会出现对于经济事件具有持续影响的技术革新阶段。康德拉杰夫自己在1928年否认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周期性与社会世界相应这样的主张；他通过“规则性”理解特殊事件或现象的按时重复。从那时起，借助于精练的统计学方法和扩展的数据基础，长波已经进入研究文献的小海洋。^①事实上对于康德拉杰夫自己来说，问题在于能否从对周期性事件（要么在严格定期的样式中复现，要么至少显示出依次交替的阶段的循环再现的序列）的观测中得出周期的形式和长度的结论，从而考察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

物理学家凯瑟尔·马切蒂（Cesare Marchetti）正根据广泛的证据考察对于循环的社会“脉搏”的认知，其涵盖了两百年间的人类发明以及技术和技术以外的革新。他激进地声称自己已经用一种可计量因而也可

① 调查可参见 Joshua A. Goldstein, *Long Cycl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社会科学著作可参见 Renate Mayntz, *Soziale Diskontinuitäten: Erscheinungsformen und Ursachen*, Cologne: Max Planck 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discussion paper 87/1.

检验的方式回溯了西方工业社会中高层次的自组织。他所用例证的种类和数量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证包括：一个汽车群体或计算机群体的问题，或者是一个从木材到聚变能的所有最重要的能源的替代的问题。但一个“群体”也可以是哥特式大教堂的系列建筑、罪犯的职业、由科学家开列的出版物目录以及由艺术家开列的艺术作品目录。康德拉杰夫周期的基本图式（发展、完备和衰退的逻辑曲线的样式）无所不在，马切蒂认为，他自己已经发现的那种社会革新活动的“内部时钟”表明，在正弦曲线最低点的是一个衰退期的终点，与此同时，它也是下一波革新的起点。随着曲线的上升，革新所产生的产品将打开新的市场，而这又会创造出新的就业和投资。社会所具有的这种“大节奏呼吸”可以从进化论的视角得到解释（包括马切蒂在内的解释）：我们将在不同层次的抽象上发现的生态位（niches），不仅存在于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存在于社会的进化过程。不管是细菌、汽车还是产生能量的超级技术力量，这些被观察的群体首先发展壮大到他们试图“殖民”的生态位。其他竞争者也纷至沓来，他们要么已经处在这个生态位，要么同样再往里面挤。以洛特·沃尔泰拉（Lotka-Volterra）命名的一个逻辑方程描述了殖民群体达到饱和点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它本质上是一个扩散过程的问题，因为它们比突变（技术革新）或选择（对革新的测试）更容易衡量和计算。假使一个生态位已经饱和，那接踵而至的竞争者就应该有能够成功地取代这个能力不足的群体并最终填补这个生态位的良好预期。方程看来如此简单：所有事物都遵循这个逻辑曲线，如同霍尔丹（Haldane）早在1924年所得出的生物学结论。这就是优胜劣汰。^①

无疑，上述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可预言的）循环现象的研究（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研究的结论或者获得这些结论所使用的方法），都拥有智慧和知识上的强大魅力，甚至早期的统计学家们也深受震撼，那时还完全以“因为上帝之美”这样的辞令来解释看似可认识的

① Cesare Marchetti, "Society as a Learning System: Discovery,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Cycles Revisited",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8 (1980), pp. 267-282; "The Future", Laxenburg: IIASA June 1986, mimeo.

出生率和死亡率。^① 然而，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如此难以捉摸的社会生活中，成功地采取行动或者要成功揭示不依赖于我们人类的意志或目的而存在的规律性之美，那么，其中存在的风险总会多于科学预测的魅力。

探索技术和整个技术体系产生、成长以及由于被后起之秀（在回溯意义上的）取代而消亡的“内部时钟”或者说本征时间，就是要尝试寻找周期性循环的规则，并通过努力获得它来运用它。还要进一步尝试认真对待那些被线性所拒斥的问题：解释停顿和间断性，与其相比，认识成长和衰退的曲线要相对简单得多。要追踪一系列技术、科学和艺术上的革新的本征时间或者整个工程体系的本征时间，也意味着使这种规律性中所包含的时间规制内在化到可以把它们纳入“能以方法、组织和机构的手段来增进，并通过加速的方式得到凝聚”的事物中的程度，正如在机器时代初期所明确表达的那样。不过，这也不再仅仅是加速的问题。减速也可能是恰当之举，这全赖产品处于“年轻”“成熟”或者“衰老”当中的哪一个阶段而定。在相关文献中，经济学家用上述这些拟人化的术语来表明，技术的“生命周期”研究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市场策略和市场分析的自明的组成部分。^② 力争“延长产品的青春期”无疑是在美国与日本竞争的特定阶段代表美国经济利益的目标。当然，还不尽如此。

在机器时代首当其冲的时间规制和当今工业生产所面对的时间规制的区别之一是：在工业化革命期间，时间规制存在于人们对于生产所需要的机器，以及机器生产的经济状况所提出的时间要求的被逼无奈而又痛苦不堪的习惯化过程。它以对守时的艰苦学习为先决条件，孩子们从小就在学校养成守时的习惯（为工作生活做准备），这是一个用野蛮的方法实施的过程，并且要求有极端漫长的时间来导向在今天已经变成理所当然之事的那种国际化。今天再也不存在作为一种“美德”的守时了；它被想要参与工作生活的全体生活成员预想为一个自律的要素。如

① 参见 Horst Kern,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Munich: C. H. Beck, 1982.

② Robert U. Ayres,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Ballinger, 1984;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今，人们的努力不再用于关注人类，而是全神贯注于按照时间机制进行的革新活动所必备的条件和后果。人们要对某种产品或者市场的生命周期中的时间表进行调研，而后使其变成可控制的。人类的身体和心理的适应力都预先得到假定；他们已经根据时间得到了充分的规制。现在必须要关注的是体制的适应力：对市场的适应力、对品位与时尚的影响的适应力、对已经熟识“一次性用品”的社会的人为过时的规划的适应力等。革新与市场要服从上升、饱和、下降的时间规制。我们必须预先学习它，而为了能学会它就必须要对它进行考察。

技术的生命周期要同时面对其他的超级大周期（super-cycles）和金融圈中的小循环（epicycles，风险资金必须要在这一创生和“毁灭”，以保持利润周期的活性）。这样看来，商品、服务、就业和资本的生产，都服从单个庞杂的循环周期，受到子系统具有的个别生命周期的控制，并且在买卖交易的“恰当”时机被决定。一种非常复杂的制度化操控的时间管理，试图从这些周期在时间上的相互依赖性中认识它们的相互联系，以便能够实施区间控制的策略。即：在认识到这种增长是内在的周期性增长的结果，其后也将在经历下降并被淘汰的前提下，意图通过控制时间的速度来由计划和管理获得增长。如果说学会控制一个周期中的加速是可能的，那么，时间规制扩展的余地就更大了。时间生物学和时间社会学与时间技术学汇集到一起，这对于机器时代的线性并不适用。当所谓人一机系统很早以前被结合成一个更大的组织的复合体时，人们感兴趣的就不再是与机器互动的个别工人，而是制度和组织的时间规制中所存在的革新的各个阶段由以发生的本征时间。生物学的隐喻不应该诱导我们把线性看成是“硬的”时间规制，而把循环性看成是“软的”时间规制。同历史年表一样，它们毫无内容，它们是（首先是）空洞的。

用统计方法、启发法和仿真法使各种过程模化，这已经越来越多地用于处理意外现象、过程不连续的现象以及令人惊讶的现象。线性的趋势外推法（linear extrapolations trends，结合由时间序列和现存体制中具有可比性的部门分析所产生的各种参数，用以进行推导的方法）被认为不足以应对在世界体系层面上多变的画面。人们的兴趣点可能并不是可以根据线性来推导的预测，而是偏差和可能在偏差中发现的规律性。惊讶可能发生在个体、机构或者整个社会身上。要把它们融入预测，就

增加了为它们做准备所要求的可能的测量范围。预测，甚至是对意外的预测，与可能的控制之间形成循环，这个循环开始原地兜圈子：这就是扩展了的现在的问题。

然而，与此同时，还有必要处理那些已然发生了的惊讶。回顾过去，最大的惊讶之一，很可能是“甚至进步也会老化”这一认识的变现。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一语双关地说：进步已经变成了引出糟粕之物的先声（pro-gross）。不断的革新产生了各种新的退化问题。老化和过时的工业以及建有或曾经建有这种工业的地区就像俯拾皆是的垃圾倾倒地，它们是革新的另一面鲜明表现。在海洋中储藏最危险的废料已经变成一种带有致命后果的推理游戏。如果对当前这个康德拉杰夫循环终点的预测应验，那么在 1995 年左右，不仅会开始一个集中的技术革新新阶段，也会有许多公司作为有组织的单元而“凋敝”，会有许多就业岗位被“毁掉”。社会会为这些问题还有老化的问题而付出高昂代价。就像人类老化以及工业国家中的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社会老化现象一样，进步的老化正缓慢地为公众所意识到。这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个体的经验。为数不少的少数人所具有的期望水平，由于他们进入老年而整个缩水了，而技术的老化过程正被后续的技术革新所加速。

要在一个社会接受的参考尺度上来衡量老化，这个尺度通常是属于日历时间的年代顺序。但是，当我们要把握暴露出来的社会和个体的差异时，提取这个层次就没有意义了。总之，是文化上的界定把老化同过时区分开来。过时意味着老化过快，超出了所预期的平均速率或有悖常规。如果现在的各种技术、公司和地区都老化过快而明显“过时”，就像人们的职业资格和人生中所获得的知识一样，那么，就能貌似合理地假定：老化的标准取决于革新的数量。革新的速率越快，过时趋向的增长越快。

这引发了一个社会的文化成熟所隐含的问题（另外，这个社会是否学会了克服它自己的废弃物问题也是文化成熟度的显现）。法国古生物学家勒儒一瓦高汉对人类早期在这方面的一个进化上的飞跃有精彩描述，他写道：

我们拥有对莫斯特时代的三个居住点的精确记录，其中一个位于顿涅茨河（Dnjestr）上的摩尔多瓦的野外，另外两个在

岩洞中：法国约纳省的史前洞穴群中的土狼洞穴和驯鹿洞穴，它们形式各异，在苏联的居住点是一个直径大约 8 米的环形区域，很显然是搭建帐篷和小屋的地点；土狼洞穴中的居住点位于一个直径 5 到 6 米的大厅里，而驯鹿洞穴中的居住点位于 2 米宽、5 到 6 米长的坑道部。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但三者也显示出了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含有一个中心区域，火室就设在这里，并且这里相对远离动物残骸，其中堆满了石器；这个中心区的周边环绕着密密麻麻的骨骼碎片。如果我们无视摩尔多瓦必定存在过的这种结构，那么，复原出的图景就会相当贫乏。穴居人生活在他们残余的猎物中间，他们把这些残余物向外推开一点就创造了一个居住空间。

公元前 3 万年时期的居住地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反差：

整个空间经过了仔细打扫；在这个空间外面，我们发现了更大的垃圾堆放点在一些斜坡上星罗棋布，这些斜坡就是“垃圾场”，带有石片和碎骨的几堆灰烬散布其中。进化中的瞬间首度形象地再现在眼前，这个瞬间同时也就是从周遭的混乱状态划分出居住地的那一刻。人类作为空间组织者的作用以对空间的系统安排的形式呈现在这里。^①

如果我们赞同勒儒一瓦高汉的观点，认为定居点的组织不仅涉及技术上的便利，而且涉及语言这一普遍人类行为的符号表达的便利，那么，显然这种空间组织首次充分满足了成为定居点的三个要素：“在技术上创造出有效的环境，……赋予社会体系一种框架，并且……从单独一点开始，在周围的世界中创造秩序。”^② 在各种情况下，甚至包括今天，能否把对废弃物问题的解决看做是文化演进的转折点之一？所有工

① André Leroi-Gourhan, *Geste et la parole*; 德文版: *Hand und Wort: Die Evolution von Sprache, Technik und Kunst*, Frankfurt: Suhrkamp, 1980, pp. 396-397.

② 同上书, p. 397.

业部门都在忙于处理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废弃物，把它们运走、降解还原、永久处理掉。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废物循环利用的新方法，废弃物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产生，不管是气态的、液态的还是固态的，都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转化：要么再度用于生产，要么以安全的残余物的形式到达外部世界。而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废弃物的毒性长期存留，它的致害可能性的消失异常缓慢。文明的进程被诺伯特·埃利阿斯描绘成外在限制内化为自我约束的渐进过程，它发生在人际交往的不断整合过程中，发生在使自身得以确立的核心权力部门的垄断的建立过程中，这种文明进程会把个别的整洁度标准持续延伸到可自主的国家领土范围之外吗？文明的历史进程是盲目但却不无方向的、长期的社会进程，它的运转毫无目的，对于参与的人们来说，它的最终结果既不可预见，也不在意图之中。

如今，从来自不同兴趣领域的那些参与者的多样化的观点来看，人们的希望一目了然。然而，任何总体的计划，任何“宏伟蓝图”，不管初衷多么好，在其实行过程中都同样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废弃物的生产所带来的影响既不管空间领地的限制，也不受时间上的制约，它们无视国家主权和议会任期的时间跨度。但是，控制机制可以出自国家政府颁布的法律或者禁令这样的法定条例，也可以通过市场的经济刺激来进行引导，要么在领土方面得到限制，要么就像跨国公司，不受某个特定国家的辖制。诚然，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意识，不仅能对自己的直接行动负责，而且能对下一步的行动负责，此外，行动和意识彼此负有独特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受到周围环境更深层的限制，所以，洞察问题本身不足以必然地带来适当的行动。另外，科学和技术上的解决方法（它们是最重要的进化载体之一）就其本身而言，并非产生于社会真空中。市场条件和经济利益，发展的提前期（lead times）以及这种发展与现存的废弃技术的竞争关系，构成了经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多重相互依赖关系。外部限制内在化，然而，在面对废弃物问题时，个体化的自我约束也很可能不足以带来文明的进步。另外，以集体的方式规定的自我约束要求协调与控制新机构和新制度机制的发明。它们既不能被自愿地建构，也不能以反社会的面目出现。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它们的出现不能忽视现存的权力结构，这些权力结构被再生产出来，但在某些条件下也会持续发生分化。

这些条件之一就是时间的条件，即：同所推算的革新事件的周期相关的问题日益紧迫。废弃物的规律性生产是可以预见的。在此，这个假定同样可以作为“能够充分理解”“令人惊讶的独一无二性”的前提，以便为之做好准备。在一个对革新着迷的时代，产品、技术和能力的老化，废弃物的形成，这些现象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在充分理解之后呢？充分理解会带来试图以时间性的方式控制老化过程的解决办法。“成功老化”是为人类老化过程锤炼的最适当的箴言。通过对特殊功能和过程的人为加速或减速，消极的影响可能被压制；通过认识系统或子系统的各种不同的本征时间，就能获得更好的时间上的协调。然而，根本的问题——被机器时代的线性长期隐匿的问题，才更具有普遍性。与有机体或有机成分相比，机器能够装作不知疲倦和不朽。在另一个生产领域——符号生产这个领域，情况则大有不同。艺术上的生产永远不会跟随机器的线性。艺术作品，更确切地说，是它们的元素，可以按序列化的方式来排列，正如艺术史学家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在一个有趣的分析中所提出的，这些作品轮番上阵，再现了它们彼此交替的风格上的走向。从革命的新起点开始，经由成熟的发展，到最后衰落，每一种风格趋势，每种序列都由相互关联的艺术现象组成，这些现象再现了试图为属于形式或者内容上的相当具体的问题，找到答案或者提供解决办法。周期性的传承极其复杂，因为，每个序列除了决定着一种风格趋势之外，还需要为下述问题找到一种答案：

事物的出现取决于我们对于发明、重复和丢弃等过程的态度转变。没有发明就只剩下老套；没有重复就没有足够多的人造物；而没有废弃物或丢弃物就会留下太多没用的东西。我们对这些过程的态度本身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以至于我们面临着双重困难：记录各种事物变化的困难和追踪有关变化所带来的观念变化的困难。^①

① George Kubler, *The Shape of Tim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库布勒的分析针对的是美学而不是他称之为“有用的发明”的技术学。但若以“我们的态度”来调和这些过程，这里显然存在着相似性。重复是渴望回归熟悉的模式，而发明是渴望通过新变动来逃避老习惯，这两者之间固有的张力既是符号生产的特征，也同样是技术生产的特征。同时，这种张力也是线性与循环性之间互补作用的基础。社会通过构造一套复杂而又精致的习俗惯例来避免个体遭受过多的变动。但是，自工业革命的“陀飞轮社会”^①出现以后，我们也很容易能找到许多这种张力在其中脱离平衡态而转向极端的例子。那么，把某物抛弃掉，即把它们从循环中消除的决定又如何呢？抛弃也总是含有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因为曾经有价值的某物由于这种转变而被消解了价值。早期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了繁复的仪式以维护某些事物。许多史前文化中的葬品和祭礼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现今许多事物都被丢弃了，而有另一些事物则被列入了保护条令：日常用品、动物还有知识，因为它们属于某种濒危文化而突然获得了文物的价值。因此，在一个循环周期的终结处并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空隙：使得在集体记忆中，至少是受到毁灭威胁的部分“种群”的集体记忆中所储存的大量符号和现实的可能性得以存在，或许就在博物馆里让出一席之地来储存它们，像被期望陪伴死者往生的陪葬品一样。

我们发现了周期的迷人再现，进行了旨在系统地揭示技术制品、观念和艺术品传承的“内部时钟”的考察，并详细说明了种群和系统的本征时间，但我们的社会并未因此而免于面对使这些周期协同的困扰。如今的情况恰恰相反。废弃物的问题更突出了，每个社会在革新、重复和删除（即毁灭）的相对速度上必然发生彼此对抗的相互抵消。这不仅仅是形成相对加权的问题。由于开放的未来这一范畴的废除（该范畴隐匿在时间线性的观念之下主导着机器时代），三个过程全部拥堵到了扩展的现在。发生在现在的革新速率越来越密集，在材料和被预期的隐喻意义中的废弃物越来越多，与废物处理相关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这些同样发生在现在。随着周期的重新发现和现在的扩展，为了

① 陀飞轮是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宝玑在 1795 年发明的一种钟表调速装置。“tourbillon”有“旋涡”之意，陀飞轮是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译者注。

达到革新、重复与淘汰三个过程之间的新平衡，致力于适时地产生出一些机制来获得社会的解决方案的尝试已然启动。发明物，亦即技术上的革新物，是可以明确地以其不可预测的方式而为人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并且尽快地控制它们的积极和消极的效应。就时间性来说，这种提早认知的预见能力被挤压到了技术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可能性已经自我显露出来，只是还未能付诸形成，这个时期就是在扩展了的现在中正在生成的时间。废弃物的问题迫切要求尽早认识和防范，在废弃之前寻求收买权（pre-emption）就是防范措施之一。然而，废弃物能在一条革新曲线的开端就得到恰当的认识和处置吗？必须把革新从不可控的技术和社会的增长转换为有计划的、合理的改革。如果必须在革新过程一开始就通过规避或者治理的技术使废弃的问题得到解决，那这个问题就更难处理了。从某一数量级开始，废弃物处理的价值就再也不能外化了。越来越多的命令和控制，越来越多的过程管理也都在这里提上了议事日程，这里的所有事物都迫切要求提早得到认识、防范和收买权。然而，这里要求的是怎样的选择度呢？选择所运用的标准又由谁来决定呢？此外，谁又能保证创造力的根基不会连同其所固有的肆意生长的杂草一块儿被移除呢？

在机器时代，时间线性的观念盛行，因为，根据经济法则，时间首度与金钱画上了等号，并因而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间=金钱”这个等式在机器的运转中起效，而这些持续不断的运转面向一种开放的未来视野。在19世纪，科学、技术和工业已经在经验上成为进步观念的可变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发明的普遍的经验主义原则是：它们不能预先确切地计算出进步，但它们承诺未来的进步。其实，可以说，恰恰是未来进步不能被经验到这一事实得到经验上的证明；它的可靠的未知确保了它的实际发生的结论。^①

无论如何，今天还是流行着想要尽早地甚至是在扩展了的现在就认识到后续效应，以便把它们引导到希望或者不希望的航线之中的急切愿望。新事物已经如此之多，而且还在更多地被生产出来，以至于旧事物

① Reinhart Koselleck, “Fortschrit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79, p. 410.

将会变得更多。因此，寻求限制的压力正在增加。有限性的概念正在进入时间概念。然而，因循线性思维，错误地以为答案就是更少地产出，从而仅仅停留于限工或者限量是不够的。在这里，周期性力图提供一种补救的良方。它给出了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把尽早使得革新的过程变得可预测的必要性考虑在内的视点，以便学会控制可能引发令人惊讶之事的各种前提条件。因而，现在还要被进一步扩展。然而，把生成的瞬间转化为选择的决定性瞬间是有风险的，这起因于诊断与预后设备的匮乏，而源自人类行为之繁多可能性的复杂性也容易令人惊讶。创造力有许多表现形式，而失误必得保持在可容忍的程度，系统也要经得起失误的校验。另一种备选方案试图接受结束的命运，拿进化中的跳跃来冒险，并力图为废弃和过时这一问题找到适宜于一种科学和技术文化的解决办法。在这里，仅仅以维护为目标的定量的线性观点也不足取，因为这涉及有多少东西、是什么东西要被列为历史遗迹而塞进博物馆人为地保留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能量、物质与知识的转换问题。它是一个对废弃物、对生产该废弃物的技术规程进行重估并加以转换的问题，同样也是对制度的、经济的刺激和某种转变了的社会意识进行重估并加以转换的问题。周期性的时间观念提供了回流到周期性过程的模式——再循环利用的模式。时间在这里得到这样的注解——它成为各种周期的限度，这些各具特色的周期除了相互影响之外，还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最后，经历衰退或者饱和状态之后，某些新事物才能开始。但是，这种新事物不再如进步信念所承诺过的那样，是轻松自如的新。它是新材质进入旧材质的流通过程，它不是持续产生线性影响的过去，或者某种传统的载荷，而是某一革新周期再生的本征时间。只有这样，新的社会存在形式才能从多重时间的扩散中涌现：在扩展了的现在而不是在未来的涌现。

第三章 新时代的克洛诺斯之忧^①

一切有限的知识……在混沌力学系统下都会遇到同样的限制：在由于系统的内在动力而产生的进化时代过去之后，个体的发展便失去了它的意义，留下的仅仅是进化概率的统计计算罢了。

——普利高津和斯唐热
《时间与永恒》，1988年

当科学社会学家去实验室观察直接在现场工作的科学家们时，另一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对这些问题，本章将展开讨论。人类学家所做的也与此相似：为了能够揭示神秘的风俗习惯和弄清奇特的符号构造，他们会去探寻一个陌生的部落；为了实施观察，他们首先必须对“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的传统区别作出界定。不过，即使不能完全否定巴什拉^②(G. Bachelard) 意义上伟大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巴什拉借此区分了人类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门外汉

① 克洛诺斯（古典希腊语：Κρόνος；拉丁语：Kronos；英文：Cronus）是时间的创造力和破坏力的结合体，吞噬一切的时间。他是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盖娅的儿子。曾受母亲的怂恿，用镰刀阉割并推翻了父亲。因预言他也将被自己的孩子推翻，于是子女一出生，就被他吞进肚里，只有宙斯幸免。——译者注。

② 巴什拉（Bachelard Gaston, 1884—1962），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巴什拉认为，科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关系的学说，认识论应建立在实践过程中的唯理论基础之上，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我们精神的认识过程。他的代表作是《新科学精神》。——译者注。

与专家^①，它至少也应该被相对化。在实验室的大门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将科学世界与社会区别开来？不可否认的是，象牙海岸的当地巫师在召灵仪式（inspection of a dead person）中使用的咒语及他对死者所做的仔细检查所能产生的效用，与加利福尼亚实验室里用激光治疗癌症患者以及借助 DNA 探头研究基因所产生的效用是不同的。与从前所有的神秘实践和社会及宗教的移情能力所能起到的作用相比，科学所发挥的作用要高效得多。但是，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功能差异？实验室的诱人之处在于社会在这些领域中的渗透。科学如何才能起作用？本身并不属于社会秩序的“自然现实”又是如何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有关这些方面的知识是可以通过研究社会实践以及知识生产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影响得出的。

服务于生产自然科学知识的实验室领域原来只有科学的“原住民”（natives）才会涉足。在实验室的观察式考查和发现，观察首先所能提供的是看得见的东西：科学家的行动，他们在操作仪器、测量和控制自然进程过程中的手工实践——这些自然进程一开始是不可见的，通过测量科学家使它们变得可见。科学社会学家进一步观察的是科学家记录和表明的东西：各类绘图与图表，包括借助于信息技术生成的照片和图片。

这些绘图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可以是研究现象的深层结构，也可以是研究现象的表面关联。它们描述的是测量过程中在为此设计出来的仪器上所显示的“记录”。当然，这些被如此记录下来的“标记”必须经过说明和解释。服务于同样目的的还有科学家之间的讨论——他们共同完成的“事实形成”过程中的“谈判”：通过对此前调查和发现的内容的转述，一篇科技论文就完成了；科技论文在科学期刊上的发表虽然是该论文成为可以被讨论和批评的科技文献，但也形成了一个“事实”^②。

① 巴什拉提出的概念，指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所经历的由意识形态到科学的根本转变。巴什拉指出，认识论必须接受下列公设：对象物不能被视做“直接的”目标，换言之，朝着对象物的进军起初不是客观的。因此，应当接受感性认识和科学认识之间的真正断裂。——译者注。

②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9; Karin Knorr, *Die Fabrikation von Erkenntnis*, Frankfurt: Suhrkamp, 1981.

正如科学社会学家所观察和解释过的那样，这样一种在实验室中完成的科学工作的图解进程来自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① 的空间模型。布鲁诺是这一方向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对科学知识形成的过程做过细致的阐述。根据他的观点，与其他创造知识的实践相比，自然科学的成果源于它能够成功地使某些自然现象“可移动”（mobile）起来，也就是说，将自然现象从其被发现的地方提取出来并运送进实验室。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所创造的是可移动的、能被运输的自然。有时，事物和现象会在这个过程中改变其存在形式、性质或者其他特征。失真的现象是可能发生的，但科学家们会尽可能地进行修复。虽然科学家所期望的是能移动的自然，但自然现象的本质应该被保持下来。也就是说，那些制造出来的可移动的自然应该尽可能地在保持其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输送到实验室，因为在实验中自然现象的运动才会被记录在纸上。自然现象在实验条件下给出的答案，是可以以迹象或图像形式被记录下来的。摄影记录了运动的过程，许多在自然界中形体巨大的自然物会在实验室中被缩小，以便适应人类的感知尺度：通过核心的微型化环节，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可以进入实验室。这样的事态发展标示了一个普遍的趋势，那就是所有的科学都可以发展成“实验室科学”。如在天文学中，运用计算机成像技术或者太空望远镜，科学家们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对现场观察的依赖。^②

在科学社会学家看来，自然科学取得成就需要两个工作步骤：一是使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变得可移动，并将其引入实验室；二是与第一点相伴随，通过设置合适的提问和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法，提升自然在实验室条件下会释放出来的信息值的获取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空间的”变化首先是指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被运输和转移到实验室中。早先，发现旅行者会将他们在考察过程中看到的神奇事物的副本——至少也是这些事物的绘图与详细描述——带回出发地；今天，科学家可以借助于远程

① Bruno Latour, “Les vues de l’Esprit”, culture technique, no. 14, june 1985, pp. 5-19.

② Karin Knorr, “Da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Labor als Ort der, ‘Verdichtung’ von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vol. 17, no. 2, April 1988, pp. 85-101.

操控的观察工具和传送工具把自然运回实验室。这种进程中内含的加速现象，主要是通过工作组织化实现的：其结果是自然现象向实验室的运输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然而，在这一进程中，还存在一个时间维度。知识生产进程的加速能力还源于被送往实验室的自然现象会与研究人员发生一种文化关系，源于自然现象会由此获得实验室的社会时间的暂时性特征。通过运输过程的可视化和数字化，研究对象被置于实验室的行动背景下，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将维持这些研究对象在场：

此外，研究对象在实验室互动环境中的接入（integration）与重组（new constitution）还会增加清楚表达的可能性选择。互动环境是时间上结构化的、具备加速能力的环境，互动环境的具体化是通过参与者有序的表达变化实现的。^①

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电子传输网络接收、传播和交换各来自太空的观察与测量数据；正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能够同时就一个共同的知识前沿问题开展研究。

这种在劳动分工中内置的（built into）同时性的极端形式是否是天文学所特有的，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因为开普勒（Kepler）^② 在 1608 年向法布里齐乌斯（Fabricius）提供他的观察数据时就曾提出一个简洁的问题：“当并非所有人都能做所有事，事情会如何？”^③ 无疑，内置的竞争机制也有助于知识生产的加速。但是，在观察科学实验室过程中所能得出的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实验室化的研究对象在研究者的社会暂时性中的嵌入，也不是实验室化的研究对象在追求接近同时性劳动分工的工作组织中的嵌入，原因在于：此处的科学研究过程与工业生成程序

① Frank A. Dubinskas (ed.), *Making Time. Ethnographics of High-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开普勒是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1571 年 12 月 27 日生于魏尔，1630 年 11 月 15 日卒于雷根斯堡。发现了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并且提出“开普勒定律”。——译者注。

③ Hans Blumenberg, *Lebenszeit und Welt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6, p. 236.

相类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室中不仅形成了一个单独的、能借助于微型化或其他技术与自然界中遥远的、或大或小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空间，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时间结构。当人们在实验室的行为背景下能够成功地维持研究对象的在场，实验条件和控制可能性就会有显著的扩张。如果人们能在实验室里处理研究对象的时间结构，那么研究对象的表达能力就有了提高。一旦现在是可以人工制造出来的，那么，其他的时间尺度就可以被观察，时间序列就可以被重复，时间过程就可以被加速或延缓。科学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了它自己的时间，这种时间不同于作为“文化的互动形式”的时间，也不同于研究人员自己的“地方时间”。为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而创造出来的实验室时间本身更多地属于一种科学—文化建构物。当研究对象——不管以何种改变了的形式离开实验室，并作为人工品在社会上继续起作用，实验室时间就开始反过来影响社会的时间性。实验时间有它自己特有的时间需求，就像在实验室中，这种时间需求所要满足的是持续的可获性、可近性和研究对象在场。

事情原来并不是这样的。正如布鲁门贝格所注意到的那样，虽然科学在很早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的时间需求，部分甚至出现在向近代科学的过渡期，但起先的时间需求和时间结构都是过去取向的，在启蒙运动时期，这主要是出于弥补理性的需要。这一时期还未涉及为了纯粹知识的原因而筹措与创造时间。当科学理解了如何兑现它们的时间需求，那总是因为科学发现和创造的时间结构及其特色会反作用于和锚固于社会经济的互相关系与科学实践之中——通过科学实践，每次兑现的时间需求也都可以转译成社会需求和对时间结构的需求。这些科学内容庞杂，从机器工业时代丰富的意识形态到建立在工作时间规则基础上的具体思想体系；从用圆规的逻辑学到快速计算器。从开普勒和哥白尼开始，天文学就尝试着使实证观察数据不仅与理论的要求保持一致，还要与正在孕育之中的社会“转折”相吻合。历史上，紧跟在天文学之后的是地质学。现如今，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和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是广阔的实验科学的知识前沿，科学的时间需求也是通过知识前沿表达、型构和操作化成实验时间的。19世纪30年代发生过一场激烈的科学争论，争论的

焦点是英国伯爵领地德文郡 (Devonshire)^① 的地质年代的测定，这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问题的争论最终导致了一个新地球史观的确立。^② 这一变化涉及对于过去的理解，它对当时的真实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理解变化的影响范围，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地质时代表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短暂而密集的科学工作中创立的。1800 年前后，虽然科学界公认地球是非常古老的，但是还没有出现任何参考标准来按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件。此后被普遍认可的、以化石的年代顺序来测定年代的标准，当时还没有出现。当时的情况是，虽然历史学家知道地球上存在过早期文明，但是他们不知道确切的年代，比如说他们不知道基奥普斯金字塔^③ (the pyramid of Cheops) 是在沙特尔大教堂^④ (the cathedral of Chartres) 之前还是之后建造的。但到 1850 年前后，历史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排序，整个世界发生的不可重复的，但仍可辨认的历史事件得到了有序的排列。地球历史是由地球上的生命历史来定义的，通过使用固定的命名，历史被铭记下来，从纽约到莫斯科都认可了这种历史划分方式。^⑤

① 德文郡是地理上英国第四大县。德文郡也代表一个地质时代，即泥盆纪，“泥盆” (Devon) 来自日语，是英国英格兰西南半岛上的一个郡名的日语音译（现称德文郡，Devonshire），日语中“泥”读 dee，“盆”读 bon，所以日本人就用汉字“泥盆”翻译英文 Devon。泥盆纪是英国地质学家塞奇威克 (A. Sedgwick) 和默奇森 (R. I. Murchison) 研究了该郡的“老红砂岩”后，于 1839 年命名的。这个时期形成的地层称为“泥盆系”，代表符号为“D”。——译者注。

② Martin Rudwick, *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The Shap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mong Gentlemanly Special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③ 基奥普斯金字塔是埃及最大的金字塔，位于吉萨金字塔广场，今天的开罗郊区，被认为是古埃及文明最典型的象征。——译者注。

④ 沙特尔大教堂坐落在法厄尔——卢瓦尔省省会沙特尔市的山丘上，是法国著名的天主教堂，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之一。197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译者注。

⑤ Stephen Jay Gould, “A Triumph of Historical Excava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7, 1986, pp. 9-15.

在地质学“发现时间”这一时期，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科学家确定了过去的历史分期的时刻，欧洲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开始了：这一时期激烈的产业化及其伴生现象使数百万人民的社会现在和未来在现代化的涡流中变得支离破碎和不安全。

由于这种巧合，地质学与已经根深蒂固的宗教之间围绕着“创世纪”的字面解释一直争执不已也就不怎么令人惊讶。科学界的实用主义一路高歌猛进，在大部分科学家看来，虽然像“创造”这样的宗教术语无法精确地转译成科学词汇，但拿来使用并没什么不妥；只有少数人坚持反对这种实用主义做法，但他们显然没有任何机会。拉马克（Lamarck）^① 就坚持认为，只有证明了自然进化过程的背后不存在任何的创造性活动，“创造”一词的使用才成问题，此类观点充分激起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② 的讨论。19 世纪上半叶，地质学能够以无伤大雅和不咸不淡的方式应对宗教的反抗，并确立了自己的时间观念，但在面对社会的抵抗时却没有这么顺利。地质层次的划分和排序有着非常实用的经济意义，它为刚刚开始工业化所不可或缺的资源发现和开采提供了条件。比如，“泥盆系大论战（德文郡大论战）”（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的主角之一默森奇（Murchison），作为俄国沙皇的顾问，他曾让沙皇相信在志留纪岩石层（Silurian rock stratum）^③ 中寻找煤炭资源是无用之举。

① 拉马克（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无脊椎动物学的创始人。拉马克早于达尔文诞生之前（1809 年）就在《动物学哲学》里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在进化学说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则鲜为人知。——译者注。

②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 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译者注。

③ 志留纪（Silurian period）（笔石的时代，陆生植物和有颌类出现）是早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古生代第三个纪。本纪始于距今 4.35 亿年，延续了 2 500 万年。由于志留系（指在志留纪时期形成的地层）在波罗的海哥德兰岛上发育较好，因此曾一度被称为哥德兰系。志留纪可分早、中、晚三个世。——译者注。

虽然地质学发现了作为地球自然历史的时间，但这一发现要转变出实用的时间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科学对地球的“自然时间”的探索与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的历史性联系，比发现煤矿要深刻得多。杰弗里·鲍克（Geoffrey Bowker）曾进行一项关于19世纪30年代英法地质学家时间观念的符号学研究，他发现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地质学家发现的时间很快就成为被“偷运”进社会的新时间观的意识形态辩护工具。

在地质学内部展开的关于时间起源的争论，使地质学成为为机器工业社会的新时间秩序提供合法性的一门关键学科。运用当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地质学家的科学论文，鲍克重现了一幅令人着迷的图景。他展示了上帝这个造物主与其造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类比和语言转换而逐渐地被另一种类似的关系，即科学家与其造物——机器之间的关系所取代的。在一定意义上，科学窃据了自然时间的起点，取代了宗教界定时间起点的地位。科学必须重新界定时间的起点，并因此自己成了造物主。^①

时间成为慢慢流进石头凝固起来的、在沉淀物和沉积物中记录下来的时间，它为地球历史和人类历史确定了时间起点。与此同时，科学也形成了线性连续流的概念，用以描述所有其他的运动过程。不过，关键的一步还是通过用机器来做类比而实现的。机器成为自然时间的载体，因为物理学的运动过程被建构到机器之中。由此，机器也成为人类必须遵守的社会时间秩序的调节器。通过机器，线性的、均质化的、可以被任意划分的连续体时间结构被从自然领域传送到社会领域。科学家在他的造物即机械中设置了自然时间，这样一来，机器就具备了某种时间方面的秩序权力；相对这个时间秩序来说，所有其他的社会时间观念都是次要的。当时的社会混乱唤起了工业革命，也导致社会的旧体制结构走向瓦解边缘，在此混乱的前景中，科学和技术就成了挽救社会崩溃的权威和秩序权力。从那时起，在科学和进步的名义下，臣服于以自然时间为依据的时间秩序就成为普遍的要求，机器和人类一样都必须顺从这种时间秩序而运动。机器时代处于支配地位

① Geoffrey Charles Bowker, *If time ever was. The social and scientific perception of time in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1830's*.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n. d.

的时间观是线性时间观，社会时间也是通过科学的时间观的转换而建立起来的，正是由于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成功的”联系，机械时代很长时间没有受到质疑。

对宗教作为设置时间的权威机构和确定时间的最高权威的排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没有人会再质疑科学在时间方面的定义独占权。自1967年以来，科学将一秒定义为9-192-631-770个铯原子周期。

从历史上看，科学的时间观在确立自己的地位上是成功的，它带有特定的科学史与社会力量的时代烙印，并成功地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时间观。一旦线性时间秩序得以以一个可以追溯其起点的年代学的形式确立起来，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所有动态的运动开始加速。在“陀飞轮社会”，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能量使人类从无数的“小的世界”，从具有封闭的社会结构和生存形态的小城市和村庄拔出来，并到处点燃人们无止境的贪欲。由于这种贪欲，人们不惜“和他的对立面繁育后代”（马克思）。在“陀飞轮社会”中，加速成为使其他一切黯然失色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经验。步调比目的地更重要：谁保持原速，谁就停滞不前；一切，尤其是时间，将会快速运动：新的神话就是速度。

因为这种疯狂的、越演越烈的加速，很多人以文化休克（shock）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休克”现象最初来自医学对在铁路事故中的受害者的生理—心理状态的诊断。^①不过，我们这里所要讲的，不是心灵的冲突、不是数不清的生灵与时代的机车之间的碰撞，也不是人们使用的用来描述他们经历的巨大的运动洪流的无数比喻，而是时间的肖像学（iconography）。艺术家们留下了大量的图解，它们能比文字更清晰地表达感觉触动。

这些图解描绘了死亡中的时间、作为时间之女的真理、吞噬自己孩子的时间。这些图解以讽刺和忧郁的方式绘制出来，但艺术家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一种诠释，使我们易于解读。马西莫·卡

① Wolfgang Schivelbusch, *Geschichte der Eisenbahnreise. Zur Industrialisierung von Raum und Zeit im 19. Jahrhundert*.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77.

恰里 (Massimo Cacciari)^① 在他如诗般充满思想的文章里提到了英国讽刺作家威廉·荷加斯 (William Hogarth)^② 1764 年绘制的《死亡中的时间》和戈雅^③ 的两幅《聋子之家》 (*Quinta del Sordo*)。对于卡恰里来说，克洛诺斯创造的时间揭示了自己会在时间进程中死亡的真相。在荷加斯的插图里，人们甚至可以发现这样的遗嘱：“我留下一切。”应该解读成：“留下我所拥有的一切，但不是给上帝（这几个词被删掉了），而是给混乱，因混乱是我唯一的遗产。”——在面黄肌瘦的克洛诺斯身旁，是滑落的哨子和迟钝的镰刀；沙漏行将用完；世界已是一片废墟。爱神的箭已断，钟已碎。世界化为一团烟雾。时间判定自己会“消耗殆尽” (*consummatus est*)，最后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在戈雅的画里卡恰里这样认为，所描绘的主题是时间的愚蠢。大大的黑眼睛中空洞无物，看不到任何威胁。为了生存，时间是非常贪婪的，为了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它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为了生存，它甚至毁坏了自己赖以存在的唯一保障。确立其存在的原则被它判处死刑。“愚蠢”恰恰是时间的特性，为了生存，它不断地消耗、不断地破坏：它癫狂地奔向自己的坟墓。在绝望和盲目的生存意志中，时间表达了自己的死亡冲动。卡恰里呼吁戈雅人物的观察者“纵声大笑”，在笑声中揭露时间的愚蠢、暴露时间的自我毁灭机制：“贪婪的时间揭破了人类对不朽价值和不变价值追求的虚妄性。只有当人们领会到破坏性的时间所制造的反偶像崇拜的真相时，我们的笑声才开始解放我们。”^④

但是，时间为何会因为自己的必死命运而死亡？是什么使它认识到

① 马西莫·卡恰里 1944 年出生于威尼斯，是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家。1985 年，他成为教授，在威尼斯建筑学院教美学。——译者注。

② 威廉·荷加斯（又译：威廉·霍加斯、贺加斯；1697.11.10—1764.10.26）是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讽刺画家和欧洲连环漫画的先驱。他的作品范围极广，从卓越的现实主义肖像画到连环画系列。他的许多作品经常讽刺和嘲笑当时的政治和风俗。后来这种风格被称为“荷加斯风格”。——译者注。

③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 (Francisco de Goya Lucientes) 是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漫主义先驱画家，他的绘画艺术具有民族性、世界性和现代性，人们称他为“画家中的莎士比亚”。——译者注。

④ Massimo Cacciari, *Zeit ohne Kronos*. Klagenfurt: Ritter Verlag, 1986, p. 23.

这一点？在卡恰里所选择的荷加斯的插图中，时间也会死亡。当克洛诺斯吐出最后一口气时，四周一片废墟，一切皆遭破坏，这一刻，世界的价值被证明是时间死亡的产出。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自我毁灭呢？

尽管是诗学思维的解释，但就像所有艺术杰作一样，上述作品仍然给其他方式的解释和其他问题留下了空间，包括来自其他讨论体系的解释和提问。为了生存下去，克洛诺斯做了不可饶恕的蠢事，即消耗自己继续存在的基础——他自己的孩子。从他瞪大的眼睛中和耗干的躯体上，我们看到了惊恐。巨大的催命鼓声不仅夺去了荷加斯描绘的衰老的克洛诺斯的生命，也令整个世界在世界的尽头（*finis mundi*）化为瓦砾和灰烬，但这巨大鼓声到底是什么？如果像荷加斯的精妙讽刺所描述的那样，所有现有的价值都被破坏了，一切继续存在的希望都化为泡影，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崩溃？尽管新时代的语义还没有在图画中出现，但作为历史概念，它的时间化运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因此，必须得问：新时代的肖像学看起来像什么呢？在戈雅的另一幅绘画中，胜利的真相是以年轻的裸女形象表达出来的——她是克洛诺斯的女儿吗？克洛诺斯还将她捧在手里，但长有巨型翅膀的他，本身却不得已地倾颓下去。首先是要确立一位讲述历史事件的女见证人，但哪些才是克洛诺斯必须从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明亮而又年轻的时间真相呢？

自从18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提到新的时代。很快，就出现了“现代”这样一个新的时间概念，它表达的是一个新时代的特征：“时间不仅仅是反映所有历史事件的形式，它自己还赢得了一个历史性的品质。历史不再是在时间里进行的，而是通过时间来实现的。这样，时间被赋予了生命力，自身成为一种历史动力。”^①新的时间被同时代人作为现代所认识和接受。它向世人展示，它能创造新事物——而这种新事物首先就是新的知识。从中世纪早期延续到19世纪的旧知识的秩序结构建立在保护现有知识和维护百科知识派的分类和储存传统的原则基础上。对于伏尔泰（Voltaire）来说，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还是“永恒

① Reinhart Koselleck, “Neuzeit. Zur Semantik moderner Bewegungsbegriffe” in: *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7.

的”和不可能超越的“人类智慧财产”。1767年，当整个工程显然还未结束时，伏尔泰就下结论说，百科全书的编撰不仅仅是地球上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此类工程。他认为，这部书在理论上和内容上都满足实现理性的终极成果所需的前提条件，因此它是人类历史的最高点——当然还需要继续传扬和执行，而且需要多少时间也不确定，但这些都是某种后历史（post-history）的内容。^①

新的知识出现在改变了的生产条件下和变化过的组织结构中。新的知识是可争论的知识，它必须面对批评并能从批评中改善自己。知识如何以及在何处找到自己在整个知识的现有秩序结构中的位置，已经不再重要。知识是否真实，不再因为它是真实的而受到保护^②，而是要经得住公开讨论的检验，并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要在实验—实证检验程序中通过测量工具和仪器的验证而站得住脚。根据认识论的定论，知识是可以收回的，也就是，它自身处于某种准备状态，随时为了后来的但更好的知识放弃已取得地位。这是一种献身于科学进步的知识。知识生产条件的变化始于18世纪，在这一时期，满足科学知识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先决条件（包括新的知识源泉的系统开发及相关方法论的运用）已经被创造出来。但整个18世纪也是知识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此前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保存下来并受到保护光环保护的知識，现在越来越多地陷于实验测试条件的压力之下，很多知识显然已经站不住脚。18世纪，人们第一次观察到，新型的知识是如何开始重新型构迄今为止的知识保护见解和知识秩序观点的。新开发的知识源泉，伴随着大规模殖民运动的旅游和探险，激起了新的贪婪^③，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的推进能力的变化。旧的建立在概括和分类基础上的知识分类模式

① Hans Blumenberg, Reinhart Koselleck, “Neuzeit. Zur Semantik moderner Bewegungsbegriffe”, in: *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7, p. 226.

② 此词本可以直译为“保护”，但因为作者这里做了结构性的分解，因而具有了“为真实的”和“受保护的”双层意思。——译者注。

③ 德文中有 Neugier 一词，是一个合成词，意为好奇心，词义是中性的，甚至是良性的。但殖民显然不能以好奇心来解释，因此，作者这里更加突出了 Gier 一词的本意，即贪欲。——译者注。

已不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为了吸收从世界各地拖曳回来的、部分是异域特有的知识，不打破传统的分类范畴已是行不通的了。18世纪不仅诞生了诊疗所，也诞生了实验室，而正是实验室这种组织的发明满足了知识生产的需要，并最终将所有的科学变成了实验室科学。

从此刻起，人们就不仅仅是在实验室观察自然，而且也开始复制和生产自然。随着最初隐形的自然规律显现出来，人类社会开始改造自然世界。如施蒂希韦（Stichweh）所说，出现了充分人工的“自然现象的自我生产品”，这些自我生产品不仅在排他性竞争中战胜了陈旧的僵化的知识，还为新确立的科学世界观提供了基础。^①

如果说克洛诺斯正是由于特别害怕这种情景而采取了最后的手段，他吞下了自己的孩子并因此走上了自亡之路，那么，当新的时代开始取得胜利时，他就要不停地吐出自己的孩子吗？新时代不仅会因集聚财富的意愿而推动积累，还会主动投资，目的是让所有固定的东西流动起来，这使得积累起来的财富和起支持作用的价值和美德都不能再安全地维持其已有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老吝啬鬼克洛诺斯的世界还会因为这种不安全性而像荷加斯冷嘲热讽的那样，庄严而崇高地陷入混乱的最终状态吗？现代及其特有的运动形式即加速运动不会满足于通过新知识的生产而使老克洛诺斯感到害怕，现代会务实地将目标转化为行动。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用他的立论模式所勾勒出来的一切现在都已开始兑现：如果人们不仅仅是为了明天的收益，而是为了永久的利益而致力于事情的原因，如果人们通过计划来排斥偶然，如果人们能够将发明置于可以很好控制的进程，并能通过劳动分工而互相帮助的话，那么系统地推动科学发展就有了希望。如果在此之后，“进展”或者“进步”能得到不断的记录，科学就将成为领导部门。^② 正如鲍克所料，

① Rudolf Stichweh, “Selbstorganisation in der Entstehung des modernen Wissenschaftssystems”, mimeo;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 英文版: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0.

② Reinhart Koselleck, “Fortschrit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79, p. 393; Wolfgang Krohn, *Francis Bacon*. München: Beck, 1987.

要实施新时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会在机器中装备更迅速和更协调的运动程序。提高运动的速度是从机器开始的，但很快席卷了整个生活领域，这样一来，速度就成了从经验角度无法怀疑的进步观的基础。

启蒙时代所缺乏的是经济的动态观念，这一点在经济实践中得到了补充。在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存在着转化周期；借助于市场工具，在科学家的同时代人即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帮助下，转化时间成为创新取向的资本主义竞争中的促进因素。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学中，企业家承担着为新科技成果开拓市场的职能，由此产生的影响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企业家受新的时间及其时间性的塑造。创造性破坏是指创新过程本身，是指为新的产品和工艺加速腾地方。维持一定阶段内市场供应的、市场具体的时间性所构成的，是暂时的、向资本主义企业家招手的成本优势。利润是驱动力。在熊彼特的理论中，企业家明白，相对于大量传统主义取向的“经济周期经营者”（hosts of the economic cycle，他们受到旧的静态商品流通秩序的束缚）来说，现代企业是可以借助于创新创造成本优势的，只不过这种优势只能是暂时的。^① 企业家的利润产生于静态市场的有效价格与企业借助于创新而生产的个体成本价格之间的差异。熊彼特意欲追踪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相信，这个规律就藏在经济领域之中。最终的原因，即发展的引擎，就是偶尔发生的、由创造性个人推动的、在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市场和新的资源源泉之间形成的“生产性组合”的变化，以及新组织形式（尤其是垄断组织）的创立。这些新的组合迟早都会引发制度适应，而在制度适应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质性变化就会发生。根据这种经典解释，正是通过创业资本主义，处于定态的经济生活就会转化为持续动态的、不断创新的经济生活。熊彼特和其他观察家注意到，如果创新以“集群方式”（in droves）出现，经济就会呈现周期性波动；这种经济波动，在马克思、康德拉杰夫等人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经济定态的改变会导致景

① Joseph Schumpeter,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2nd edition, München-Leipzig 1926; *Konjunkturzyklen. Eine theoretische, historische und statistische Analyse des kapitalistischen Prozesses*, vol. 1, Göttingen 1951. Dazu auch Eduard März, *Joseph Alois Schumpeter-Forscher, Lehrer und Politiker*. Wien: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1983.

气上升现象，这种现象经过漫长的时间以后会被相对方向的运动所取代。创新的“集群式出现”归因于无数的模仿者追随成功企业家的脚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也愿意接受新事物。

对创新活动的分析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熊彼特将企业家看做是一个能够扭转局面的人（*deus ex machina*），但这种将企业家塑造成英雄的观点目前已经让位于一种更为微妙的看法，后者注意到一种更为复杂、更具穿透力的事件：一方面是基于科学知识的技术和技术化的科学；另一方面是市场，两者互相影响、彼此依赖。即使人们总能辨认出具体的技术上或科学上的“突破”，但为了能实现市场运用，总是需要相应的制度、研究组织和经济—财政层面的先决条件。取代了个人发明及其经历的是整个技术体系在时间轨迹中生成的创新发展的动力学，这样，“创新”现象不仅受到科学—技术因素的型塑，也受到了社会—组织的影响。^①

与从前一样，附着在创新活动中的时间的特殊性仍然嵌入市场的竞争时间之中。从创新进入市场的那一刻起，创新就介入经济力量的竞争场域；很明显的是，这种力量场域现在正转移到创新研究的产前领域。从宏观的角度看，现在开始的排他性竞争是围绕市场缺口的战斗，这些缺口既存在于现有的和已被占领的市场，也可能还有待创造——对有待唤醒的要求的反应。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就会看出，熊彼特将企业家区分为创新者和“纯粹模仿者”是完全含混不清的。特别在高科技领域，技术创新的买家本身就是有着很高识别力的顾客，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特殊需求持续地影响创新产品。他们像所有消费者一样，也处在竞争的时间压力之下。在市场上先于其他人获得某种消费品，在大众消费的符号下，已经成为一种区别标志——获得商品的时间点成了消费者的身份定

① Giovanni Dos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in: G. Dosi, Ch. Freeman, R. Nelson, G. Silverberg, L. Soete (eds.),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Francis Pinter, 1988; R. Nelson and S. Winter, “In Search of Useful Theory of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vol. 6 (1977), pp. 36-76; Wolfgang Zapf, “On Social Innovations”, *Working Paper No. 254* (November 1987),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3, Mikroanalytische Grundlagen der Gesellschaftspolitik, Frankfurt u. Mannheim.

位的标志。^① 时间先后的微小差异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区别，而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时间上的领先则代表了国际经济竞争力。

在机器中，通过机器加速，通过时间上的领先而取得市场优势和利润，通过借助于技术设备和人工制品在日常生活中传播“实验室时间”而实现的时间可用性，这些都已经成为现代创新动力学的典型特征。越来越多在实验室里取得的科学知识流入了技术设备和技术工艺，这些技术设备和工艺又将进一步进入市场、工业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环境。越来越多的技术设备都以某种方式与“实验室时间”连在一起。实验室时间的特征是：技术设备连续在场，时间的可用性持续存在。这些技术设备每时每刻都可用，而且可以在其时间流动的过程中被控制、制定和表达。

在实验室条件下，不管是一次性事件还是多次重复的事件都是有可能被加速或延缓的。渐渐地，这些实验室里的时间进程也被引入社会领域。实验室时间流入“正常世界”（normal world）。技术制成品供人类使用，但是却也要求人类提供可用性：或为其服务，或操控它们。机器和人类之间相互依存的过程开始重新搅在一起。

与动物或人类的活劳力相比，每件机器在时间可用性上都更优一筹。技术和科技产品都是由人类创造的，并拥有特殊的用途。作为它们嵌入社会的前提和后果，某些形式的工作组织是必不可少的，而人们在工作 and 日常生活中使用技术产品的过程中也会获得一定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方式。如工业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所知，技术对社会的塑造空间是巨大的。对技术可以从文化角度加以规定，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来塑造。在内置的“社会建构”中，在渗入人工制成品的、于使用中通过与社会组织建立反馈机制而形成的复杂行为模式中的目标、规范设想、习惯和要求之中，内置的时间维度是最根本的一个。技术产品被标准化，但是它们也规范了人类行为和社会行为。长久以来，这种标准化已超越工作场所而进入了私人生活领域，工业国家已经走完了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两极之间的道路。

①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tr. R.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现在，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在社会纪律、规则、（维护规则必须的）规范、（内置于技术的）规范化之间形成的接近共生、互相补充的关系状态。长期的社会发展需要一套规章，这些规章从最初来自于外部强制，经由时间规制的不断地内在化，到自觉强加的自律。^①当然，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设置了时间规范的技术制成品也会介入其中。这些技术制成品一方面服务于保持和稳定已被引入的时间秩序，但也通过引入外体技术（extra-somatic technologies）推动内化的适应性。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时间测量手段，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技术——哪怕是最简易的工具，不然的话，就会缺少塑造空间、时间和社会组织的能力。^②然而，在前工业社会，还不是所有时间皆为“经济学时间”，因此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人类为了技术产品提供可用性。当时的人们必须为了“上帝的时间”和工作提供可用性。欧洲第一个“有节律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圣本笃（Saint Benedict）的会规基础上^③，该会规中有八次祷告，分布于白天和黑夜，分别由机械的钟声引导——这是一种以准时和规律为特征的、外部控制的时间秩序，但仅适用于少数精英。以机器的运送运动机制为取向的规律，也规定了调节工业化时代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时间秩序：规定日程安排的社会机制形成了。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作品中写道：

新资产阶级通过筹划家计和生意，使其生活简化为一种精心管理、从不间断的日常惯例：如此多的商业时间，如此多的晚餐时间，如此多的娱乐时间——所有都经过精心计算，所有人的方法都类似，就像特里斯特瑞姆·项狄（Tristram Schandy）的父亲的性生活一样，像每个月上钟表发条那样准时发生。按时计算的付款，有期限的契约，定时的的工作，给定的用餐时间，等等。反正，从这一刻起，一切都离不开日历和

①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vol. 2, Frankfurt: Suhrkamp, 1976.

② André Leroi-Gourhan, *Geste et la parole*; 德文版参见 ch. 2, n. 29.

③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钟表了。浪费时间成为最令人憎恶的罪恶之一。^①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浪费时间虽然是让人憎恶的，但他们毕竟还有一个选择余地；但对于劳工阶层来说，委身于机器的时间秩序之下则是难以想象的苦难。

到那时为止，机器开始为工业生产和赢利积累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可用性，但也开始要求工人前所未有地适应机械，而工人毫无选择余地。他们作为机器活的附件与机器绑在一起，且在早期根本没有社会政策保障措施；甚至是原定的休息时间也被无情的剥夺。19世纪末期，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的改良和整个生产过程组织形式的改善，但也与工人行为更加适应机器的运转节奏有关。在渐进和充满冲突的过程中，工业社会才在劳动习惯的内在化和社会生存的外在必要性之间危险的平衡中确立了调节劳动时间的规范。

今天，与人类时间秩序相关的社会规范被进一步内在化了，并在与内置于技术制成品中的时间秩序形成的动态依存关系中继续发展。随着加速在社会中的进一步转化，加速不再仅仅意味着所有社会进程的提速。加速还促进了普遍提高的流动性的时间规范的形成，这种流动性同时也是物资、人力、能源、信息传送过程中要克服时空距离隔阂而产生的技术和经济进步的结果。因此，流动性并不局限于可优化的（即技术—经济上可实现的）具体技术特征。更确切地说，流动性已经被提升为一种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时间规范，一种人类宣称并追求的社会状态，这种状态既是人们所期望的，也可以视为提速的结果。商品、人力、能源、资金和信息的所在地被更加频繁地交换，目的是在广泛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上实现循环（to circulate）。职业上流动的可能性被视为继续留下来工作的前提条件，是人们一致费尽心机争取的，被认为是在成功的职业生涯中得到提升的前提。

虽然严格地说，社会地位上升只是社会流动的一种可能的形式，但人们普遍将社会流动性视同于社会地位上升。流动，即将一切移动的或

^① Lewis Mumford, *Technic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1934, p. 42.

可使其移动的都推入巨大的加速的循环圈，是国际竞争繁荣的来源。创新及其传播促进了文化生产领域的流动；但仅仅创新是不够的，因为创新需要传播，而流动是传播的前提。只要规范和社会价值发挥作用——人类史上一直如此，那么，离为维护或掩盖现有的权力失衡而引发的意识形态形变（distortion）就不远了。与普通工人对流动性的渴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核心领域却表现出很少的流动性。如在银行业，因为对惯例和自由裁量权的信任和熟悉是机构运行的前提条件，所以只希望在自己封闭的领域内流动。

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标准是时间的稀缺性，虽然它是在与经济的联系中被内置于生产技术中的，但还是成了一个普遍化的规范，成了社会的地位象征。时间稀缺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工业化所形成的经济价值。资本家发现时间是生产力要素，时间的经济问题至今都在根本上影响着经济学。时间的稀缺性成了工业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其影响已超出生产领域而进入了所有生活领域。在可用的、有限的时间中有更多的作为，对于技术制成品和人类活动来说都是最高原则。这里仅举几个最著名的例子：合理化措施、流水线的发明、臭名昭著的时间和运动研究以及其他泰勒式的（Taylorist）管理方式——目的是发现时间空隙并剔除之。所有人和机器都必须受时间稀缺性的影响，并将其内在化——人类是通过大家公认为理所当然的、在“时间压力”中表达出来的规则，而机器则是通过经济上的“适者生存”。

如果现在机器时代即将过去，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机器和技术制成品本身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已经致使曾经赋予旧的生产技术的时间秩序遭到扬弃，也就是说，另一种时间秩序已经孕育而生，那么，新的时间规范就是具有灵活性的时间规范。新的时间规范发现了在时间可用性方面的技术当量（technological equivalent），而这种时间上的可用性以信息密集型技术为前提，但也使后者成为可能。信息精密型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速度水平，它远远地超过了人类的知觉能力。在技术能力许可的瞬间，在“近乎没有时间”的情况下，通过完成操作和程序而产生的额外赢余时间是具有边际使用价值的。工人和机器、生产者和消费者、反射器和接收器必须同时在场才能沟通，这是机器时代的另一条规律，但现在因信息精密型技术而已失效。借助于新的维护技术、传输技术和存储技术，生产和消费行动已经可以脱离地理和时间的羁

绊。录像机和音响使人们不依赖生产日期而消费文化产品，就像食品的保鲜技术早已做到的那样，使人们能在生长季节之外吃到水果。近年来，生物技术提供了最新的保鲜技术，生产和使用活细胞不再受时间的局限。

从较早的食物保鲜技术，到服务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领域的信息储存和信息传输技术，再到活生物体的生物技术分离程序，时间上的解耦帮助弹性的时间规范适用到一个新的、强劲扩张了的有效范围。就像其他时间规范一样，可以预期的是，弹性也会超越最初的生产领域而向文化和社会领域扩散。但是，时间弹性和经常与其相伴随的生产领域的去中心化，既不会兑现乌托邦式的希望，也不会引起与引进新技术和改变劳动组织相关的忧虑。

每次局部的去中心化都以一个更高层面的新式中心化为先决条件。每一次时间上的弹性化都需要更为复杂的新机制，以便能维系变得更为松散的时间上的联系。作为时间可用性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和结果，弹性来源于稳定的时间上的可用性所达到的新高度。唯有人类和其替代品即技术制成品的可用性，才能启动新时间模式的解耦和优化耦合测试，而这也是弹性这个时间规范获得合法性所必需的。

技术和人类的时间可用性的扩大已到了可观察和可测量的程度。默里·梅尔宾（Murray Melbin）提到了“对黑夜的殖民化”，他所指的是美国大城市里夜间活动的增加——从犯罪频率、医院夜间接诊数、24小时营业的超市、保龄球馆和各种维修厂的客流量来看，纽约是不会夜眠的，波士顿也不会。许多工厂、邮局、报社、酒店和医院都是三班倒；服务行业中，例如，消防队、锁匠、提供婴儿尿不湿和杀虫剂的地方、电视修理服务和殡葬服务都是24小时营业。^①当然，追求可用性的经济压力也会施加到厂房里的机器身上。仅仅是因为在这些机器上投入了资金，它们就应该日夜不停地运转，以增加轮班工作的效率。在自动化的生产装置中就不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其运行过程中几乎不再需要人力。这样一来，机器的可用性也就自动得到了保障。

^① M. Melbin, *Nights as Fronti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J. E. McGrath & J. R. Kelly, *Time and human interaction: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tim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86.

“随时准备听候召唤”和持续不离左右的，首先是那些进入办公室和家庭的电子通信技术。随着“实验室时间”离开实验室而化身在这些技术制成品之中，时间的知觉模式也会重新变化。为了适应持续可及性的要求，为了能够管理这种可及性，另类的社会时间结构化是必要的。

时间上的保护带 (protective zones) 是慢慢形成的，在所谓的“核心时间” (core times) 里，人们可以要求“在场”或“缺席”。另外，有些技术不断替代人的“应答”工作，并让机器与机器对话。但事情可能并不像信息技术的狂热支持者设想的那样，人类要离开机器并不是非常容易的。其他的要求是针对人类的时间可用性提出的：他们必须对新技术中的时间结构作出反应，并对它进行结构化。人们必须在与新的机器时间和实验室时间打交道的过程中发展出新的集体和个体时间策略。不只在工作场所、运输和能源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才能发现技术，而且也能在自己家里、在自己身上发现（如个人手机）——事实上，到处都能发现技术。比起以前，个人的时间偏好在集体应对策略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然而，不管是多么个性化的时间策略，其中都要承载社会时间的烙印，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脱离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时间模式。弹性化是相对的。在这里，时间也证明自己既是结构，也在建构，社会时间不会停止穿越个体存在而流动。以下两章将集中讨论这些议题。

时间的死亡，是一个以诗歌思维的方式对时代交替的表述，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历史学家给予它的名字是时代意识。^①提出这一概念，意味着要通过这个概念来把握时间的特点：“这个概念从时间中汲取营养。它的工作在于，把握、固定和型构即将展开的问题。”^②但是，无论是对变化的意识，还是通过这个概念来把握变化，都离不开有关时间重复和时间不可逆转变化的基本经验——所有关于时间的观点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基本经验。这个时代所自设的重复，起源于不断发生的新产品的生产，这是借助于科学和技术不断提速的创新过程。但通过重复创造新事物，重复本身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在实验室里，科学家

① R. Herzog und R. Konselleck (eds), *Epochenschwelle und Epochenbewußtsein*.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88.

② Massimo Cacciari, *Zeit ohne Kronos*, p. 65.

在实验条件下维持自然在时间上的在场，由此创造了实验室时间；当实验室的发明离开实验室，实验室时间就会化身在信息技术之中。这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个过程会给不同的选择留有余地，这也是社会在建构时间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克洛诺斯的原始神话的解释是，它事实上是一个创世神话。所被创造的是一个时间概念，这个概念反过来又承载着历史性的社会进程。^① 在另一个时代里，以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描绘的同一个神话，至少同样反映了他们的恐惧以及对如何克服这种恐惧的设想。考虑到当时加速及其制度化的准备确已引起了长期的破坏趋势——即使是“创造性的”破坏，新时代的克洛诺斯之忧是可以理解的。从那时起，新时代就没有停止吐出他的孩子们：实验室时间胜利地进入社会是迄今为止被最后吐出的孩子中的一个。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能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事先发现其他前提条件和限制条件，同时，它也能回顾以前所得的所有经验。克洛诺斯不必第二次吞下他自己的孩子们，但是，创造性破坏的神话能通过创新防止其发生吗？

① Edmund Leach, “Two Essays concerning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ime”, in: *Rethinking Anthropolog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

第四章 时间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为了孩子们能快乐，成年人必须得快乐。为此，我们需要时间。为了过上无须奔波忙碌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时间；为了过上文明体面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时间；为了有机会成为公众人物，我们需要时间。此外，我们还需要闲暇时间。我们需要的闲暇不是以牺牲劳动时间、家庭时间、政治时间为代价。我们需要的是作为剩余时间的闲暇时间。

——克里斯蒂安·米勒-威茨曼 (Christiane Müller-Wichmann)
《时间问题》

在以自身为时间参照点的那个时间单位中，人们想要拥有更多个人时间的渴望，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不可抗拒。这个时间单元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时间感在扩展了的现在所发生的质变。日常生活曾经只有通过时间对比，即以节假日和礼拜日为标志的临时解放，才能得到调剂。^①而今，它再也不是无情的例行公事、再也没有无尽的苦役枷锁。通过一系列划时代的动荡，它已经摆脱了非历史的、持久的静态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把关注点集中在其他（礼拜日）事项，或者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过分草率地把自己的特征完全加诸非欧社会的做法上。至少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凡人”早就成了大多数人的代名词，日常生活就是对凡人时间的充分复原。日常生活是福利国家的时间维度，在福利国家，几乎可以说就是社会保障这类机构有效地在时间上掌握着个人的生活史（包括教育、公共

① Eviatar Zerubavel, *The Seven Day Circle: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Week*,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医疗卫生服务、国民保险还有养老保险)，但在这个时间维度中，人们要处理的时间单位更小了，他们要自行处理从昨天到明天的过渡，包括其中的快乐与忧伤、正式与非正式的交往关系。这种日常生活早已吞噬了礼拜日，礼拜日变成了周末，而人们可能会各自把周末推迟并安排在另一天。

在扩展了的现在，就算非比寻常的节日时间也已经缩水了，它们完全被认为是古老的残渣。甚至是狂欢节的那种对旧的确定性的颠覆与解放的娱乐，那种逃离现实纵情于宇宙的娱乐，现在也不得不在扩展了的现在中寻觅那些属于它们的瞬间，由于价值观念的变更和各种各样的借口，扩展了的现在再也无法拿出较长的时期供各种娱乐和无聊之举尽情挥洒了^①。日常生活仍然为所谓生活的无常（*vicissitudes*）提供时间，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规定了这些事情所要花费的时间：丧假多少天，婚假多少天，凡此等等。^②

日常生活已经把工作 and 所谓的自由时间归并到了一起，个人的时间“消费”和公共的时间消费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新的组合。国家及其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主要公共机制，包括它们的时间视角，所面对的是普通民众和雇员以及各经济主体的时间视角。在日常生活中，在所有那些能被人们经验到的私人事务中（这些事务唯有通过其所处理的时间冲突才成为政治问题），有关时间本身的性质、它所具有的价态特征，以及它的量与质之间的交换关系等方面都显露出巨大的变化。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不断增长的对日常生活的质量要求，在于妇女大量进入工作生活，并带来不同的时间文化。不过，问题也在于，服务领域不能像生产商品那样应用自动化技术，也不能以商品生产的方式来实现；^③ 服务领域需要不同的时间模式，这些模式涉及变通的行动、人们关系的性质以及相互间的关照，它们的基础不是时间与金钱的交换关系。围绕缩短工时所产生的冲突——奥斯卡·奈特（Oskar Negt）认为这种冲突是“政治性

① Massimo Cacciari, “Erinnerung an Karneval”, in: *Zeit ohne Kronos*, Klagenfurt: Ritter Verlag, 1986, pp. 41-62.

② Barbara Sichtermann, “Wechselfälle”, in: Rainer Zoll (ed.),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p. 641-655.

③ Fritz Scharpf, “Strukturen der post-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Arbeit und wirtschaft*, vol. 11, no. 1 (1985), pp. 9-34.

的”斗争，而不仅仅是老一套的工资矛盾，^① 依然主要来自于传统上一以贯之的男性主导的工作生活，而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现实却早以“摇摆不定”，即处于许多作者所认为的那种“女性化”状态。^② 理应从总体上得到分配的（要求新的分配政治学所揭示的），是工作与时间：要从总体上分配工作的原因是，由于参与工作的人数不断增长的趋势和不景气的社会就业吸纳力，在未来，仅有一小部分带薪就业的人能有机会获得从前那种“标准的个人简历”；而要从总体上分配时间的原因是，它是关于男女之间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重新分配的不可不提的问题。

时间的公共用途（以有偿劳动的方式消费掉）和私人用途（主要指无偿使用）之间的交换关系在社会中的分配极端失衡。为有偿劳动的目的而以公共的方式消费时间，是时间也能以私人方式来消费这一事实的重要前提。但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是，相当一部分以私人方式对时间的利用也是它的公共利用的必要条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交换关系。日常生活要从政治角度加以重估，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对属于民众的时间的要求，以及进一步在政治上明确表明他们对于普遍福利的贡献的要求。新的权利——日常生活的权利，获得了话语能力。^③ 时间成了时间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潜在的一般等价物，因为，在扩展了的现在，我们必须重新衡量它们。

林德斯佩策尔（Rinderspacher）说过，时间控制财富，然其只能被我们经验为冲突，这类似于健康或者正义。^④ 不与个人愿望冲突的时间就是与时间的标准化相悖的时间，即不服从社会的、经济的或者是精神制约

① Oskar Negt,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 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 Dimensionen des Kampfes um die Arbeitszeit*, Frankfurt: Campus, 1984.

② Tom Schuller, "Workending and Institutional Time: Employment, Impermanence and Ambiguity in the Life Cycle", *Work and Society*, vol. 10 (1985).

③ Helga Nowotn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Uses of Time", in: Laura Balbo and Helge Nowotny (eds), *Time to Care in Tomorrow's Welfare Systems*, Vienna: Eurosocial, 1986.

④ Jurgen P. Rinderspacher, *Gesellschaft ohne Zeit: Individuelle Zeitverwendung und sozial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Frankfurt: Campus, 1985; Giovanni Gasparini, *Il Tempo e il Lavoro*, Milan: Franco Angeli, 1986.

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是我们无法经验到的。然而，使时间能被我们以冲突的方式经验到的各种冲突，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权力起源（这些权力擦亮了冲突的火花），它们所产生的体现为不同情况下的理想典范的社会纲领也大相径庭。在对各种时间冲突的研究中，时间代表着权力的核心维度这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晰，在决定活动的按时执行——执行的顺序和速度、起始和结束以及内容和形式的时间体系中，权力得到了自我确证。在几乎所有社会中，都是牧师们首先按照那些超自然的秩序和神圣时间与世俗时间的区分而确立了占统治地位的时间体系。当前，时间体系主要是由市场和国家来确定的。市场通过所要做的工作以及时间与金钱的交换关系来安排时间。国家则通过立法体制来发挥它对时间体制的影响，并以此建构民众的生活。标准化的个人履历产生了，它受到法律的保障，同时，例外情况的条款也确立起来。法律决定了个人履历的状态——某人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是儿童，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是青年，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是成年；哪些时间要准备服役或者哪些时间要用于孩子的生育和教育；什么时候离休或退休，这些都是强制性的。在市场上，由于金钱的影响力更实在，覆盖的社会范围也更广，时间要服从金钱这一更为普遍的媒介。我们可以积累金钱，也可以为盈利而对其融资、储蓄和“经营”，以备日后不时之需。一方面，时间即便不涉及为退休金而投入的工作时间，只要它在当下无所用处，就处于“浪费”状态。从这个方面来说，老年的“退休期”是经过了预先筹资的时间。因此，金钱偏好也主导着市场。金钱可以不考虑个人、脱离各种利益与动机的要求、无视给予者与接受者的时空存在而直接被传递。另一方面，时间仍然与个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情境密不可分，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能力紧紧联系在一起。普通工人或者文秘人员的时间不如老板的时间“有价值”，并且他们的时间是不可随意互换的。正是市场通过金钱这一普遍盛行的稀缺媒介创造了时间的短缺。无论如何，是国家管理着时间这一稀缺资源。金钱不服从媒介物所固有的那些限制。不过，在使用金钱上的普遍限制却存在于各种社会标准之中，这些标准不允许因金钱万能而任其为所欲为。^① 无论

① Helmut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Rationalitätsgrenzen Kollektiver Akteure am Beispiel der Arbeitszeitpolitik 1980—1985*, Frankfurt: Campus, 1988.

如何，超越生活之上来分配生活中的时间稀缺是国家的职责，这不依赖于任何个体。国家是维护民族团结的世俗化领域中的教会，它要安排各种节日的时间，并决定什么时候必须得休息。国家不仅划定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而且也为它的国民设立了种种时间上的限制：各种工作时间条例和营业时间，允许谁在夜间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为谁工作以及为了哪些原因才可以让时钟停止或者把时钟“往回拨”。与金钱偏好在市场上的大行其道相比，国家只能以调节和补偿的方式插手某些问题，例如“放贷”周期的问题，这种周期不止包括花费在工作任务本身的时间。在市场上，任何时间的缺乏都能成为一种激励——通过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来提高个人生活方式的效率。一般来说，甚至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状况恶化的阶段，或者说恰恰在这个阶段，金钱偏好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因为，此时的问题在于，一个人既要维护其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又要维护其绝对地位。地位取决于收入而不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这在失业的例子中清晰可见。失业时光仅有短期的报偿——对大多数人来说，有闲而没钱在经济上是不值得的。^①

对于其他那些以不同方式建构起来的政治学领域而言，时间政治学本身已经成为关键的战略性问题。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日常生活的强有力的时间结构，是由市场和国家确定并支配的时间体系所构建的；而且，各种结构上的变化正把工业化国家带出机器时代，同时，又把它们带入新技术的时间政权之下。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竞争都要求尽可能灵活的时间规则。但是，有关时间分配的新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只要是在女人和男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包含日常的工作生活和所谓的私人领域的地方，就会面临这些问题，在这些地方，对家庭生活的私人要求绝不肯与有报酬的从业的时间规则达成妥协。

男人和女人处在不同的时间文化中，并且，他们也在这些不同的时间文化中得到了社会化，此间冲突日甚。当前，日常生活中扩展了

① Helmut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Rationalitätsgrenzen Kollektiver Akteure am Beispiel der Arbeitszeitpolitik 1980—1985*, Frankfurt: Campus, 1988.

的现在既涉及男性也涉及女性，但这两者的时间文化却仍在沿着各自性别规定的界限不断分化。只要还存在地方性的失业威胁，只要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仍不是或不再固定于劳动力市场，或者仅仅临时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各种社会权利的平衡和实现的问题就会再度出现。一种新的所有权名目出现了——对工作的所有权；而在此名目之下，没有工作所有权的人数正在上升。缩减工时的讨论在公众形式的外表下高度隐匿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因不易归类到传统的政治学领域而仍然难以命名的各种冲突，要求的是新的社会整合，尤其是同步性的举措，这里没有传统的模式可循。这种状况类似机器时代所具有的“弹性摇摆”（用于新的自动化生产技术的技术术语）。它也类似“职业的巨擘”，尽管弹性摇摆的职业自身还没有充分地得到确立，但它已然使工人们身心俱疲，只能依赖夜晚和假期得到休整，并且，在工业生产的型塑下，它对于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显露出如此强烈地持续的倾向，它最终会为人们从僵硬的常规中解放出来做好准备。在过渡时期，各种社会的理想规划和乌托邦蓝图仍一如既往地生机勃勃，其“重新分配时间”，并要使个体确信时间的自决。显然，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旧的交换关系（这些关系的架构衍生自男性雇员的线性的、“连续的”工作履历）已不再适用。自由时间的数量不能被一致地转化成高度分化而又排列巧妙的、可由主观情境衍生出来的质的要求。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含义都被纳入了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概念中。各类实证调查表明，有两种愿望占据着主导地位：一种是使个人的工作时间“标准化”的愿望，当假定的“标准的工作时间”不再成为现实的必要模式时，这种愿望就随之产生了；另一种是“时间自主”（temporal sovereignty）的愿望，在与其他生活需要协调同步的情况下，分配并调整工作时间，找到时间自决的途径。^① 如果妇女们在这种联系中更确切地感知到时间冲突，那是因为，她们正带着各式各样的时间需要，大规模进入工作生活，她们已经更有力地反驳了静态的传统时间体制。经验数据进一步表明了实际的工时在多大程度上比理想中变化得更快，但同时，“糟糕的官方工作时间统计”也可能隐匿了一些东

① Christiane Müller-Wichmann, *Zeitnot*, Weinheim: Beltz Verlag, 1984.

西：一方面是面对持续的结构化的大规模失业过程，仍有相当一部分雇员可能属于过度就业（overemployment）；另一方面，根据所有可用数据，失业的过程具有再就业的机会和风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的动态累积的特征。^①

同适用于新生产技术的技术框架的时间可用性相应，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时间不确定性。通过在不同条件下生产出来也同样要求在不同条件下被消费掉的商品和服务，普遍的时间可用性的压力取缔了机器时代。因为，时间有效性也有待于在新产品的使用中来发掘。这样一来，新的时期实实在在地打开了——更密集、更集中的时期，追求连续呈现的时期——这些时期潜在地含有更庞大的张力，也包括强化现在的复杂时间的可能。^②

在生产过程中，机器已经接近于取代人类。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任何人类机体性能的增长，无论这些人的工作如何娴熟。因此，组织机构的其他一些原则（在可用电子操控速度的条件下，以达到最佳效能和效率为目的的那些原则）冲到了前排。例如，在现代制造技术的使用中，各大系列标准化产品的现货制造被专门订购的短期制造所取代。现货储备减少了，因而，新的组织机构原则规定了生产过程。生产的节奏“弹性摇摆”。工厂的时间与工作的时间脱钩了。高度的资本集中使得管理部门尽可能要“24小时”使用工厂。服务以及一部分辅助制造被转移了出去，它们转变成“第三位的辅助产业”。例如，由于主要使用大集装箱进行自动化装载，运输的组织机构很可能变成依赖进行各项金融交易的国家来指定销售地，并在最后一刻在那里指挥发货。所谓的联机系统为生产的实际行为提供了巧妙地计划好的最优机制作为先决条件，不过这一条件不占空间，也不属于制造业。这样一来，生产会在最短的时

① Eberhard K. Seifert, *Arbeitszeit in Deutschland: Herausbildung und Entwicklung industrieller Arbeitszeiten von der frühen Industrialisierung bis zum Kampf um die 35-Stunden-Woche*, dissertation, Fachbereich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Wuppertal: Universität-Gesamthochschule Wuppertal, 1985; “Zur Misere der amtlichen Arbeitszeitstatistik in Deutschland”,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 XXVII (1987).

②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间内进行，而所有其他的条件，从财务核算和仓储开支到各种辅助作业，都设在外围，但都随时待命。灵活的自动化只是技术的各种灵活的生产模式的化身，而这些灵活的生产模式由一个稠密的组织机构网络组成，这一网络又是由各种通信技术手段或者小型的辅助产业单元和亚单元相互连接而成的。在经济上有价值的时间再也不会因为工人在机器上怠工而丢失，但在这种情况下，在组织机构中会存在为尽可能同步地优化时间而需要付出的奢侈的等待期。拉里·希尔斯肖恩（Larry Hirschhorn）建议说，处于待命状态的高度专业化的就业大军应该加以整顿了。除了高度专业性和辅助性之外，他们必须要献出的就是他们的时间可用性。^①

即便这里所描述的组织机构的形式更接近于一种高绩效的弹性化，而不能被看做是整个生产领域的特征，但它至少是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机构的时间原则。由此，资本、原材料或者被部分加工过的产品以及作业，都要根据财务状况、市场和订购情况，遵循短期的、最经济的、时间可用性的原则来组织。时间就是金钱，但金钱与时间不再单单存在于机器之中，而是存在于一个广泛分支的、多层交叉的、错综复杂的组织机器中。只有这样，才随时可能进行“弹性的”配置和重新配置。时间上的可自由支配性从投资经市场开发到销售而扩展开来，时间网组建空间网。

单纯基于优化的弹性化原则进行生产还不够。因此，制成品，尤其是电力设备、计算机、传真和视听工艺，包括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份额都日益增长，这使得一部分科学实验的时间进入到工作时间和日常生活的时间，这种科学实验的时间带来产品与技术设备的开发，导致了工业制造的时间逻辑，产品与技术设备的生产都离不开这种逻辑。要使这部分时间得到运转、得到不断地利用和销售，需要给那些体现了这些时间的具体化过程以类似的时间可自由支配性。时间可用性的逻辑并不仅仅停留在工业制造领域，而是向外扩展到了其他各种职业中，并进入所谓的自由时间。一个生产流程的基础是必需投入的随时

① Larry Hirschhorn, *Beyond Mechanization: Work and Technolog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 Boston: MIT Press, 1984.

可用性，作为一种优化原则，它要求一种相互关联的（自由的）时间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消费所需要的时间也表现出和那些内置于技术产品中的时间类似的性质。假定一组高收入的用户，对他们而言，消费时间就必定如此，只有如此，事物的可用性才同其内设的意图相符。然而，不仅个别产品预留了一定的消费时间，自己动手做的所有产品和个别服务都预留有一定的消费时间（例如，有人认为自己动手做这些有助于身心的治疗、按摩和身体锻炼），这种消费时间也啮合随时可用的性质。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在极端的情况下，它会导致一种切换开关（switch-on-and-off）的文化，在其中，各个时间序列的衔接变幻莫测，或者说，这样一来就可以人为地操纵各种时间上的巧合：在生产过程的时间序列和同时性中明确呈现出来的经济理性被扭曲了，但并未因而完全遭到废弃。

于是，各种冲突纷纷登场，它们几乎无处不在。例如，在由市场和國家所确立的各种时间体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灰色区域，黑市经济的劳动时间在那里非正式地蓬勃发展，它们有意识地逃避保护工时的规章和税法；在雇主和工会之间，围绕缩短工时而发生的冲突（内情之关键远不仅于此），还有待于国家的社会福利立法来进行调停。而面对普遍的金錢傾向和随生活境况而千差万别的两性雇员的各种时间倾向，要轻而易举地找到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此外，在一些人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了冲突，这些人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多设计工作事务的可能性，以便达到那种旨在传达更多自主权（即紧张压力感的缩小）、更多把时间构建成有意义的、自身连贯单元的可能性的时间“质量”。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存在着源自机会成本，并在“买现成的与自己做”的两难之间表现出来的持久冲突。所占比例更大并充满个体悲剧的社会一政治的冲突，根源于失业，根源于被迫产生的“自由时间”，根源于工作可能被分配得“更为公平”的程度。此外，大众福利领域也满是冲突，在那里，市场和國家在教育、医疗保健方面提供公益，并且这些公益通过社会服务的渠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没有自愿和无偿的劳动（而这意味着妇女的工作和时间），当前的标准就不可能维系，无论如何，仅从公共部门日益增长的花费来看，要承受当前的标准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有偿的公共时间同私人的无偿时间之间的关系。一个不受國家干涉的独立的私人领域再也不会存在。并且，

这种假定的对于市场力量的诉求已经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它日复一日地被政治现实所驳斥。公共时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私人领域之中，而私人时间只能在行使政治的情况下得到保护。这发生在妇女依据时间政治学提出若干要求，要求一种新的日常文化和新的日常权利之时。^① 市场和之间、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被迫和自愿之间、有偿时间和无偿时间之间的冲突的所有其他的线索，都为妇女的各种时间冲突做出了示范。她们的冲突来自一种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和时间体制所具有的充满冲突的经验，在这种体制中，男人的时间永远不同于女人的时间。因此，不同的时间文化得到了发展，但这种发展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根本不属于我们所预期的那种生产力。这里所爆发的冲突是一场争取新的时间文化的斗争。

每一种处理时间课题的方式都永远不会单纯涉及时间自身。正如政治学家所说，即将爆发的时间冲突就是战略上的要地，就是政治上的竞技场。在这里，关键在于更好地理解各种社会进程正追逐哪些方向，又有哪些选项是行得通的。时间分配模式方面的各种转变（我们可以在进行历史调查或国际比较过程中发现这些转变），产生了意义深远的社会计时图（chronograms of a society）。几多时间留给我们自己，几多时间留给别人；几多时间用于工作赚钱，几多时间用于义务奉献；几多时间用于购买，几多时间用于制造；几多时间用于基本需要，几多时间用于奢侈挥霍；几多时间用于等待；几多时间用于作为。我们可以对能实证地加以确定的分类表进行提炼，也可以差不多随心所欲地继续列下去。所有分类都同时对某种内容及其特性有所说明，该项说明来自这种分配模式与其余分配模式的关系。依据社会分层的特征来分类的各种愿望可能会与现实彼此交织地发生冲撞。我们可以回顾性地“估价”社会发展改变了什么，以及这种改变“带来了”什么。

在一度存在过的中世纪小镇中，我们能够获得这种研究在日历和时间计算方面的最初的经验数据，美中不足的是它们的支离破碎和所受到的各种地方模式的制约。那么，这里恰好有一个在时间的社会分配方面

① Helga Maria Hernes, *Welfare State and Woman Power: Essays in State Feminism*,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的历史性变化的例子，像所有其他的实证发现一样，对它的解释是开放性的。在欧洲，从机器时代开始，工时的延长和逐渐缩短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发展过程。例如，德国在18世纪前后盛行的日工作制是10到12小时，1820年上升至11到14小时。1830年到1860年间，在英国，由于劳工运动，缩短日工时首次以10小时法案的形式写入成文法，而在同一时期，德国的日工时增长到了14到16小时。^① 礼拜天和假日在多数情况下被剥夺，而每周的工时也相应地暴涨。由于1870年左右的社會—政治立法，事情终于发生了转折。

从那时起，欧洲各国先后经历了一系列连锁的发展过程。人们平均寿命的延长全依赖传染病控制、排污系统、卫生条件、医疗进步和公共医疗体系等方面的进步。广泛存在于19世纪各个时间段的童工，在20世纪初彻底得到限制并最终取缔，此外，他们还得到了在各个公立学校受教育的机会。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孩子们去上学，而不是过早地被劳动所压垮，人类劳动力会完成更多的工作，并且，通过群体健康状态的改善，其产出会普遍提高。福利国家具有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和各种社会保障机制，这样的国家会将自身确立为历史性的“世纪工程”。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中期前后，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社会服务机构确立的程度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对于额外工作者的需求增长的程度，才足以使妇女们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大多具有了专职工作。这种发展以一系列数字的形式得到了传达，在其中，工作时间以工龄的形式得到表达。^② 根据这些数字，上溯到1871年的英国，一个男性工人一生中差不多有56年时间花费在工作上；到1950年前后，这个数字保持在50.9年左右；直到1981年这个数字才降到46年。因此，整个一个世纪的进步也可以通过男性人口所获得的10年工作外时间而得到估价。像所有的统计数字一样，这些数字不仅仅掩盖了个别差异，而且忽略了历史事件、战争或者殖民扩张的影响。而在妇女这一面，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

① Seifert, *Arbeitszeit in Deutschland*.

② Jesse Ausubel and A. Grbüler, "UK Working Time Indicators", Laxenburg: IIASA 1988, mimeo; P. J. Armatrong, "Work, Rest or Play?", in: P. Marstrand (ed.), *New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and Skills*,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4.

番图景。至少，她们在官方的统计数字中最早在 1871 年貌似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体，虽然那些数字仅仅是把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光阴记录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少得可怜的薪酬。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最初阶段，这部分光阴差不多有 20 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数字是恒定的，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波动，而后就持续上涨。到 1981 年，英国妇女一生中有 30 年时间离家工作。在另一项关于英国男女两性可以达到退休的工龄的调查中，作者得出一个结论：男女两性所在行业的实际 (de facto) 结构配置开始浮出水面。两者在工作时间方面都变得零碎且不连续，职业的社会衰退加剧，兼职工作的比例上升，这种兼职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边缘状态，退休年龄则显示出急剧的变动性，那些不被正式认可的就业状态的含糊性正在上升。这与工龄的总体持续时间正日益达到非工龄的持续时间的发展背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扣除工龄之后，男性和女性平均剩余的时间就是他们工作以外的时间：差不多是 30 年。^①

我们几乎马上要为所赢得的时间欢呼了，然而，一旦考虑到大部分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所必须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的微观结构，我们马上又会静默下来。因为，如果已知统计学上的平均寿命年限，就会得出一个明确的常量 (Ausubel 和 Grübler 曾做过研究)，即：如果把男女两性的正式工龄按 100 年 1 个周期持续累加起来，那么，尽管平均寿命增长并且进入工龄的累加，尽管家用技术与提早退休节省了时间，还是不能改变什么。在 100 年的周期中，人们的工龄（这里的人们指的是男人和女人）通常可达 38 年的时间。^②

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立即推算出来，这样一个常量表达了一个社会要维持其自身所需要的“必要的”时间量，这里所谓“自我维持”的水平是可变的。但这样的推算是徒劳的，尤其是当一种可自由获取的“剩余时间”要从这样的推算中推断出来时。至少，机器时代所指向的是开发所有可用的时间储备。按照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描述，生命被分成两个区域：用于生产的时间（它被耗费在机器上）和用于再生产

① Schuller, "Workending and Institutional Time".

② Ausubel and Grübler, "UK Working Time Indicators".

的时间（劳动能力的身心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若平均寿命大大变短，而受教育时间与现今相比又达到最小值，那么，大多数人口都不存在时间储备：老年人没有多少时间储备，更毫无今天所谓的自由时间或消费时间可言。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都被整合到了生产过程中，并且不得不担负起她们家庭中所紧迫需要的再生产的重任。因此，被人为构建的某一常量（例如人们的 38 年工龄）所掩盖的东西，必须要在更全面的变化的语境下得到理解。

这些变化之一涉及 19 世纪的工作状况以及 20 世纪赋予自由时间概念的内涵。对于 19 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以及工人运动活动者而言，劳动被视为经济财富的源泉，被视为最根本的人类需要。如果进行社会斗争是以对“工作权利”的要求为名，那么，这就意味着一种对分享经济剩余价值权利的宣告，对发展人类及其所具有的各种能力有益的工作权利的宣告，而这与要求补偿的观念并不抵触，相反却促进了这种观念。人们要通过社会关系方面的激进变革“救赎”工作。尽管“从完全被工作所占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奇迹”^①是否会永远变成一种现实，“获释”的时间是否会成为自由、解放和自我实现的源泉，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一种会随着新希望的出现而破灭的幻想，所有这些仍是社会反思的基本课题，但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20 世纪一直饱受对自由时间之希望的煎熬。

鉴于工作时间的负担，即便仅从时间的数量上来说，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想要更多的自由时间的愿望是无法抗拒的。然而，“获释”的时间从哪里来呢？其中一部分可能可以通过劳工运动的顽强斗争从雇主那里夺得，而这种斗争又总是同各种导致生产力增长的技术进步和组织的合理化相互结合。另一部分源自妇女们以前不可见的时间储备，这些时间储备在计算人们工龄时属于未被正式认可或未得到表现的“社会自由时间”，即便这些时间实际上要贡献于非正式的、无偿的工作。然而，矛盾的是，有一部分获释的时间正是源于时间需要的高度集中，这种需要由机器时代开始引入人类历史，用于生产的时间需要以及用于消费所生产物品的时间需要。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效率的进一步增长不仅

① Christian Lalive d'Épinay, “Die soziale Ambivalenz der Freizeit”, in: Rainer Zoll (ed.),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 409.

仅是工业生产领域的一个必备条件，而且为了能够消费为消费而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还必须要更有效地形塑、组织时间，使时间合理化。需要和消耗时间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生产、为了摧毁所生产之物以便为新产品和新服务腾出地方，也是为了能够维持并再生产出持续进行生产和消费所要求的各种条件。

创造消费时间的必然性已经包含于革新、重复和淘汰的周期循环之中。消费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它可以是在某个快餐店狼吞虎咽，也可以是尽享豪华的大餐，市场上用于消费产品和服务的配套设施也可以被做成各式各样的，但无论如何，消费总是需要时间的。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思想家之一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他在1883年出版的《懒惰的权利》（*The Right to Laziness*）一书中提出这样一种理论：资产阶级必须由勤奋变懒惰，因为工业社会不仅依赖于生产，还依赖于消费。^①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则在1933年所写的《消费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pending*）一文中得出结论说，不存在不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也不存在把它的大部分时间、动产和能量都消耗在非生产性支出上——实际上就是挥霍的社会：“像人类的穷困一样可怕的是，社会永远无法把自己控制在追求赋予生产一种表面目的的自我保存，比追求非生产性支出更重要这一层面上。”巴塔耶还指出，每个社会都必须应付两大主要问题：用于自我保存的生产和用于种族繁衍的生产，这体现了所有社会体系发展的起始点——消费以及对剩余产品和能量的摧毁，因为这形成了对增长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反作用力。

“必要摧毁”（necessary annihilation）的理论，是对不同社会为毁灭其剩余产品所选择的摧毁模式的研究，其着意于各种极端的消费形式，好比坐落于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部落，在他们例行的各种用于挥霍的节日中的做法（譬如说冬季赠礼节）^②，而最极端的消费形式无疑是战

① Paul Lafargue, *Das Recht auf Faulheit und andere Satiren*, 1986. (Original 1887—1888).

② 冬季赠礼节（the potlatches）：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某些美洲印第安人的庆祝宴会，如婚庆或就职庆典。在宴会上，主人会根据每个客人的不同身份或地位分发礼物。在两个敌对的部落之间，主人会在这种宴会上炫耀性地大肆捣毁或分发贵重礼物来显示自己的财富。——译者注。

争。然而，摧毁不一定需要很多时间。真正需要时间——用于消费的时间更可能是那些缓慢的挥霍，范博伦（Veblen）曾经把这样一些形式描述为用于精明的中产阶级消费的时间分配方面的奢侈支出。而大众生产也就意味着大众消费。对“大众闲暇”的恐惧激发了无数对闲暇的调研，这些调研表明，正在破天荒地享受“闲暇”的这个阶级却失去了闲暇的能力，这是文化伪善史中特别的一章。^① 如今，虽然这种恐惧还没有完全得到克服，尤其还涉及与大众传媒有关的被动消费，但消费的起始点仍是不同的。

专供消费的时间的限度、结构和本质，得自于所生产的物品以及进行生产的工作条件。当然，“职业的巨擘”依然持续地触摸着生活，但它变得更长也更间接了。今天的人们如何度过专供消费的时间呢？人们在这一时间中做了什么又是怎样做的呢？这些都导源于两个初始条件：个人自己的工作条件以及日用商品与服务的特性，亦即其他人所生产物品的性质。它们自身承载着自己“内置的时间”，这产生了对于所有想要消费它们的用户的特定的时间要求。工作过程可能在时间上被拆分开来加以优化，并首先得到强化处理，同样的意图也适用于选定的闲暇活动。在其中，日用消费品自身承载着适于用户自主开发的内置的、预先生产出来的、程控的复杂性；每种娱乐都有其自己的一套设施、装备以及施行的时间表；每种消遣都要求呈现出一种职业特征，要求一种“生活方式”所具有的自由时间以及相应的感情共同得到传播，消费变成了对生产的仿制，人们所能做的只是跟随既定的时间表。消费时间过去曾经内含于劳动，它的持续时长和负载物模塑了以一种直接的、非生产性的方式——剩余的时间（它主要地被经验为工作以外的自由时间）。在这里，人们只能像在进行一种残酷的模仿秀一样，听凭工作来发号施令，因为，自由时间的内容和结构都只能起到一种补偿性的作用。诚然，今天在消费自由度以及消费活动的选择方面，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个人在收入等级体制中的地位，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限制，还有与之相关的职业模式，但这些主导因素都是通过以日用消费品，以及这

① Georges Bataille, *Die Aufhebung der Ökonomie*, Munich: Matthes & Seitz, 1985.

些消费品中内置的时间结构为媒介汇集到一起的。消费时间变成了社会分化的全面进程中的独立一隅。但是，与部落或农业社会中所举行的冬季赠礼节或其他节日不同的是，工业社会中的节日在时间方面是节制的，大多持续时间很短。它们自身倾向变成日常的例行公事，这样就引发了对于新节日的渴望，而这些新节日不久又会变成日常的例行公事。这也同以前在最大限度的劳动强度，同最大限度的闲散之间的交替形成对比（这种交替源于以任务取向为主的时间分配，它对农业社会以自然节律为准的不规则的时间体制产生了影响），今天更加趋向于把劳动密集度扩展到闲散时间，即专供消费的时间中去。

然而，除了生产时间和消费时间之外，还有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这里也对国家的作用加以分析（它已经进入有关两性间劳动分工方面的分析），那么，在时间配置方面，公共的、有偿的时间与私人的、无偿的时间之间的转换，以及它们在交换关系方面所存在的冲突，就都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对于福利国家（在此处，它同义于承认多种以具体的历史形式表达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工作都是使各种社会保障机制结合在一起的最主要的、整合性的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中，正是某人的失业状态（包括这种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关乎什么能力，由什么所造成）决定了他或她在生病、发生意外事故、失业和年老等情况下，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权从社会保障体制中获益。在劳动力市场上，正是已支付的、得到预先筹资的时间决定着许可谁（正如刚刚提到过的保险索赔案例）不劳而获。针对那些未受这种工作保险体制泽被的人（他们甚至没有以一个男性雇员为经济支柱的家庭关系），各种补救措施纷纷出台，然而作为扶老济贫的延续，它们总是仅仅被设想为一种安全保障网。福利体制的原初目标在于，当由于各种公认的原因而失去收入，也就是说，当发生失业或者是日常的家庭安全保障网失效时，使人们获得有效的生存手段。在福利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出现于20世纪中期以后的“三十年黄金期”^①），随着公共支出的迅速增长，国家担负起发展各种再生产

① “three golden decades”，是指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期。——译者注。

任务的职能，这些任务在早期的、初步的、还没怎么分化的阶段，已经在家庭范围内得到了执行。现在，教育、保健和社会服务都获得了发展，它们分别职业化，并扩展到了政府统治的层次。当今，具有收益权的不再仅仅是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人，现在所有人基于他们作为本国公民的普遍身份，都被赋予了各种新的“社会权利”。

在这一阶段，女性首度大规模地进入公共生活和劳动力市场。通过新近产生的有收益就业的诸多机会，福利国家本身变成了女性最大的雇主。不仅女性所肩负的担子得到了助手、教师、医生、社工和治疗专家的分担，她们自己也投身于这些职业。首先是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作为雇员和公民的双重身份。越来越清楚的是，女性肩负着无形而又无偿的工作重担，这种工作是公共福利体制所不可缺少的。同时，下述事实也更清晰：女性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活处境而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各种时间偏好；女人渴望更多的时间，而男人渴望更多的钱；女人迫切要求工作日的缩短，而男人更向往超长的年假。她们开始表达这些偏好，并用她们的旨趣来对抗各种社团组织的旨趣。作为公民，她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工作时间”，还有“日常生活的时间”，即那些她们在自我假定的私人时间中以多种方式履行的任务所需要的时间。^①

由于福利国家承担了各种再生产的任务和各种以前在家庭范围内履行的服务，即使在更小的范围内，既不用专门化的方式，也不用职业化的方式，进入公共的、有收益就业的各种时间模式，还是不能自动适应工业生产的那些时间模式。即便学校里的课程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完全标准化，即便医院或者敬老院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被看做是适于患者的“工厂”，配备在这里专用于护理的时间周期，还是不能以它们针对新生产技术所使用的方式来进行合理化、自动化或者是柔性安排。由于新通信技术所带来的个人服务的普及，各大医院和各种社会服务的计算机化虽然尚未来临，却也为时不远了。无论如何，这里仍存在与病人或顾客互动的周期，这个周期很难通过机器来处理，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给予和花费的均衡的磋商过程。彼得·普理查德（Peter Pritchard，一位把时间问题作为医患之间的互动形式来处理的少见的医生）赞同一种参与式

① Müller-Wichmann, *Zeitnot*.

取向，“它不会受到各种职业的普遍欢迎，但会得到缓慢的普及。”^① 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更妥善地利用各个等待周期。即便医生以及其他人通过更好的组织形式和个人生活习惯与工作习惯的改变，都学会了更好地统筹他们的时间，还是会存在某种顽固的残留：人与人之间相互照料的时期，不能完全被技术所取代，不能完全以金钱来衡量，也不能被组织所替代，无论这个组织的服务如何巧妙；不受金融掌控的时间残余，作为人际关系的交换媒介，依然以其不可归约性和普遍性抗拒着金钱这一一般等价物以及它在市场上的主导权。只能以时间来交换时间的关系还有所保留，在这种关系中，相互性的准则决定着人们交往的基调。然而，我们能看出，同情、友爱和休戚与共，只有通过个人的在场才能得以表达的那种时间正在退却，新的惯例正从经济上确立起可接受的交换关系，届时，时间就会被金钱和技术所取代，被已购买的替代品所取代。个人的在场在技术化交流的帮助下（如电话传声、电子会话等即时而却并非直接的交流取代了完全的个人）变成不完全的在场。这里所保留的是一种交换关系的古老残片，在其中，时间只能用时间来交易，还不存在用金钱购买的替代时间的媒介。所有相互照料的时间、同悲共喜的时机，也就是在性质上千差万别的时间，依然追踪着那些古代的残留，但它们仅仅是残留而已。

当然，在福利国家的日常惯例中，人们的服务时间是以更司空见惯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近年来，各种私人的组织形式、无偿的自愿劳动以及非正式的传媒网络也已经发展为政府社会政策的主题。^② 患者和顾客正被揭示为职业助手的“搭档”，他们正受到职业运作机制的操纵。他们的时间是配备个人自我服务和自助的重要资源。在降低社会保障收益的压力之下，出现了一种对所有非正式的可用资源的相应重估，这最终回归到了无偿的、私人时间资源。劳拉·巴尔博（Laura Balbo）已经在这种联系中使用了狂热的旧棉被的象征，五颜六色的布头被美国先锋派的女性们用她们剩余的自由时间缝合到了一起。确切地说，在今天，女性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利用她们的剩余时间来配置那些家庭服务、学校和

① Hernes, *Welfare State and Woman Power*.

② Peter M. M. Pritchard, "Doctors, Patients and Time: A View from General Practice", in: R. Frankenberg (ed.), *Time and Health*, forthcoming.

俱乐部服务、医院服务、邻里以及办公室的服务，而这些都被看做是私人的。^①

在劳动力市场，普遍的金钱偏好支配着时间偏好，人们在其私人时间中所做的被解释为消费者欲求。然而，因为原先的私人时间侵入公共空间，并得到公共形式的偿付，它变成了公共（工作）时间，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公共与私人之间的边界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有关工作与时间的公平分配的新政治问题产生了。所有对工作时间的一定的偏好，都是与特定的人生阶段和处境相关的偏好。它们取决于性别和年龄、个人的家庭背景，收入和阶级归属。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经历受到常规工作环境的制约，变得更加不稳定，以至于时间偏好也出现更大的波动。它们都成了过渡性的偏好。^②

如果仅仅把围绕缩减工时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和艰难谈判看做是对以往冲突的延伸，而不是看做更为根本的分配和组织的问题，那么，这种分析就没有切中要害。公共时间和公共空间扩张到原先所谓的私人领域，这种扩张如火如荼——技术正跨越这条公、私边界，也横亘在刚刚描述过的旨在追求普遍的公共福利而得到配置的各种无偿的自由时间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人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具有公共性，变成了市场和国家的组成部分，从而脱离了原先的匿名状态和政治防护层。消费者和女性公民要求新的权利，并寻求参与那些干预其日常生活的政治程序的形成过程。工作时间的政治学和生命时间的政治学密切相关，它们通过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而环环相扣。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模式依然基于权利、激励和成就，它们源自连续的、终生的、全职工作的履历。然而，这一常规情况已经不再是常规，正如常规的工时早就变成反常的一样，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部家庭中只有 1/4 符合通常的常规家庭概念——有子女的双亲家庭。

然而，情况还不仅于此。面对老年人比例剧增的人口偏移状况，以

① A. Evers, H. Nowotny and H. Wintersberger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Welfare*, Aldershot: Gower, 1987.

② Laura Balbo, "Crazy Quilts: Gesellschaftliche Reproduktion und Dienstleistungsarbeit", in: Ilona Kickbusch and Barbara Riedmüller (eds.), *Die armen Frauen: Frauen und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及与医疗技术化和人们的期望与要求的同等上升相连的成本增加，甚至公共保健部门和国营的社会服务项目也正陷入困境。马丁·拉格尔格伦（Martin Lagergren）在有关瑞典福利体制中，由职业助手来分配时间的研究文献中写道：“照料首先是一个某人为其他人花费时间的问题。”^①借助仿真模型，该项研究已然推测出，这个体制不久就会面临财务可行性的限制。^②到了那时会发生什么呢？无偿的、被迫切需要的时间要从何而来呢？就像现在对个人收入征税一样，国家对其公民的“自由时间”课以重税会成为解决方案吗？或者，解决方案存在于全自动的医院（其中配备的是通过屏幕传递护士微笑的由电子连接的病房服务）？

“自由时间”的概念掩盖了政治选择权的可能性空间。在市场上，根据收入状况，产生了是购买还是自己做的选择权。通过金钱这一普遍的交换媒介，所有的时间分配都取决于消费者。在国家政治学的领域，问题在于：如何制定出对生命时间的政治学和工作时间的政治学加以调解的选择权，对所有人终生都能充分就业这一难以达到的理想，和存在着各种兼职工作的极端零散的就业现状（在这种状况下，雇员全在雇主的掌控之下，没有工会的保护，因而时断时续地获得工作）加以调解的选择权。问题在于找到两性相互分歧的利益与时间偏好的平衡点，还有得到共同组织的工会的不断扩大的利益冲突与女性渴望更多兼职工作之间的平衡点。这里所讨论的工作与时间分配的问题，在诸多方面都被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源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处位置的各种身份和权利，总是被证明比普通女性公民的普遍身份更为强势。各种新的困难源于缺乏一套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时间性质的可普遍应用的标准。时间可转化成金钱，但对那些生活处境截然不同或者是时间模式截然不同的人来说，同样数量的时间，其意义却大相径庭。由此看来，起源于机器时代的纯粹数量上的时间要素已经加入了从性质上得到组织的因素，这种因素令纯粹量化的时间相形见绌。以差别的方式认识到时间的本质、时间的价值和社会背景是一回事，而满足组织日常生活事务能力的不同的政治要求又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下，时间都已不再是

①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② Martin Lagergren et al., *Time to Care*, London: Pergamon, 1984.

私人事务。这里所呈现出来的解决各种冲突的前景如何？赫尔穆特·维森塔尔（Helmut Wiesen­thal）从积极参与者的战略性观点出发，以详尽的分析得出了某些引人注目的结论。其中最糟糕的很可能是那个以实证方式确立起来的结论：在更大的受雇群体想要“更多的时间”并准备为此不惜牺牲一部分收入的意义上，不存在普遍的时间偏好。^① 在现行工时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广泛传播的背景下，存在各种受到限制的时间偏好，但是，这些偏好是不可通约的。即便是在货币交易的影响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还是会有大约 3/4 的交易者会青睐现在的这种时间—金钱关系模式。维森塔尔由此推断出，对自由时间的相对需要接近饱和。当然，不排除有逆转的可能，但可能出现逆转的条件是狭窄的，这些条件包括：必须要有像早期要求八小时工作日那样明确的目标；实际收入必须要有一小段时间的持续上升，以便创造对更多用于消费金钱的时间的需要；必须要提供更富于吸引力的自由时间的使用或者所谓收入—替代（income-substitute）的活动，比如在某人自己的花园劳动（其以不存在对收入的额外需要为前提）。由此推断，要想对相互分歧的各种工作时间模式重新标准化，前景是不容乐观的。由于现有工作时间状况的初始位置极端发散而又极端不平等，要想对工作时间实现水平化的调整只能以个别的方式进行特定的改变。转而言之，这同样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工作时间分配模式的目标定得越具体，能够实现自身偏好的雇员比例就越小。从大多数得到明确表达的时间偏好来看，没有一个能得到社会性的普及。

工作和生活的处境似乎已经步入一种时间流变的状态。对时间体系的经验随个人的生活处境而改变，并且，对时间的认知也变成了一个应变量。在某种状况下，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活处境和不同的生活领域之间必须要有频繁的变化，而在这种状况下，各种个别取向中的决定性观点也就更容易发生改变。然而，在这样一种以时间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所有人都更强烈地渴望自己有权处置并拥有某种必须保持自身有效的东西，它就是：个人时间。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一种在结构上相互矛盾的不同时间模式的

^①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集合出现了，在其中，不确定性在争取新的秩序。为了重新组织工业制造业，工业生产领域被赋予了全方位的合理化特性。灵活的制造业体系同时促进了专门生产和大众生产，通过所谓“即时制生产方式”（just in time^①）的组织，我们可以使生产紧密地适应需求（这种需求正变得越发复杂），工具就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工艺流程的交互网络和由供应商在时间上优化了的交易网络。扩展了的技术化和组织化的可能性啮合了既节约成本又节省时间的优化，不过，它们也增加了人类出场和机器处理相结合的一些模式。这些新的结合可能性（它们使得从以往种种僵硬的实际约束中解放出来成为可能）是否会传给雇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传给雇员尚待讨论，这个问题终将在政治上尘埃落定。^②

另一个极端则受制于各种时间模式，这些时间模式尚未受到同样的合理化压力（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无偿时间，无偿时间既与每个个体密不可分，又使各个个体紧密相连）。在服务性的时间中，借助人来实现并以人为目的正是时间的可用性（随时可用）。在这里，尽管我们无法完全归纳出可能由技术或者其他有偿辅助者来替代个人的最低限度的经济条件，但却存在各种优化的策略。对于只有他或她的母亲在场的情况下（她必须要待在见得到的地方以供监督）才能独处的孩子，以及把这种在场监督同无数交叉重叠的“副”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母亲（她同时开始断断续续地例行家务），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惯于日常时间的某种“弹性化”，但从经济学上说，这种弹性化还没有被充分地合理化。彼得·普理查德建议医生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他们的时间：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另外找到时间拯救垂危的病人，医生们同样应该遵循一种弹性的、优化的常规，它以随叫随到为取向，但并不完全纠缠于金钱关系。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关乎时间的棘手问题，例如：它还不能完全被金钱所取代，其中一些仍要使用以时间交换时间的天然流通方式，并且由此，它还要服从相互性的准则，然而，在优化和弹性化两种模式之间，

① JIT 即时制管理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生产管理技术，是多种手段和方法的集合，这些手段和方法的目标是保证企业制品库存减少、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人力资源节省、产品质量提高。——译者注。

② 同上。

近似于经济学计算的某种结构上的配置过程还是发生了。当然，正是这种混杂的模式将使得我们探索时间的道路漫漫其修远兮。职业助手的时间是有价值的，而对价值构成贡献出更大份额的还是执业者自己。通信技术的用户友好型无微不至，它更高效地形成并混合了执业者和职业助手两者的时间。各种不完全的解决方案优越于任何一种完全的解决办法。但最终的交换关系还是要由市场来操控，由金钱这一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来确定。以时间交换时间的天然流通方式依然是古老习俗中讨人喜欢的一种形式，是社会存在中残留的一种礼制。它不会整个被消除，而是注定要成为一种例外。它现在已经归属于另类的、“神圣的”时间，飞快地退出了经济建构的进程。它还保留着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能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明确地说明，然而，它恰恰由于这种稀罕性而变得弥足珍贵。因此，经济学的法则——稀缺性得到了确证，尽管这里已经脱离了该法则的适用范围。人类时间中有那么几个瞬间能够逃脱金钱关系，所以，它们就获得了使自身明白无误的重要意义。矛盾的是，恰值西方的合理性和合理化使所有时间都屈从于市场关系的匿名性以及它们彼此置换的能力之际，这种在西方颠倒众生的时间才得到清醒的认识。恰在此刻，对个人时间的新诉求产生了。这种诉求难道也不过是一种假象吗？

第五章 渴望这样的瞬间

我不自为，谁当为我？
我倘自为，我当其谁？
今若不为，何期有为？

——《密西拿》：《教父语录》^①

大概以前从没有这么多人像今天这样同时地经验到时间。对多数人来说，这种经验绝非自愿。戴着产自香港的手表（香港每年出口 5.9 亿块手表），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西方合理性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和社会结构之中，这些精神领域和社会结构从前处于它们自己的地方时间之中，并附属于另外一些不同的时间结构。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时间压力加剧，人们正尝试各种逃避的方式，在那里，各种旨在走出西方时间的乌托邦时间（uchronias）产生出来。人们有意识地在性质有所不同的东方神秘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时间感中探索另一些时间经验，寻求通过冥想和放松，通过复兴或者流连于这样的瞬间，来逃避日常的压力。在西方，不仅带有其自身时间经济学的各种文化大行其道，诸神也开始易位，同处三界的佛祖到处显灵。但大多数尝试都没什么新意。一方面，这些尝试发生在相互抵触的领域中：个人力求能够实现部分个人时间与力求把可用的时间建构成有意义的单元，并能够依据自己的日常需要对其进行优化之间相互抵触；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层面上，务必要妥善处理扩展了的现在所包含的各种限制。是否能够有意义地擅用个人时间取决于起点不等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权力阶层和收入阶

① 德文原文如下：Im ein ani li, mi li? Ouk' she ani, lei atsmi, ma ani? Weim lo ashar, ei ma tai? ——Mishnah, Sayings of the Fathers.

层。理解扩展了的现在所具有的各种限制并设法处理它们，这有待于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它寻求解决的正是科技文化自身所带来的问题。一言以蔽之：人们的时间“质量”的口号下所隐藏的远远不止数量的要求。

一方面，社会学家认为，“上述时间并不稀缺。我们经验到的时间稀缺只是各种过度的期望所造成的。各种经验和行动都需要时间，并因而最终以某种有限的形式纳入一个既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因此，时间和期望结构必得有所限制。”^①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疲于奔命的经理人这一“有闲阶级”（他们几乎应有尽有，却独缺时间）是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简而言之，就是说：“我兢兢业业，以致心力交瘁并尽毁天伦之乐，然而，我要负担这个后果就要赚取更多。”^② 由此看来，正是所谓“机会成本”激起了人们对时间的饥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个人不工作的代价越来越高，并且时间是根据他以前工作时能得到的报酬来计算的，即以工作和报酬的存在为明确前提来进行考量。在应付“时间短缺”或“时间饥渴”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策略。不同的组织机构和不同的管理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职场母亲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加特殊，她们所依赖的时间既多样化又不均衡。

正如卢曼所指出的，处于时间的压力之下，偏移的发生在组织机构中是一个长期过程，赞同纳入计划和限定的内容，也就是选择了最终按照所确立的时间优先级来安排实际的工序和进行价值评判。时间的压力

① Nildas Luhmann, “Die Knappheit der Zeit und die Vordringlichkeit des Befristeten”, *Verwaltung*, vol. I (1968), p. 13; “Weltzeit und Systemgeschichte”,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vol. 2,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3; *Vertrauen: Ein Mechanismus zur Reduktion sozialer Komplexität*, 2nd edn, Stuttgart: F. Enke, 1973; “Temporalisierung und Komplexität: Zur Semantik neuzeitlicher Zeitbegriffe”, in: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vol. I, Frankfurt: Suhrkamp, 1980.

② T. C. Schelling, “Foreword”, in: *Time in Economic Lif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 (1973), p. 627; Staffan Burenstam Linder, *The Hurried Leisure 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Jacob Viner, “Market Prices, Opportunity Costs, and Income Effects”, in: Carl F. Christ et al. (eds), *Measurement in Econom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有利于“将机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纳入体制化的轨道”。这意味着，在获取价值观念的方式既高度复杂又高度多元的社会体制内，把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比如说不同的生活观念、卫生保健观念、娱乐的观念、和睦的观念、文化的观念、自由和养老的观念等分割成一个时间上的序列是非常有益的。这会使它们失去生存斗争所具有的尖锐对抗性。如此一来，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决定当下的优先顺序；未予优先权的其他价值观念的信奉者并没有被否定，只不过，他们尚需等待。同时，可以通过信托和规程来节省时间，此外，也可以通过人为地设置限期，将受阻的任务上升到紧迫而又局促的防护带。^① 无论是在设有任期的组织中工作的管理者，还是有望为其他人设置限期的管理者，都相应地试图解决时间的慢性缺乏。预约日志中的每一小时都由秘书或者助手来安排，他们的任务正是交涉或者说是交易他们老板的时间。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已达成的协议——与身份等级体制高度协调都只是暂时的。一旦新的优先顺序产生，这些约会就得被改变、推迟、重新安排。似乎时间总是竭力去摆脱要给它穿上的紧身衣。^②

身份等级越高，这种约束就越具有暂时性，因为，只有下属的时间能提前得到严格的决定和指派。管理者自身遭受慢性的时间匮乏之苦，还不断试图做更多的事情。他们运用了各种伎俩：集中强化，同时分权处理；使用更迅捷的通信工具，并为赢得时间而同时兼顾更多工作。然而，即便他们日夜操劳，时间也终归是有限的。无论他们把时间安排得多好，有待去做的事情之众，难以实现的可能性之多，远远超出了见容于他们时间的数量。

克里斯蒂安·米勒-威茨曼（Christiane Müller-Wichmann）已经以激愤的语气申明，要想不丧失对于“不平等的时间门槛”的洞察，我们就完全离不开处置残余时间的可能性问题。对于管理者以及其他一些人来说：

他们属于特权人群，尽管负有时间数量上的重担，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总有能力建构他们自己的时间。因为，他们可

① Luhmann, “Die Knappheit der Zeit” .

②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 217.

以说是既能使时间加速，也能最先用毫无意义的闲散时间创造出自由的时间来，这些闲散时间首先由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女性还不具备的可能性得到呈现，女性时间的组织要么规定严格，要么极端零碎，以致可用的闲散时间不能会聚成有意义的自由时间。^①

个人时间的不规则利用问题再度出现在这里。然而，尽管个人时间存在着这些显著的差异，但在可与财富交换的选项——消费、工作、生活面前，时间匮乏感还是广泛地蔓延开来。每做出一个决定都意味着摧毁了一个可选项。最主要的是，通过现代通信工具，人们已经更多地意识到另一些可能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更清晰地体验到了时间的匮乏。无论何时，只要人们专注于一项信息，就会彻底抛弃他们专注于另一项信息的可能性。“他们越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其他许多处所可选择，有其他许多男人或女人可交往，有其他许多聚会、讨论会、展览会可参加，有其他许多路可走，有其他许多书可读，有其他许多个洒满月光的晚上可以消遣。”^②

由以上研究结论以及更多可引证的观点看来，人们不由自主地渴望另一种不同的生命时间并不足为奇。“以不同方式工作”的渴望也成为缩减工时方面的公共议题，这种渴望同时承载着能以不同方式来建构时间的渴望，承载着对允诺逃离日常惯例并实现最低限度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性受阻于时间的实际支出而无法兑现）的时间的渴望。我们需要开始一段新的里程，不过，这段新里程要去往哪里，又怎样才能到达呢？几种不同的乌托邦时间就在这里发生了分歧。在从前的乌托邦中，我们可以勾勒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可以遨游于梦想，“无论是何等敏感的心灵或者何等启蒙状态的理智，都会渴望将其作为一种在社会、政治、道德和文化上对现实苦难的代偿”，但不管它们是一些遥不可及的地方，还是某种虚无缥缈的未来，说到底都是无视时间的不连续性的产物，这样的乌托邦早已不复存在。^③ 而今天的乌托邦时间就是现在，并且在扩

① Christiane Müller-Wichmann, *Zgitnot*, Weinheim: Beltz Verlag, 1984.

② Young, *Metronomie Society*.

③ Reinhart Koselleck, *op. cit.*

展了的现在中寻求实现。

第一条乌托邦时间的路径直接通往全天候的世外桃源，如若对于想要吃饱肚子不再遭受饥馑之苦的人们来说，可以假定在这片想象的乐土上发生过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那么，对现代人来说，充满这一尘世天堂的就是这样一些神奇的公式：“只要我有用于……的时间……”到那时，这种想象会自由驰骋，因为，要实现它所提出的所有愿望只需满足两个条件：有更多的闲，也尽可能有更多的钱。穷人希望享有富人的交通工具以及所有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奢侈品；自由时间的狂热追求者想要创造他们自己的可瞬时并同步实现的娱乐方式（受到擅长架空地广告宣传的工业的诱惑），此外，喜欢沉思冥想的人还想要那么点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纯粹永恒的时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对时间的饥渴得到抚慰，而不再产生饥渴；他们想要在不会因之而短命或晚景无托的情况下活得更酣畅、更满足。更多的自由时间等于更少的工作；更多的消费等于更多的乐趣；更多的生活方式等于截然不同的生活；如此等等，这些简式还可以有多种变体。

第二条乌托邦时间的路径要复杂得多。这是一条最富于传统的道路，其中满是戴着苦役枷锁的被压迫者，在贵族老爷和奴隶主统治的世界中艰难跋涉的足迹。这里变换了时间上的重点。这种乌托邦时间允诺从所遭受的时间之苦中解放出来，人们所遭受的时间苦难不再是12小时或16小时的工作日，而是不断加剧的劳动强度、负面的时间压力，最重要的是，个人自己的时间可自主性日益匮乏。尝试获得简化的强化，尝试以时间“生态学”对抗时间经济，尝试把工作“带到生活之中”——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为争取“重新擅用时间（指人们被工业化以集体或个体的方式剥夺了的时间）而斗争”的代名词，这种斗争具有同时代人耳熟能详的话语表达方式，如“只有理想国才是真实的”（Oskar Negt），并且这种斗争现在也已经找出了时间。^① 自主与自决、代表雇员利益的时间弹性化以及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分配的新形式，是寻求对抗时间束缚的周而复始的主题，它们要用自决的梦想来消除和取代时间的束缚。

① 可参见 Willy Bierter et al., *Keine Zukunft für lebendige Arbeit?*, Stuttgart: C. E. Poeschl, 1988; Oskar Negt,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 Frankfurt: Campus, 1984.

第三条乌托邦时间之路寻求“反复地解冻时间”，为达成其他的时间观念而“在突然性的时间终结的暗影下”反复令时间停止。^① 它的观念基础从时间节奏的变化开始，并努力在机械化的、均质化的线性时间与自然的“生命无常”这一意外性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这一立论直指对自然节律的恢复，上百年来与自然的对抗就要画上句号，体内平衡(homeostasis)^② 要被同期的节律(homeorhythmic)所取代。^③ 不是要全盘抛弃线性，而是要打破人类的例行常规，打破固定不变的模式。习惯的力量赋予社会生活以稳定性，并体现出社会所具有的防护性的、保守性的一面。因为，“没有什么比习惯化的行为更具保守性，一个人正是借助习惯化的行为栖居于日常生活的”^④。习惯的力量要同新出现的、意想之外的日常惯例（它同时也象征着线性）的阻断相协调。周期性的重新引入所要表征的不仅仅是重复，还有某种新路线所具有的推动力。第三条道路拥有更多具体的提议，这些建议以时间生物学和时间社会学为理论依托，其范围从轮班制度的建构到时差反应的缩减，无所不包；它力图提出有实践意义的忠告，以便在变化性与连贯性之间确立起一种崭新的互补关系。它要求创造出一种允许无常发生的新的时间周期：

事件——不管是你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需要把那个维度（变故的维度）恢复到生活之中，那时，它会使我们能够理解并接受它的不连续性、它的波动性、曲折性和斑斑裂痕，并使我们有可能为它的开始和结束做好准备。“无常”要成为从“工作”与“自由时间”的整合体制中释放出来的生活的编码，这种生活并不以保持庞大的机器处于运转状态并让主体去迎合它为目标。那么，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呢？……问题来了：在一

① Dietmar Kamper and Christoph Wulf (eds.), *Die sterbende Zeit*, Darmstadt: Luchterhand, 1987.

② 指在一定外部环境范围内，生物体或生态系统得以维持体系内环境相对不变的状态，保持动态平衡。这种特性又称恒定。——译者注。

③ Young, *Metronomie Society*.

④ Klaus Laermann, "Alltags-Zeit", in: Rainer Zoll (ed.),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 339.

项得自工作及其关联物——自由时间（等同于工作的交换物）的“新生”时间得以政治化之前（或者之中，之期），是否无须进行更基本的擅用呢？自由时间，更确切地说是从工作中解脱出来成为生活时间的的时间，是时间视域向意外情况（这种意外在主观上是可接纳、可处理的，并且是受欢迎的）的敞开。^①

第三条道路更适于女性，因为她们有自身为这条道路准备了更好的先决条件。男性“对时间上的变化性视而不见”，“就已经被推到一旁的无常的秘密优势而言，他们注意不到有什么事同他们相干……直到……某种无常光顾他们”，他们因而更多地身处险境。然而，即便女性以及女性运动无法唤起足够的力量来为男性切断他们正在其上处理自己生活的传送带，或许，只要有刚刚萌芽的对“另类”时间经验的渴望，对“已经不会在早上就断定晚上的日子”的渴望，“就足以导向这条道路”^②。迈克尔·扬引述加纳的铭文说：“所有的日子各不相同。”莫非非洲人早就认识到了在西方获得再发现的乌托邦时间？

乌托邦时间同之前的乌托邦一样，要满足一个核心的社会功能：它们含有解决一个社会中的特殊难题的建议案。汉斯·玛格努斯·安森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发问说：“什么是乌托邦？”“我们看不见它们，我们只能如芒在背般地感受到它们。”奇怪的是，我们对这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之熟稔程度就好像它们已经刺入那里很久了。第一把尖刀的锋芒出自贪得无厌的时间经济的未解难题。在时间经济学证明了能以更少的时间产出更多之后，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对应更多的工作和潜在地更少的闲暇活动的时间方面，我们所做的已经太多了。生产力的提高导致消费的上扬——更多的日用品、休闲活动与旅行，更多的娱乐项目、通信和信息竞相争夺人们膨胀的视野和扩张的时间。产品迫切地要求摧毁，而通过扮演古代牺牲品的角色，摧毁的仪式可以设计得多种多样。相比之下，消费虽然会造成成堆的垃圾，但却是一种无害的摧毁形式。只要求更多时间的这种乌托邦时间并没有避免金钱与金钱积累的数

① Barbara Sichtermann, “Wechselfälle”, in: Zoll, *Zerstörung*, pp. 644-645.

② 同上书, p. 655.

量逻辑。金钱与时间仍然是可替换的，不过，当需要更多时间的时候，普遍的金钱偏好会更具优势。人生可以造就的越多，生命时间被压榨的也就越多。他们认为美国的压榨率是150%，不久以后还会更多。是自我剥削还是自我麻痹？两种解释都行得通，不过是背上的尖刀两面翻转造成的不同创伤。^① 时间自主这种乌托邦时间至少在工人处于机器时代的时间管理体制压榨之下的受压迫期就已经存在了。^② 保罗·拉法格把他的以另类方式反讽的观点称之为“懒惰的权利”。但是，作为恶德或善德的懒惰早已消失，类似于一度被称为倦怠的覆灭了的感觉。时间自主这种乌托邦时间以如日中天的热力战胜了修士们，它力图打消他们进行祈祷的念头。^③ 不过，圣·本迪尼克特派所具有的严格的时间纪律仍占上风。祈祷文被世俗化了，祈祷的行为保留了下来。这种乌托邦时间的现代形式更加多样化。在一种看似能使自由和分散化的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存在的技术面前，自由与自决的梦想正再度燃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梦想是对争取参与政治建构的表达，（其中自由的梦想在不断贴近有所保障的权利现状的同时，仍然附属于缩减工时的数量逻辑，而自决的梦想则遭遇到取消受优待工种与弱势工种之间的森严边界等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也是从根本上为大家争取各种不同的分配模式的表达，其中包括“四十到五十年工龄”的可能性。很多人的后背上都刺着一把尖刀，并且有无数双手和多方利益在磨砺刀锋。然而，不同组织认知中的前景是相互抵触的。一方面，各类组织的集体认知总是有选择性的，并且受制于其以往获得成功经验的认知；另一方面，如果组织想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继续生存下来，那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地“再学习”。虽然个体的知识和目标可能对组织的知识储备和目标无关紧要，但无论如何，组织成员“有所异议”的观念还是会对一个

① 此处参见一个成瘾者的有趣的自画像：Henri Bents, “Computerarbeit und Lebenszeit”, in: Zoll, *Zerstörung*, pp. 293-303.

② Jürgen P. Rinderspacher, *Gesellschaft ohne Zeit*, Frankfurt: Campus, 1985; Willy Hohn, *Die Zerstörung der Zeit*, Frankfurt: Fischer Verlag, 1984.

③ Rom Harré (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组织的生存构成问题，那时，其生存依据的合法性会受到这些异议的影响。^① 其间，那把尖刀仍会一直留在许多人的背上。

第三种乌托邦时间力图从文化角度有所创新。它回到生物学的、文化的传统，这种在机器时代受到压制的传统得到了科学的重新认证，它试图以最佳的方式把保存与变异、变化与持续结合起来。它有一套名词称谓的空间，并且像其他乌托邦时间一样，以个体的日常经验为出发点。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伟大的人性信条的开场白就是如此。但是，各种机构长期建立起来的时间体系是如何由特定的旨趣来决定的呢？它们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它们的产生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个体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用聪明的统计学方法引证足够多的计划的“自发性”例子吗？计划的自发性是已经暗含在这个系统的设计之中还是出于可能给人以假象的“无常”呢？通过安装某种机会发生器，一个人更可能会屈从于社会正义标准的压力而排队等候，或者，像美国机场面对旅客抱怨（抱怨等待行李的时间过长）时的做法——把飞机停在一个更远的位置，远到把旅客的行程时间延长到行李到达的时间，而这样也就缩短了他们的行李等待期。^② 专家们称之为情绪管理（awareness management）。专家们受托进行了为数众多的研究，研究的唯一目标是查明人们花费在等候上的时间如何才能变得更有趣、更“自然而然”，并且在经济上更妥善地得到利用。不仅在苏联，还有在美国，人们平均每天要花费 30 分钟排队等候，一年下来，这个数字就达到了 182 小时：对于更深层次的产品和服务销售而言，这是一种迄今未予利用的潜能。

很容易看出，即使是这种文化创新的乌托邦时间的时间策略（这些结构巧妙的时间策略可能同有关人类生物节律、他们的社会偏好与所渴望的社会正义或社交活动的最新研究成果相一致），也同样无法避免人为操纵（实际上也就是滥用）的危险。因此，第三把尖刀同样正深深地

① Helmut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Rationalitätsgrenzen kollektiver Akteure am Beispiel der Arbeitszeitpolitik 1980—1985*, Frankfurt: Campus, 1988.

② Richard Larson, "Perspectives on Queue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Psychology of Queueing", *Operations Research*, 1988.

刺入我们社会的背脊。时间在竭力拔除这些尖刀吗？哪些人会是牺牲品，他们又会是谁的牺牲品呢？

无论当前这三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乌托邦时间在出发点上如何不同，无论它们所持的理由和所描述要采纳的解决方案如何不同，无论其所规定的行动策略倾向于何等程度的集体主义或何等程度的个人主义——它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时间都主要地被经验为一种外在的束缚，从外部作用于人，人们势必要抵制这种束缚。这种束缚可能并非人为，也可能是个人化的；它可能以雇主、社团的形式出现，也可能表现为某种主义，但无论如何，它是作为某种既定的东西、某种由他者制造的东西而出现在人们面前。这里的时间戴着面具，其最具中性色彩的肖像就是时钟。这层面具对人们的希望构成了威吓和否定，它压制并剥夺了它们。正是这层时间面具使人们蒙受苦难，而它的末日将至也是必然的。即使在最大胆的乌托邦时间中，也很难设想出这样一种解放：从每个个体的人类生活存在的时间限制中解放。

萨特 (Sartre)^① 曾经述及有关他的朋友保罗·尼赞 (Paul Nizan) 对一次苏联之行的沮丧：“他去俄国是因为他想要查明，大革命之后，现在的人们是否已经不再惧怕死亡，是否死亡对他们来说已经没什么大不了。”就这样，尼赞去了那里，他发现，俄国人对于死亡的看法同我们并无二致，结果失望而归。他那时曾对萨特说过（以一种明显无可奈何的语调）：“在这一点上，我一无所获，没什么事情好做，他们还是老样子。”^②

从终极真相——个体死亡的终局来看，所有人都是时间的牺牲品。貌似由时间衍生而出的面具所防护的正是这个真相。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我们无法把它完全摘下来，但却应该能够更多地看到它背后的东西。与此同时，还要兴高采烈地继续担当牺牲品的角色。

时间是出自人类的创造，并且同他们运用各种时间策略施于彼此的

①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和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试图用存在主义观点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文学。他的杰出政治活动，为他赢得了“20 世纪人类的良心”的巨大声誉。——译者注。

② A. Astruc and M. Contat, *Sartre: Ein Film*, Paris, 1977, quoted from, Blumenberg, p. 311.

权力影响有关。时间既同心协力又相互分离——像情人一样好斗。正如任何力量形式都有它的对抗力量一样，任何策略也都能找到它的对抗策略。时间无处不在，一位有名的日本武士新面武藏（Shinmen Musashi）^① 在 1645 年把他的作战技艺归结为以下策略（见 *Go Rin No Sho* 《五轮书》）：时间在舞蹈和音乐中重要是因为，只有时间恰到好处，节奏才存在。不仅如此，其他所有技巧也都离不开时间，并且还都是虚空的时间。时间决定武士的生存，决定他是强、是衰、是协调、是混乱。为了能够战略性地思考和行动，一个人必须得知道要利用哪一刻，又要在什么时间停下来……从小到大，从快到慢，从远景的时间到背景的时间，任何策略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顺便一提，鉴于日本经济的强力挑战，该书几乎成了美国经理人的必读本。^②

时间被战略性地用做权力形成的核心，加上维护这种权力的目的，从个人交往关系到各个大型机构及其内在持续的倾向性，这种战略性运用贯穿了整个社会生活。时间的战略性运用从儿童开始（他们总是把自己刚刚经历的意识状态置于时间感知的中心，他们感知到的是一种直观接着另一种直观）。他或她由身体的周期性形成了最初的时间观念，同时也是处理时间的最初策略。在呼吸、饮食和睡眠的节律中，孩子经验到自己原初的满足感和匮乏感。通过括约肌^③的控制，孩子稍后发展了这种执行独立的时间意识的最重要的工具，借助这一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依其自身意愿让大权在握的成年人对这种时间俯首帖耳，就成为可能。然而，社会和外部的规定已经介入其间。对孩子来说，包含在对躯体功能的独立审视中的乐趣，使得要在周围环境的压力之下放弃身体原初的时间感极度艰难。异己感从完全的愉悦中抽离出来。^④

① 又名宫本武藏（1584—1645），日本战国末期与德川幕府前期的一位剑术家，他在日本的影响相当大，以致有“真田的（幸村）枪、宫本的刀”的说法。他写作的《五轮书》在西方得到了传播。——译者注。

② Miyamoto Musaki, *Book of Five Rings*,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4.

③ 指分布在人和动物体某些管腔壁的一种环形肌肉，人体内的括约肌见于消化道和泌尿系统。——译者注。

④ Laermann, “Alltags-Zeit”, p. 340; Jean Piaget, *Die Bildung des Zeitbegriffs beim Kind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0.

卡罗琳·诺伊鲍尔 (Caroline Neubaur) 撰文探讨了英国精神病学家唐纳德·温妮科特 (Donald W. Winnicott)^① 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洞见。确切地说, 在母子关系的早期阶段, 下面的情形就是典型地由异化产生的。这里存在着一些彼此阻遏的假象, 它们存在于这一事实之中: 两套“内部”体系相互遭遇, 一方总是会侵占另一方的“外型”, 而这些假象却又无法将彼此感知为虚幻之物。为了消除异化, 就必须增补某些能为双方所感知的东西, 它提供了双方隔阂的要素, 而又有能力消除隔阂。在温妮科特看来, 这第三种成分就是能被原来双方接纳为某种异己成分的过渡性客体 (the transitional object)。为此, 母子双方都必须做出努力, 也就是说, 为了能够克服异己感, 就要接受些许异己感。^②

矛盾的是, 由此可以继续推出, 个人时间只有通过他者的时间才成为可能。只有当我们创造出一种共同的时间作为参照框架之时 (它既不完全属于任何人, 又被任何人所占有), 才能完全消除时间的束缚, 或至少能放松时间的束缚。在两个个体之间, 这预设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即借助他们各自持续的时间策略来磋商、争论的过程。多套策略任由策略性的行动按照时间并通过时间来掌控: 加速或减速、限定期限、许诺、等待和使他人等待、在恰当的时机行动, 决定或赢得某人的时间。把这些社会情境彼此连接到一起的是间隔 (这些情境以不计其数的变体形式再现, 人们在其中以符号的方式限定时间, 但却会带来真实的结果)。就像温妮科特的“过渡性客体”一样, 泰迪玩具熊或是毯子的一角, 它们滑入母子之间, 并成为象征经验和赢得现实的有力手段, 这变成了人类创造力本身的基础, 时间间隔是建构人类间关系的基本要素。等待和使他人等待、许诺、决定、限定期限——用它们的无数变体形式和混合形式, 就能构型出爱恨情仇的交往关系来。取消间隔就意味

① Donald W. Winnicott (1896—1971), 是英国的一名儿科医生, 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师。他治疗了大量具有精神困扰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 在这过程中, 他积累经验, 构建了自己最有影响的一些概念。比如说下文中提到的“过渡性客体”。——译者注。

② Caroline Neubaur, *Übergänge: Spiel und Realität in der Psychoanalyse Donald W. Winnicotts*, Frankfurt: Athenium, 1987, pp. 83-84.

着取消策略。^① 间隔可以被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它可能由社会不平等的状况或由权力的表达以及对这种权力的巩固所引起。逼近时间的精彩策略就是以间隔来表明其本身。

然而，这种间隔一方面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它随时间而流变，并且，它像权势一样，总是保有重新商榷的可能性。我们来引证使某人等待这样一个最为司空见惯的例子，在使某人等待的情形之下，他人的时间由他们仍处于空闲的时间来处理。被等待者没有什么语言表达，只有等待者才有语言表达。然而，虽然等待者明显处于弱势（权力和地位的差异在这里显露出来），但这种状况是有限的，为对抗的策略开放了空间。另一方面，允诺把间隔延伸到了一个确定或不确定的时间，允诺预设了信任，而信任节省了时间，但诺言是有条件地接受保持它们的要求的，并且最终也服从这种间隔的策略。另外，限定期限，也就是设置限度；间隔被赋予一个时间限度并受到裁制，它作为一种权力设施而得到考验，但期限也还是可商榷的。

通过指示、中断、减速、加速、约束时间的流动或者赋予时间流动某种期限，间隔构造出各种人类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时间概念的部分特质不仅仅是普遍综合性的象征符号，不仅仅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抽象，而且是个体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象征符号。^② 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是人们能在某种时间情境下初步做出决定所必不可少的。在时间遭到社会否定的条件下，由于这样的条件不具有连续或是终止的取向，社会所期望的持续时间不存在，间隔和决定也就不存在。如果“选择”既不构成一种中断，也没有形成非事前决定的抉择，那它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这种抉择毫无影响（例如，没有引起某种后果或没有形成某种先后次序），那它也同样毫无意义。^③ 利用间隔，即把时间限定为某种关系结构，这种策略性游戏以对

① Pierre Bourdieu, “La société traditionnelle, attitude à l’égard du temps et conduite économique”, *Sociologie du Travail*, vol. I (1963), pp. 24-44.

② Norbert Elias, *Über die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pp. 112-113.

③ Mark Elchardus, “The Rediscovery of Chronos: The New Role of Tim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3, no. 1 (March 1988), pp. 35-60.

恰当时机的探求为基础。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懂得或者渴望这种瞬间。这种瞬间对于个人和组织同样适用，事实上甚至还适用于国家。公司得决定是否以及在什么时候要扩大经营或者是增加产品种类，得决定在什么时候进行市场交易；政党得在恰当的瞬间决定要不要召集新一轮的选举。这些都是历史性的瞬间，或者至少可能会在回顾中被重构为历史的转折点。科塞勒克主张，上千年之中的失败者是更好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最主要的经验（不同于那些胜利者的经验），首先是：一切转变都与原先的计划或希望截然不同。如果他们能够系统地加以反思，那他们就必须找出更多的证据来解释为什么事情会变得不同。^① 但是，如果在反思性回顾中证明恰当的时机别无他选，那么，可能会使事情发生转化的首先就是间隔。

间隔一旦从人际关系的层次转移到组织机构的时间结构中，就会改变那一时间结构的性质。当然，它在那里仍起到战略工具的作用。在官僚政治机构中，限定期限的优先级是我们已经引证过的例子，确立时间上的优先级是对复杂事物加以简化的手段。然而，当人们彼此把对方作为意义协商、符号互动和交流的对象时，即便是在敌对的立场上，他们还是会通过创造间隔、用这些间隔来玩法以及自己“构造”时间来安排时间，这些会以人际互动、礼仪与风俗、精湛的缓兵之计以及承诺或拖欠债务等形式连续地发生，组织机构的时间则会成竹在胸地以更加粘滞的策略（即便不是凝固的）来对付他们。对“时间”这个词的频繁使用，就好像它是独立自存的一样，这同社会机构与设施中的时间变得相对独立于个人有莫大的联系。正如决定时间的手段一样，不管是否出自人类之手，它们总有其自身的运动，由于那些社会的标准化了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他运动，独立于其他人事变动和非人事的变动，个人也就不得不使自己的行为适应其所属群体确立的时间，适应其周遭的组织机制。

这就是时间的异化，通过时间在组织机构内的浓缩而发生，而后又作为某种外部的东西发生作用，它被感受为一种束缚，并且能够被用做

① Reinhart Koselleck, “Erfahrungswandel und Methodenwechsel: Eine historische-anthropologische Skizze”, in: *Theorie der Geschichte*, 1988, pp. 51-52.

一种权力工具。人际圈中的间隔相对具有开放性和可塑性，而当问题出在法定期限对其施加制裁、信用机构设定了期限并使金钱起效、由组织以及组织内部限定、容许、指令等待期的地方，它就变成严格刚性的了。这里展现出文化之间、组织机构之间相互比照的广泛的活动领域：谁必须要等待，要等多久、要等谁、要如何等，可以标示时间（这里含有“时间是谁的时间”的问题）在一个组织内被赋予的价值。此外，间隔缓慢加固所需要的初始条件，间隔在权力结构中的嵌入，也都能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

中央权威跨越时间和空间行使其权力，而地方权威则要在一定的时间类型下确立其统治。早期的大帝国运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种形式来巩固其统治，但首先，它更急于控制空间，即控制地域领土。为此，存在着空间上的策略——使用武力，还有征税以及最初在时间上运用的策略（其明确地包含在官僚政治所发行的书面材料和文件中）。^①现在我们既能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了。即便是今天，我们也很容易在独裁政权中发现权力在时间方面的实施。政权的建立既基于恐怖也使用时间策略。恐怖通过不可预见性，即时间上的独断而得到实施，由此，那些受害者被清洗而变成牺牲品。并且，在军事独裁政权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因不承认三权之间的时间联系而遭到废除。因为，司法代表的是过去所发生之事。过去得到判定，而我们所做的是非判断处于回顾之中。然而，立法却是指向未来的。制定法律是为了确立行为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的要件，而行政权的实施则完全是当下的行为，它确立并决定什么是并且必须是现在的支配物。在军事独裁政权中，由于独立司法权和独立议会制度的废除，过去和未来同时被否定。所有的权力都归属于行政，它必须要单独决定，在统治着其他时间的现在这个时间维度中，什么必须要占优势。^②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区域性统治凭借“秩序”的空间概念得到执行，其后紧随着致力于运行、“进步”，通过加速而前进的动态化概念。加速把时间用做追求战略目标的行动。在战斗中生死攸关的迅速性，即

① Jack 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Oskar Ozlak (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资料来源于口头交流。

快过其他人，已经在竞争中得到保持，而且正发展出日益复杂的形式。现在遍及全球并驱动着世界经济活动的经济竞争，在根本上仍然以使用机器加速来提高生产力的那种发展模式为根基。实验的时间是新通信技术所固有的，它被用来传递信息给其他生产和服务领域，创造更多的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进步，也为了持续加速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加速促进了流动性，而流动性承诺了更进一步的活动性。甚至于运动，在咄咄逼人的冲突中制度化了的身体竞技，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适于做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传媒而服务，最后，城镇与地区就像是得到超级体细胞加速了的身体机器的附属物。在为众所周知的几十分之一秒而奋斗的过程中，在周遭的狂热崇拜中，这几十分之一秒以科学的训练方法为基础，它能够根据运动员的生物节律来考虑他们的身体功能，并会顾及技术装备所必须提供的最微小的一点进步。在这里，一个庞大的革新机器已经启动，它导致了工业分支机构的高速增长，其覆盖范围从单一的增强体质的运动直到处于电力竞赛中的工业所激发的实验研究的各个阶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对速度的集体狂热，由这种狂热的观点看来，放慢速度的策略实际上既可悲，又是防卫性的。自行车道在城镇中修建起来，速度限制进驻高速路，作家斯登·纳多尔尼（Sten Nadolny）出于小说《慢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Slowness*）的需要，塑造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形象，他具有奇怪的思维和感知习惯，奇怪到让他的同时代人都感到怪异的程度。这些减速的试验无疑会持续进行下去，并且，甚至会部分地得到制度化的认可。然而，一个运转良好的刹车装置难道不是所有构造得体的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吗？不是每个开动机器的人都知道在什么环境下要加速、在什么环境下要减速吗？于是，“慢”最终被持续的加速所抵消，加速通过“慢”而使自己相对化了。当然，社会发展并不会完全依照机器而运行，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却不可逆地指向了加速。石器时代在逃跑和战斗中所折射出来的快速，已经在整个社会演化过程中发展为一种科技的文明，这种文明正不断加速。这是背景的时间，对于所有尚待认识的其他时间策略而言，它具有核心的重要意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早就主张：“社会时间”由人类创造并在人们之间产生，因而指明了符号化的、设定了时间的结构化过程。诺伯特·埃利亚斯认为，回顾伽利略的活体实验，如其所示，物理学中的时间概念是从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时间的母体中分娩出去的，它与自然概念中

的相应变化有关。^①在他看来，物理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区分与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地位的普遍上升密切相关，这导致了观念上的二元论。在这方面，科学家们已经取代神父行使确立“恰当”时刻的职责，这种时刻预示着上升或者下降，并且是混沌和秩序的决定因素，不管其是源自已发现的同诸神之事的一致性，还是以科学为基础对自然及其进程的研究。埃利亚斯对出自一位非洲作家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之手的小说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评述，焦点是围绕决定时间所产生的冲突。它涉及尼日利亚东部的一个伊博人（Ibo）的村庄的第一手的生活报道，在此期间，这个小村中的旧的生活方式在殖民权力的影响下刚刚开始发生转变。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地位崇高的牧师，他身兼六个村庄的神职工作，他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传布恰当的时刻。恰当的时刻是通过新月的到来得到指示的，为此，这位牧师不得不长期监测，像礼遇贵宾一样迎接新月的到来。人们的事务取决于新月的到来，节日以及开启新年的收获时节的开始也不例外。作家埃利亚斯同情地描述道：对人们而言，这意味着从一位协调他们活动的权威那里获得恰当的时刻，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对决定时间的秘密的认知，体现了牧师权力的来源。他们深入地洞察到了时间经验的早期形式，并证实了听从布道所宣称的收获到来的时节对于人们是何等重要。而当有那么一天，经过一场与殖民当局的急剧恶化的冲突之后，牧师突然沉默下来，不再传布收获的时间，人们开始忍饥挨饿。

但是，恰当的时刻到底代表什么呢？能参照什么来衡量它呢？对这一独特瞬间的渴求可能策略性地指向外部，以便从实用的角度寻求对这一时间问题的认识，它可能会转化为实在的进步。它可能是有计划的或者是时机巧合，但无论如何，这总是把它同人类行动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认识恰当的时刻非常有用，对这种时刻的决定过程是权力磋商与控制权确定的过程。但对这种瞬间的探索也可能指向内部，指向个体的时间自我的展现，指向由诸多碎片反复重组而得到的某种认同的发展。于是，时间被时间的流动制造出来，这种时间流随时停下来让意外进入其中，打破惯例，并对自然发生的经验和生活的“无常”保持开放。像可供孩

① Elias, *Über die Zeit*, pp. 91-92.

子们从中发现过渡性客体，并同时自己动手创造的创造性过渡的时间一样，“过渡的时间”在这里得到了揭示和创造。通过虚构的暂停，随意的停顿脱离时间持续而呈现出来，过渡的时间也导致了真实—虚假的二律背反。因为，真实之成为真实仅仅在于可能性的缩减和消除的过程。^①从长远看来，这样的瞬间是不可阻挡的，它会返回时间的连续流。但这样的瞬间包含着能够把单纯的过渡转变成发展的权力。卡西亚利（Cacciari）以诗意的语言（他继承了伟大的希伯来、基督教和伊斯兰经院哲学的传统）谈到“即刻”（the munc instantis），它是一个属于暂时过渡期的时间维度，这个维度即便处于完全充盈的状态也是如此短暂，又如当下，以至于很难作为一霎时的时间而被注意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完全是瞬时即变的——一个彻头彻尾的短暂维度，在其中，最短暂的片刻才符合这种瞬间，它仍然保持着连续流的同时，又轰然击开了连续流。在这种打断瞬时流的时刻，很可能让人“满怀”希望的火花，并且“以错误的方式粉饰历史”；在这样的瞬间，很可能会理解“世界是如何极端地残缺……失望的根据不仅是毁灭的废墟，还包括能在所有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中燃起火花的力量”。可以肯定，存在着短暂的有希望的过渡期，这个时期的意义比灾变更强烈，而“能在所有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中燃起火花的力量”则脱去了对那个均质而又空虚的连续流的偶像崇拜的假面。^②

但是，就像知识可以是一种游戏一样，游弋于这种瞬间也有章可循，这些章法脱离虚构的领域，进入了现实的领域。在温妮科特看来，孩子们在玩耍中发现并发明了现实；他们正是在这样的玩耍中令自己得到惊喜。在游戏中，孩子发现了自我，这种自我茕茕孑立，但在关联于现实的时候，它又并非如此。甚至对于玩耍而言，也要把设置、转换并学习保持限制放在核心地位，原因就在于，这里可能洞见的正是发挥优势作用的限制的不断转换。

同母亲的分离通过某一空间——过渡性的空间，并且在既不属于内部的心理现实也不属于外部世界的过渡性客体的助力下发生。游戏具有创造这种空间的建构功能，它刺激了孩子的创造能力。温妮科特把某种

① Henri Atlan, *A Tort et à Raison: Inter critique de la science et du myth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6, p. 268.

② Massimo Cacciari, *Zeit ohne Kronos*, Klagenfurt: Ritter Verlag, 1986, pp. 138-139.

文化理论发展为对过渡性客体观念的一种延续。发现自己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客体的孩子所玩的游戏，以及这一游戏在成年人的文化创造中的延续，都发生在处于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理现实之间的某一空间。温妮科特认为，这一“中间领域是实际的力量源泉，因为它是它启动了内部和外部的运动。陷入这个中间领域意味着能够以新的能量干预外部世界”。^①而所有这些也同样会发生在过渡时期。创造，即文化的创生，需要的不仅仅是空间，还有时间。孩子必须学会使自己摆脱其最初的无所不能的幻想，以便能够在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仍然还不是真实的）过渡的空间和过渡的时间中创造出像成年人那样的新的幻想。作为一种文化创造的成就，游戏及其拓展物是一种极好的放松练习，其使主体获得了新生——这一成就打破了规则，取消了体系，并因而通过富于产能的混乱使得一个人自己扮演文化创造者获得了些许可能。

如上所示，玩时间游戏、转变限制、试验“优势限制”以及设置新限制，是作用于个体之间的符号力量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上述那种瞬间的探索在科学中尤为重要。对这种战略性瞬间的认识看似出于实践应用而势在必行，甚至尼采（Nietzsche）都曾怀疑，那种对于不可预期之物的恐惧才是科学隐匿的本性。不过，对这种瞬间的探索也可以在另外的意义上得到解释：一种对创始的瞬间、对本原的质询（在这一刻，宇宙得以诞生，时间随之出现）。物理学的时间，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从社会时间的母体中脱离出去，在机器时代，它在意识形态上变成了进步的线性导轨，所有其他的时间都不得不在它的外在的、客观现实的名义下归附于它，它开始再度逼近社会的时间概念。不仅是因为对宇宙起源的不同可能性的研究日益加强，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宇宙的创生事件是否独一无二这个问题，就物理学家而言，尤其可以作为一种时间游戏而得到解释。普利高津和斯唐热谈到了一种新的连贯性，它开始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浮现，并且开始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讨论“发展问题”。例如，“事件”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正是现在这一事件解释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差异，而在物理学中，凡是时间之矢遭到否定之处，过去和未来就会被认为是等价的。^②物理学近来所得出的结论

① Neubaur, *Übergänge*, pp. 93, 108.

② Ilya Prigogine and Isabelle Stengers, *Entre le Temps et L'Eternité*, Paris: Fayard, 1988.

大多是（即便不是全部的话）：周期循环的现象可能是“混沌”的，反之亦然。因此，“不可重现的”时间现象与“可重现的”时间现象之间的过渡在两个方向上都是可能的。因此，对于可重现的时间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时间的逆转，因为事件流是可以逆转的，即在已观察到的事件不变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了的发展可以原路退回。无论如何，对于混沌现象，不可能重构它们的过去，也不可能复制它们。据此，也就会同时存在两种类型的演化。

在那一刻，由于宇宙大爆炸，已经出现的爆发现象是属于“可重现的”还是“不可重现的”时间领域，这一点还不确定。普利高津和斯唐热猜想，根据必定存在一个“时间零点”的论断，宇宙学最初对宇宙所作的独一无二性的假设是要被抛弃掉的。相反，他们提出，宇宙很可能处于某种“没有理由的行动”中，它产生自真空的涨落、产生自合计为零的物质和能量的运动。因此，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独一无二的事件，只有一种介于源自涨落的各种熵态（the states of entropy）之间的过渡（这种涨落不同于混沌和秩序之间的波动）。

最近，另一位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也同样提出要抛弃大爆炸的独一无二性的假设。独一无二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形：时空连续流在其中已经收缩成无限致密的、无限微小的点，是无法以物理术语来描述的一种状态，时间在其中是没有意义的。此外，他还试图回答，为什么尽管物理法则无法在向前指向与向后指向之间做出区分，但却至少有三支从过去指向未来的时间之矢的问题：以无序性递增为依据的热力学上的时间之矢；以保存在记忆中的过去而不是未来为依据的心理学上的时间之矢；以宇宙在膨胀而不是在缩小为依据的宇宙学上的时间之矢。目前，霍金希望一种新的、尚待探索的、大统一的理论（量子引力论）能够导向这一结论：时空连续体体现的不是某种开始于大爆炸、结束于大塌缩的“线性”，而是一个无始无终的“循环”。根据他的看法，时空连续体诚然无界，但却并非无限，以地球为例，尽管它的浩瀚是有限的，但对于一个散步者而言，它看起来还是没有边界的。然而人类只能存在于宇宙膨胀的阶段，并因此对于宇宙和时间的认识也只能存在于这一阶段。人类及其对宇宙和时间的认识，体现了日益混乱的宇宙中的些

许秩序^①，不过，这足以把社会的基体带回自然。

在自然科学家看来，对于今天的人们，对于他们对个人时间的渴求，对于他们对逃避时间束缚从而能够各不相同地建构时间的渴望，这样的“时间游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在日常的各种时间并置状态中处于复杂平衡的行为如何才能更好地得以完成呢？在扩展了的现在中，一个社会又应该如何处理加速了的革新、日益增长的惯例以及丢弃等这些普遍盛行的问题呢？有时间游弋于时机的游戏，有能力投入各种过渡的过渡期，这些都要以对这种时间的构成方式和创造方式的认知为前提。科学上的认知所不得不提供的这种“如此，无他”，至少在特定条件下，它包含的是“现在如此”“现在无它”这一能用以干预和建构事物的可能性。从一种变化的时间感开始（像所有的感觉一样，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经验的产物），对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面具背后的时间进行扫视，我们就会同样具有以其他方式筹划这种游戏的可能。

克洛诺斯之忧导致他吞噬了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子嗣，但这种忧虑并没能阻止新时代以及新时代喷薄而出的革新活动。更多的运动和速度随同机器一起进入社会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感知官能。迫于对恒常可用性的要求，一种更趋加速、然而也更趋散漫的时间性质与今天的各种机器胶着在一起。机器与人正在形成新的时间结合，就像以机器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结合呈现出另一种形式。社会的时间之矢也是指向前方的。我们还没有打破看似出自时间的种种束缚，但是，游戏，团队的游戏，很可能正在松脱它们。对个人时间的渴望已经可以通过公共的方式得到交流，但只有通过其他人，个人时间才得以可能。要依靠克洛诺斯所忧惧的孩子来抓住这种面相万千的瞬间。对我们来说，关键不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刻，而在于它是能在社会层面上被感知到的第一刻。发现并塑造它是必要的——作为一个可重复的时刻，它在社会混沌与社会秩序之间，在个人时间本身与社会时间之间来回波动。

如此，则有朝一日，克洛诺斯的孩子是否解放了他们自己，自当水落石出。

^① Stephen W.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London: Bantam Press, 1988.

后 记

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之前，布鲁姆对于 1884、1885、1886、1888、1892、1893、1904 年这一系列不规则的日期有过什么样的反思？

他反思的是：个体成长与个体经验的范围越是得到推广，越会带来个体之间对话领域的狭窄限制这一退化的现象。

例如哪些方面呢？

从不存在到存在，他出现在众人面前，被接受为其中一员：在存在与存在的关系上，他以任何存在对待任何存在的方式来对待任何存在，他即将由存在到不存在，成为所有人都感知不到的无。

—— 詹姆斯·乔伊斯

《尤利西斯》(James Joyce, *Ulysses*)

译者后记

本书原德文的正标题是“Eigenzeit”，而英译本的正标题是“Time”。德文的“Eigenzeit”这个词的本义是指，每个事物、事件或过程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时间与步调，有其独特的时间机制。如英译本序言中所示，将“Eigenzeit”对译为英文的“proper time”是惯用法，但容易由之产生一定的歧义。为不致丧失原德文标题中所暗含的物理学时间与社会学时间之间的源联系，使中文读者对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之间的隐喻关系有所领悟，我们按英译本作者的意旨，把中译本的标题定名为《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同时，阅读全书后，读者会发现，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的各种时间与个人层面的时间在工业化社会如何相互冲撞，并且在历史的解蔽过程中探讨了如何松脱时间的束缚，把握历史性的瞬间，从而找回个人时间——按照个人所固有的时间本性的要求来调谐社会生活的节奏，以达到个人的整个日常生活的解放。在本书中，贯穿各个章节的中心词汇就是“proper time”。经语义上的斟酌，凡涉及物理学上的“proper time”，我们都将其对译为“本征时间”；凡涉及社会学上的“proper time”，我们都将其对译为“个人时间”，仅在个别语境下对译为“自我时间”。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译法，其蕴意都离不开事物本性所要求的那种时间性。

作者赫尔嘉·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是当代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曾在 ERC（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建立期间担任欧州委员会欧洲研究顾问小组主席，她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外籍成员，并由于

科学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终身成就而被授予了贝尔纳奖^①。这本书出版于1989年，在某种意义上，书中所述思想是对工业化社会的标准化时间挤压下的人们的生存方式的本真叩问，是充满人文情怀的科学社会学论著。对于20年后的中国读者来说，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问题空间和反思的余地。相信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会对深深植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时间概念以及时间概念对于社会生活的建构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本书的引论、第三章和第一章前半部分由张网成老师对照英译本与德文原文翻译而成，而本人则承担了其余部分的翻译，这是我参与翻译的第二本时空社会学论著，与前一本《时间与社会理论》相比，这一本在理论层面上有更深刻的扩展，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涉及更多专业理解方面的问题，翻译过程中所遭遇的大量艰辛自不必言，而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译文中存在的错误更是在所难免，幸有德文翻译见长的张网成老师多方点津，才避免了一些纰漏。此外，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朱红文老师，他的信任和关怀为我翻译本书增添了无穷动力；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这本书的顺利面世和他所承担的大量烦琐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金梦兰

2010年12月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① J. D. 贝尔纳 (J. D. Bernal) (1901—1970)，科学学主要创始人和理论奠基者，英国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曾任国际结晶学协会主席、世界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是科学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为了纪念贝尔纳对科学学的贡献，国际科学学界设立“贝尔纳奖”以奖励在科学学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英译本序言：从物理学的“本征时间” 到社会学的“个人时间”

J. T. 弗雷泽

科学理解方面的巨变往往会引起其所属时代的整个文化结构的反响。哥白尼学说的革命激发了丰富的文学和艺术表达形式，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也同样如此。20 世纪，艾伯特·爱因斯坦以数学的方式把有关运动、力和电的规律都置于统一的框架之中，即所谓的“时空”。他的相对论所引入的新概念之一“第四维”（the fourth dimension），已经被我们的日常语汇所接纳，并在大众传媒中频频亮相。经集体和个人层面上的观念创造力的魔化，这一术语已跃居公众的意识层面，成为对时间本性的科学性理解的隐喻。

在《个人时间：时间知觉的兴起与结构化》一书中，杰出的奥地利科学社会学家、国际“时间研究协会”主席（1992—1995）赫尔嘉·诺沃特尼根据时间观念和时间经验分析了我们时代的社会变化。她对源自相对论的“本征时间”（proper time）和“第四维”概念的创造性运用极富成效。

诺沃特尼教授原书的标题是德文的“Eigenzeit”，这里的“proper times”是其英文对译。“Eigen”意为“belonging to the self”（属于自己的），“Eigenzeit”遂对应“self-time”（自我时间）；“Eigenliebet”遂对应“self-love”（自爱）。对那些理解德语的人来说，“eigen”作为词根在构词中的意义一目了然。而正因为这种一目了然性，“Eigenzeit”这个词在德语中更恰如其分地包含了分别用于相对论和用于社会科学的那些时

间称谓之间的形式上的关联（其中，时间性在相对论中的准确含义尚需进一步说明，而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含义即便不是完全自明也是几近自明的）。

在相对论历史的早期阶段，“Eigenzeit”被对译为英文的“Eigen-time”，其他相关的专业术语还包括“Eigen-function”“Eigen-value”等。后来，“Eigen”这个词被“proper”所取代，由而产生了“proper time”“proper function”和“proper value”等名词。在英语中，“proper”与“Eigen”词源相同，“property”（Eigentum）或者罗马历法中圣徒的“proper days”也与之同出一源。然而，如此翻译这个词固然准确，但其自明性却会因之丧失，同时，我们将无法看到使用该词的特定物理时间观同社会时间观之间的一些形式上的亲缘关系。如果诺沃特尼教授的“Eigenzeit”一书以“proper time”为标题出版，那么，它就会更多地使人联想到有关英国的下午茶礼节的作品，而不是一本有关时间社会学的论著。

“proper time”在物理学和在本书中都有什么含义呢？

在相对论中，它意指在一个时钟起作用期间发生，并由该时钟所计量的两个事件之间的时距。到目前为止，这个定义虽则无趣，但却别无它选。但当我们虑及处于相对运动的两个时钟时，这个定义看来就会有趣得多，而当我们所虑的时钟是生命有机体的生物循环时，它就简直变得引人入胜了。“time”与“proper time”之间的差异可以由下面的例子得到说明：

假定一头印度大象的妊娠期是 645 天，一只家鼠的妊娠期是 19 天，母象与母鼠与其各自配偶都在 1 月 1 日交配。而后，再假设这只母鼠以极快的速度进行长途的往返旅行，并且它的旅行路线由一个胜任的相对论者来设计。又假设它在次年的 10 月 7 日返回，恰好来得及庆祝两者后代的同时分娩。在幼仔的产生和分娩这对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大象的本征时间（proper time）来计量是 15 480 小时，以家鼠的本征时间来计量则是 456 小时。

就当前的运输技术而言，这样一次旅程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该原理的有效性。这两种时间量度都必须被看做是真实而正确的，并且两种时间都是不变量。“不变”在这里意即：任何人只要懂得爱因斯坦有关如何计算一定距离内的时间的规则（不管计量者身处何地，也不管

其运动方式如何)，都将分别获得大象的本征时间是 15 480 小时，家鼠的本征时间是 456 小时这两个数字。这些数字通过特定的方程式建立起关联，在比通过牛顿学说可能达致的更高的普遍化层次上密切地结合成一体。即使相对论不能告诉我们现在、未来、过去或者说是时间之流的可能含义，上述一切还是不能被推翻。物理学家必得在其能够对旅行的大象和家鼠做实验之前就懂得时间的本质。

在这样的旅程中，时间之流会为每一动物保持标记。它们的日子会经过不断变换的现在的各个瞬间，将来和过去通过与这些现在瞬间的相关性而获得意义。而三分钟煎蛋总得要三分钟才能煎好。

仅当一个人想要比较在两个或者多个处于相对运动的系统中所进行的时间计量时，才会产生根据本征时间进行思考的需要。只有当那头大象想要知道在她的本征时间中老鼠制作煎蛋要花多长时间时，才需要这整个的概念体系。可以说，时间（time）是一个集合，而各种本征时间（proper times）则是这个集合的各个子集。

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有关时间、本征时间以及它们两者之间关系的概念纳入对社会过程的研究之中。

诺沃特尼教授书中的个人时间（proper times）有别于物理学中的本征时间（proper times），在物理学中，不同本征时间之间的差异是时间单位上的量的差异，而在本书中，不同个人时间之间的差异是性质上的差异。个人时间代表有关未来、过去和现在的信念集结，表达有关变化和持久、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哲学、宗教与美学的判断力，甚至还有关于认同和忠诚的见解，它代表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所具有的时间观念和时间经验的整体。

诺沃特尼教授主张，人们是从社会组织中提取像空间和时间这样的基本思维范畴的。假如这样的话，那我们时代显现在各种不同个人时间方面的社会漩涡的明朗化就不足为奇了。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社会也像不同的商业、工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一样，都拥有其各自的个人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时间、他人的时间、群体的时间，在作用和重要性方面有着不同的判断。所有的这些个人时间，不管它们是抽象的观念还是行动的指导方针，都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更确切地说，是主张那些个人时间的个人和群体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这样一些分歧无疑贯穿了整个历史，只是承载着文化和种族差异的全球

的时间紧密性使得这些分歧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引人入胜、进而引人深思罢了。

这本书是对一个躁动的时代的敏锐观察，其中充满了鼓舞人心的隽语。如作者所言：尽管存在这种躁动，也可能正由于存在这种躁动，探讨对社会变化模式的理解一直是一件富有吸引力的工作。这并不单纯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采取有效的行动，更根本的原因是：存在着一种人类需要——对能够揭示不以人类的意志和目的为转移的规则之美的需要。

在本书所考察的五彩斑斓的画面中，作为 19 世纪交替期的特征集群而突现的现代主义，同时也是一股造福于社会之工艺进步的推动力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种现象。可以把它恰当地描述为对一系列变化的反映，这些变化如此迅疾，以致很难把它们整合到新近发生的过去和汹涌而至的未来。于是，由各个个体和群体所创造的环境超出了其创造者的适应能力，并导致时间视阈的丧失，或者说是导致了诺沃特尼教授所谓的“扩展了的现在”。

沿着这一理解路径，在说明我们时代的全球性问题上，对个人时间的社会阐释被证明是颇有裨益的。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5NTUzOTg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955398.zip",
  "filesize": 10556726,
  "md5": "093c58261443100136a55762f5add3b7",
  "header_md5": "3a8facdb5a35af4cd9c53c696f989204",
  "sha1": "677f269bdd88a97cf37425fdad923c9007a4f88e",
  "sha256": "88406db54b8f331bdd9406b850569d510c9b59cb87fad31dae8802b456324708",
  "crc32": 9290531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0896490,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27,
  "pdg_main_pages_max": 127,
  "total_pages": 136,
  "total_pixels": 49085827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